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從中西文化論述到民族主義史學：以反五四新文化運動學者 為中心的討論(1911-1945)(I)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1-H-004-020-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彭明輝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31 日

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

摘要	3
關鍵詞	3
ABSTRACT	4
KEY WORD	4
一、 引論	5
二、 南北新舊：傳統與創新	13
三、 中西文化論述：以《學衡》與《新青年》為分析對象	17
(一) 《學衡》與南方學統	17
(二) 《學衡》內容分析	19
(三) 從《青年雜誌》到《新青年》	24
(四) 《新青年》內容分析	27
(五) 《學衡》與《新青年》的比較	32
(六) 小結	36
四、 《史地學報》與反古史辨運動	39
(一) 《史地學報》的創立及其組織	39
(二) 《史地學報》內容分析	47
(三) 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65
(四) 吹響現代中國新史學的號角	81
1. 今古文之爭的新命題	81
2. 胡適與杜威實驗主義	83
3. 科學主義的影響	85
4. 民俗戲曲與典籍史料化	87

(五) 從“大禹是蜥蜴類”談起.....	89
(六) 神話與信史.....	96
(七) 一樣米煮兩種飯.....	100
(八) 文獻、疑古與釋古.....	111
(九) 小結.....	117
五、 國史建構：民族主義的理想與現實.....	120
(一) 史地教學與編寫教科書.....	120
六、 史學動向：材料、方法與解釋.....	124
七、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天鵝之歌： 以《思想與時代》為主體的分析.....	124
八、 師友網絡，相與問學.....	126
九、 結論.....	127
十、 徵引書目.....	127
(一) 中日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	127
1. 期刊.....	127
2. 專書.....	127
3. 論文.....	138
(二) 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英文字母排列).....	140
(三) 網站.....	141

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

摘要

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網絡，係指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包括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教授為主體的文史學者們，包括：柳詒徵、吳宓、竺可楨、劉伯明、徐則陵等人；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者們，包括：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向達、鄭鶴聲等人；以及在治學取向上接近南學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王國維、呂思勉、張蔭麟、蔡尚思、湯用彤、陳寅恪、錢穆等人。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有關研究中，北方學統無疑較受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學派，北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領導性的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有關南方學術網絡的研究，向來較受忽略，雖然在有關北方學統的研究中，部分論著亦帶及南方學術網絡，但大抵均屬陪襯性質，或視之為主流學術的反對者。本文將全面論析現代中國史學南方網絡的諸種面向，包括：南北新舊的傳統與創新，中西文化論述，民族主義思潮下的國史建構，史學理論的材料、方法與解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思想文化論述等面向，冀期建構南方學術網絡的可能性。

關鍵詞

北方學統、北大、南方學統、南方網絡、南高、學衡派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

Abstract

We usually refer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mainly to those historians at Nanking Normal College (including modern Tung-nan University, Central University, Che-chiang University, and Nanking University), including those scholars like Liu I-cheng, Wu Mi, Chu K’o-chen, Liu Po-ming, Hsu Tse-ling, and those graduated from the College, such as Chang Ch’i-yun, Miu Feng-lin, Ch’en Hsun-tz’u, Hsiang Ta, Cheng Ho-sheng, and those whose academic approach close those at the College, such as Wang Kuo-wei, Lü Ssu-mien, Chang Yin-lin, Ts’ai Shang-ssu, T’ang Yung-t’ung, Ch’en Yin-k’o, and Ch’ien Mu.

Doubtlessly, researches in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Northern School” attract more attention than those among “the Southern School” over the years. When we mention works on the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historians at Peking University, especially by those i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Peita, or studi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angle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or discuss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represented b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Northern School” usually catches many scholars’ eyes. Studies on the Southern School, however, still wait to be done.

We have such a picture is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 Northern School had long taken the lead in the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ssues brought up by the school gained more attention. Although works on the Northern School also men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latter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the ramification of the former, or the “opponents” of the former. The article shall give a full survey on the Southern School, including what is new and old in both groups, their discourse o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toriography under nationalism, source materials about historical methods, and discourses by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ts. In this research I will paint the picture of the network of the Southern School.

Key Word

The Northern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Southern Network, Nanking Normal College, the Hsueh-heng School

一、引論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北方學統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這裡所謂的北方學統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北方學統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¹，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²；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北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性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一般研究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論著，大抵以影響較大的主流為討論重心，如古史辨運動和中國社會史論戰等主題，即為史學工作者較注意的焦點；個別史家的研究，亦較獲青睞；此固有見於史學發展之主流性，以及史家在時代動盪中孜孜矻矻從事研究的可貴精神，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確然有其深刻之軌跡可循。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主題，美國漢學家Laurence A. Schneider教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³，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

¹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²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³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有：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

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裏⁴；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在方法論的檢討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研究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⁵；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古史學⁶。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初階的研究基礎。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對傅斯年思想的重建，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形成的史料學派，有精闢的分析⁷；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論析史料學派的形成與發展⁸；Axel Schneider教授“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性的探討⁹。

⁴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⁵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15-204。

⁶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⁷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⁸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⁹ 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史觀學派的研究向來較為棘手，因為現實政治常易左右研究的方向，大陸史學工作者礙於意識形態，所論難免偏頗；臺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又係隔岸觀火；目前較具規模的著作是遼耀東教授《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和《史學危機的呼聲》二書，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解經”的觀點，解釋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方式，點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解釋中國歷史時的框限¹⁰；研究社會史論戰及其影響的著作，有 Arif Dirlik教授*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1919-1937》)¹¹，此書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以及中國初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入分析；潘光哲教授〈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源與發展態勢¹²；此外，以陶希聖為首的《食貨半月刊》和在臺灣復刊的《食貨月刊》，代表了以社會經濟為歷史主體之研究方向，這部分的探討尚有許多可以開展的空間¹³。

¹⁰ 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遼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¹¹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¹²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¹³ 陶希聖本人的著作，可以幫助吾人瞭解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如：《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29年初版於上海；《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31年初版於上海；《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方法，杜正勝的討論頗鞭辟入裏，參考：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1991)，25-76；Arif Dirlik的論文亦對陶希聖的歷史研究有所分析，參考：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05-331.

有關現代中國史學人物的研究專著，由於資料集中，而且獲得較易，是截至目前為止相關研究最為蓬勃者，如：王德毅教授《王國維年譜》¹⁴，汪榮祖教授《史家陳寅恪傳》¹⁵，康虹麗女士〈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¹⁶，胡映芬女士〈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¹⁷，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究〉¹⁸，林麗月教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¹⁹，張慧中女士〈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²⁰、李顯裕先生〈陳垣史學探析〉²¹等。

至於論述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專著，出現最早的是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²²，可惜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的顧頡剛，在這本書中雖列舉自 1845 年迄 1945 年間中國各類史學著作，卻未進一步分析著作的特色與價值²³；此外，有類現代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尚有許冠三教授《新史學九十年》，此書將現代中國史學人物分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派”、“史建學派”等加以討論，其中“史料學派”係指傅斯年與陳寅恪，胡適、顧頡剛為“方法學派”，與一般現代中國史學的分類有所不同，而“史觀學派”不及於陶希聖，“史學新義”未論柳詒徵，諸派中均未論及錢穆，反而在“史建學派”中討論殷海光與作者本人，略有析異者多而通同者少之失²⁴。

¹⁴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67）。

¹⁵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¹⁶ 此為康虹麗之碩士論文，發表於《幼獅學誌》，10.2（臺北，1972.06），其後收入：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公司，1980），429-504。

¹⁷ 胡映芬，〈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900-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¹⁸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¹⁹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歷史學報（師大）》，6（臺北，1978.05）：475-489。

²⁰ 張慧中，〈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²¹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²²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案：此書初版於1947年印行。

²³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

²⁴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上述研究現代中國史學之論著，不論學派或個別史家均有一共同之現象：著眼於主流學派或顯而易見之史學發展，而鮮少及於史學之河的深處或其分支。如在上述研究中，唯一論及南方學者的僅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究〉；其餘焦點均集中於北方學派。筆者不願過度誇大現代中國學術的南北之分，但要說完全沒有南北之分，恐亦係掩飾之詞。事實上不論海峽兩岸，都因為北方學派當家，而稍稍忽略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力。筆者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曾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師生們²⁵；如果以 1920 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來看，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應無疑義；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如果說《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那麼，《學衡》雜誌顯然是古典主義的最後堡壘²⁶；如果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那麼，《史地學報》顯然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種南北對峙的情形²⁷，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 1949 年後的海峽兩岸。

雖然南京大學並非就是當年中央大學的後繼者，但浙江大學為中央大學的學術延伸，應為一般熟知現代中國學術發展者的常識；而 1952 年中共高校院系調整後的復旦大學，至少在歷史系部分接收了當年浙江大學的教授們。所以，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到復旦大學

²⁵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²⁶ 沈松僑教授指出，學衡派思想淵源自白璧德(Irving Babbit)的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則師承安諾德(M. Arnold)之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122-133。

²⁷ 北大與南高與的對立是否存在，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文中說：

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見：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9/4710-4718；所引在4712。

這個學術網絡，有明顯的軌跡可循。至於隨中央政府遷臺的學者，北大系統接收臺灣大學，南高系統接收省立師範學院(後來的臺灣師範大學)，亦為眾所周知之事。臺大歷史系與師大歷史系無論在研究領域和治學方法上，顯然有相當程度的差異。至少就中國史研究而言，臺大歷史系強調古代史，師大歷史系集中於中國近現代史，似為毋庸爭辯之事實。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在 1949 年以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新派”史學的來源與三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²⁸。

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則以“傳統派”稱之²⁹。但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學術界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謂的“新派”與“傳統派”(一般亦以北大、南高，或北派、南派稱之)；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不相侔的現象³⁰；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³¹；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

²⁸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378。

²⁹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79。

³⁰ 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1923): 13。

³¹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

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則係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的學者們³²。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卻是以傳統派自居的，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³³。本文的南北學派之分，並不完全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³⁴；因此，在治學方法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在本文中亦列為討論對象，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 1930 年錢穆赴北京後，表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³⁵。桑兵教授在《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³⁶。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亦提及南北之爭，略謂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大量的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的批評非常嚴厲；繆鳳林與鄭鶴聲皆屬中央大學，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³²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80。

³³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80。

³⁴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學術流派間之扞格，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³⁵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³⁶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四新文化運動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林評《東北史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王汎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競爭³⁷。

筆者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做過討論³⁸，但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係，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筆者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們，惟亦僅點到為止³⁹，未曾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 1949 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均具有時代性的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學派的北方學統，總是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歷史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本文擬論析的南方學術網絡，包括：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到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師生們；從中央大學到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的師生們；以及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師生們。

除了學校系所的因素外，本文亦將學術期刊列為分析對象，其中最能代表南方學術網絡的期刊有三：(一)《學衡》雜誌，(二)《史地學報》，(三)《思想與時代》。本文將分析這三分期刊的內容，以了解南方學術網絡的學者們，在文學、思想與史學方面的觀點，並將南方學術網絡與北方學術網絡相比較。

³⁷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數十頁，其缺漏純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³⁸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³⁹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二、南北新舊：傳統與創新

顧頡剛提出“大禹是蜥蜴類”的時間點，正是 1920 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之爭的關鍵時刻。

1920 年代前後的中學學術界，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學衡》雜誌為古典主義的堡壘⁴⁰；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史地學報》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種南北對峙的情形⁴¹，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 1949 年以後的海峽兩岸。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比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在 1949 年以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王汎森教授認為，“新派”史學的來源與 3 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⁴²。

⁴⁰ 沈松橋教授的研究指出，學衡派思想淵源自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則師承安諾德(M. Arnold)之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alism)；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122-133。

⁴¹ 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文中說：「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張其昀先生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1991)，9/4710-4718；所引在4712。

⁴²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78。

有“新派”當然就有傳統派或舊派，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以“傳統派”稱之⁴³。

以今日の後見之明審視現代中國學術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學術界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謂的“新派”與“傳統派”(一般以北大、南高，或北派、南派稱之)；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⁴⁴；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迥不相侔的現象⁴⁵；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則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⁴⁶。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卻以傳統派自居，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⁴⁷。本文的南北學派之分，並不完全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⁴⁸；因此，在治學方法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北方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即屬此類，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⁴³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79；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⁴⁴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⁴⁵ 叔諒直接批評南北之爭云：「近來學術界有一不幸之現象，即老學宿儒往往與新進學者各不相謀。又因地域之睽隔，而各地學者常不能共通聲氣。」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南京，1923.3)：1-14；所引在13-14。

⁴⁶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80。

⁴⁷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80。

⁴⁸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學術流派間之扞格，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 1930 年錢穆赴北京後，表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⁴⁹。桑兵教授在《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⁵⁰。杜正勝教授則指出，錢穆受顧頡剛之邀為《燕京學報》撰稿，卻寫了反對疑古派論點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顯見其與北方學人立異的基本治學觀點⁵¹。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提及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大量的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的批評非常嚴厲⁵²；繆鳳林與鄭鶴聲均出身中央大學⁵³，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

⁴⁹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⁵⁰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⁵¹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216-233；特別是231-232。

⁵²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⁵³ 繆鳳林，字贊虞，1899年生，浙江富陽人。1919年入南京高等師範史地部，師從柳詒徵，1923年畢業。1928年起在其母校國立中央大學任教，講授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日本史。抗戰期間曾任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史地系主任。1948年出任文學院史學系主任，1949年後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國通史綱要》、《日本史論叢》、《中國通史要略》、《中國史論叢》、《中國民族史》、《中國民族文化》等。鄭鶴聲(1901-1989)，浣東泰南村人，1920年夏進南京高等師範文史地部，當時主持文史部教學的老師分別為柳詒徵和竺可楨。畢業論文為《漢隋間之史學》，曾在《學衡》雜誌分期連載，並於中華書局正式出版。1925年應雲南省政府之聘，赴雲南高等師範任教，並兼課於東陸大學(雲南大學前身)。1929年受國民政府大學院之聘，在教育部編審處任編審兼教育部水陸圖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並兼職於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1949年中共建國後，鄭鶴聲任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51年赴山東，先後在華東大學、山東大學任教。並參加教育部中國近代史教育大綱編定委員會。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出版了《孔子與春秋》等著作。早年著作有《正史研究》、《司馬遷年譜》、《班固年譜》、《袁樞年譜》等，

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林評《東北史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⁵⁴，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王汎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競爭。

我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做過討論⁵⁵，惟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連，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此外，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們，惟亦僅點到為止⁵⁶，未曾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 1949 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均具有時代性的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的北方學派，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歷史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本文第四節討論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之說提出問難的劉揆藜，即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亦明顯以南派學者為主體。

1928年起，上海商務印書館將其著作以“鄭氏史學叢書”之名出版；中年以後著作有《中國史部目錄學》、《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並與其兄鄭鶴春合寫《中國文獻學概要》等。

⁵⁴ 吳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陝西涇陽人。1916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17年赴美留學，1921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的作品，下過相當功夫，有過不少論著。1926年回國擔任南高、東南大學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並與劉伯明、梅光迪、柳詒徵等創辦《學衡》雜誌。1924年8月離開南京，先後任東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四川教育學院、西南師範學院等校教授。有關吳宓的生平，請參閱：王泉根，〈吳宓先生年表〉，收入：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480-520；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

⁵⁵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⁵⁶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三、中西文化論述：以《學衡》與《新青年》為分析對象

(一)《學衡》與南方學統

1919年，梅光迪返國後，在上海創辦《民心週報》，針對胡適等人所提倡的白話文及新式標點等運動，發表多篇文章予以批評。1921年，梅光迪力邀吳宓返國擔任南京高師的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並一同加入《學衡》的編輯工作⁵⁷。此時，柳詒徵、胡先驕等人同在東南大學任教，「莫不痛感新文化運動一意毀棄傳統，不免矯枉過正，流弊無窮；又鑑於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競言西學，卻不知究其本原，唯新是驚，往往流於“浮薄怪謬”之說，養成『叫囂浮誇』的習氣，亟思加以匡正，以振溺挽頹，斡旋時運」⁵⁸。因此，劉伯明、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驕等人乃創辦《學衡》雜誌，欲以此拯救中國傳統文化。

在此之前，在美國的一批留學生對於陳獨秀、胡適等人透過《新青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抨擊、徹底否定、破舊立新」⁵⁹以及極力擁護西方文化的態度極為不滿，認為他們「甚為偏激，『更痛感欲融會西方文化，以浚發國人的情思，必須高瞻遠矚，斟酌損益』」⁶⁰。因此，進一步主張應「昌明國粹，融化新知，重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繼承性，在現有的基礎上完善改進」⁶¹。所以，吳宓、梅光迪等人在美國時即決定將來回國之後，擬集合一群同志與胡適、陳獨秀等人捉對鑿戰⁶²。

⁵⁷ 有關梅光迪寄給吳宓的這封信，詳細內容請參閱：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214。

⁵⁸ 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3。

⁵⁹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19。

⁶⁰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29。

⁶¹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19。

⁶² 有關梅光迪與胡適在美國的論爭，請參閱：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100-166。

1919年，梅光迪自美返國，赴天津南開大學擔任英文系主任，同時與聶雲臺等人在上海創辦《民心週報》。在《民心週報》中，梅光迪針對胡適等人所提倡的白話文及新式標點等運動，發表多篇文章予以批評，並曾引起胡適的反駁。1920年梅光迪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理科主任劉伯明之邀，轉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1921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升格為東南大學，梅光迪出任西洋文學系主任。此時梅光迪致函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的吳宓，力邀吳宓返國，以東南大學為聚集同志知友，發展理想事業之地，將聘吳宓為東南大學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並請吳宓擔任即將出刊的《學衡》雜誌總編輯⁶³。吳宓於1921年6月啓程返國，8月抵達上海，9月往南京東南大學。此時，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亦同在東南大學任教。而他們「莫不痛感新文化運動一意毀棄傳統，不免矯枉過正，流弊無窮；又鑑於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競言西學，卻不知究其本原，唯新是驚，往往流於“浮薄怪謬”之說，養成“叫囂浮誇”的習氣，亟思加以匡正，以振溺挽頹，斡旋時運」⁶⁴。因此，劉伯明、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乃創辦《學衡》雜誌，欲以此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之堡壘。

1922年1月《學衡》創刊，初期以月刊的形式出版，迄1926年12月止，均按時出版，共發行60期。《學衡》初期各方俊彥雲集，士氣風發。但這種榮景並未持續太久，1923年底，年僅38歲的劉伯明因患腦膜炎遽逝，使得《學衡》頓時失去來自東南大學校方的有力支持。同時，因為梅光迪與吳宓兩人對於《學衡》欄目內容的安排有不同意見，因此發生激烈爭執。而吳宓直接署名為《學衡》編輯的動作，「違背了《學衡》同人最初的約定，從而引起了力倡學術人格的梅光迪的不滿」⁶⁵，亦為造成梅光迪憤而出走的主因。

⁶³ 有關信件中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1998），24。

⁶⁴ 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3。

⁶⁵ 段懷清，〈梅光迪的人文思想與人文批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1(杭州，2000.02): 17。

他甚至宣稱：「《學衡》內容愈來愈壞，我與此雜誌早無關係矣！」⁶⁶1924年梅光迪離開東南大學，重返美國。另一位重要撰稿人胡先驕，亦於1924年離開東南大學，重回美國。有志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命脈的《學衡》創刊諸子，遂漸分道揚鑣，《學衡》亦面臨存亡之關鍵時刻。此時，吳宓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東南大學，先就聘於奉天東北大學擔任英語系教授，一學期後轉往北京，並於1925年初，受聘負責主持籌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學衡》舊人離散各地之後，《學衡》的運作全賴吳宓一人獨力支撐，即使離開東南大學後，仍由吳宓在北方遙控。1927年，因北伐戰爭爆發，以及原先與《學衡》合作的中華書局不願續辦等原因⁶⁷，使得《學衡》被迫停刊1年。其後在吳宓的條件交換和梁啟超斡旋下，《學衡》於1928年1月復刊⁶⁸。復刊後的《學衡》改為雙月刊，至1929年12月皆能準時出版，因此前後共計發行72期。1930年《學衡》再度停刊一年，1931年1月再度復刊，但在5月發行第75期後，又三度停刊。此後則是不定期出版。1933年7月出版第79期，雖云將改由繆鳳林擔任編輯繼續出版，但自此以後《學衡》遂不再出刊。根據多位學者的研究指出，造成《學衡》解散的原因不外乎人事、經費、以及內部傾軋等三項因素，其中尤以內部傾軋更是造成《學衡》一蹶不振的致命傷⁶⁹。

(二)《學衡》內容分析

《學衡》創刊之初，吳宓等人對於文章的編排即有固定模式，主要欄目包括：插畫，以介紹古今中外的人物為主，間或介紹某些特殊的建築物，「大

⁶⁶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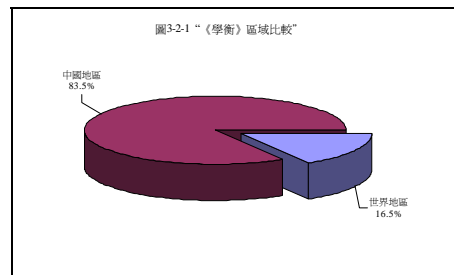
⁶⁷ 有關《學衡》與中華書局之間的合作關係，請參閱：李剛、張厚生，〈《學衡》雜誌初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南京，2002.05): 13-14。

⁶⁸ 有關吳宓此次與中華書局之間的交涉，請參閱：沈衛威，《吳宓傳：泣淚青史與絕望情慾的癡狂》(新店：立緒文化公司，2000)，88-90。

⁶⁹ 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84-85。

抵皆以表明《學衡》立論精神或配合正文內容為主」；通論，「內容多為評論時事、介紹新知」；述學，「內容多屬訓詁、考據、義理等舊學，譯介西方名著者亦多」；文苑，又可細分為文錄、詩錄、詞錄、戲劇、小說等項，內容以傳統詩詞為主，時而穿插若干譯詩與翻譯小說；雜綴，內容多為遊記、詩話等類文章；書評，「所評對象兼及古今著作，尤以詩詞為主」⁷⁰。從 1922 年 1 月創刊到 1933 年 7 月為止，發行時間同樣長達 12 年，刊載的文章高達 1,708 篇⁷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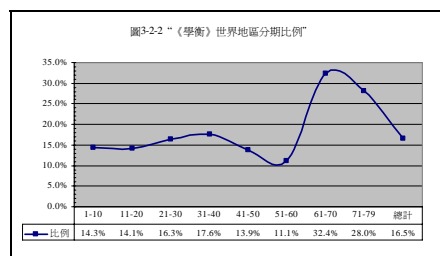
在全部 1,708 篇文章之中，與引介新知相關的文章約有 282 篇，占 16.5%，其餘的 1,426 篇所討論的主題則是以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學術為主的文章，占 83.5%。在這 282 篇引介新知的文章作者群之中，以吳宓所撰寫的 47 篇(16.7%)為最多，其次為張蔭麟的 11 篇(3.9%)、徐震堦的 9 篇(3.2%)、郭斌蘇的 7 篇(2.5%)、向達的 6 篇(2.1%)，其餘的作者均在 5 篇以下，如：景昌極、湯用彤、李思純等的 4 篇，胡先驕的 3 篇，繆鳳林、梅光迪、吳芳吉等的 2 篇。這些引介新知的文章，有多達 135 篇(47.9%)的文章是屬於“插畫”，因此在這部分筆者並未將其作者列入統計之中，但仍將“插畫”列為引介新知的文章，因為筆者認為在這部分仍有其價值、意義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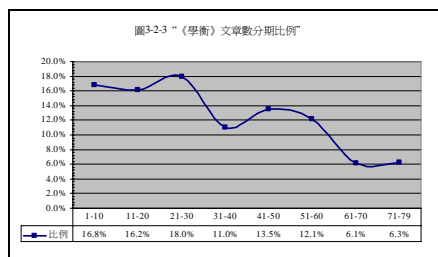
⁷⁰ 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6。

⁷¹ 本文中，《學衡》的統計資料來源是：《學衡》編輯委員會(編)，《學衡》(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本，1971)。在統計過程中，連載的文章其連載次數亦全部計算在內。另外，舊體詩詞以“首”為計算的單位。

而在各卷⁷²之中，與引介新知相關的文章比例均能大致維持在 15% 左右，除了最後 2 卷突然驟升至 32.4% 和 28.0%。筆者認為最後 2 卷中新知引介文章比例驟升的原因，並非是因為引介新知的文章有所增加，相反地，乃是因為非引介新知的文章大幅減少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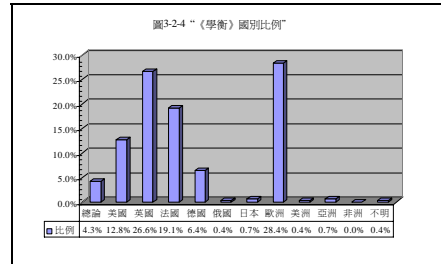


從圖 3-2-3 “《學衡》文章數分期比例”即可看出，第 3 卷之後，《學衡》各卷文章數所占的比例即跌破 15%，到了第 7、第 8 卷時，均較第 6 卷少了將近一半的數量，顯示《學衡》最後 2 卷的文章數嚴重地不足，差不多只剩過去 1 卷的一半而已。在第 6 卷發行之前，《學衡》內部已因為劉伯明的過逝、多位撰稿人的出走，使得《學衡》開始陷入困境之中。在結束第 6 卷的發行之後，又因戰爭、與中華書局間的合作問題等，使得《學衡》被迫停刊 1 年。最後，在吳宓的讓步與梁啟超的斡旋之下，《學衡》才得以復刊。但由於《學衡》既缺少撰稿人，更缺乏經費，復刊後的《學衡》聲勢早已大不如前。因此，在吳宓的勉強維持之下，一期之中甚至只有 4 篇、5 篇、8 篇等個位數字的文章，相對地，單從百分比來算，則引介新知的文章所占的比例自然出現大幅度地提高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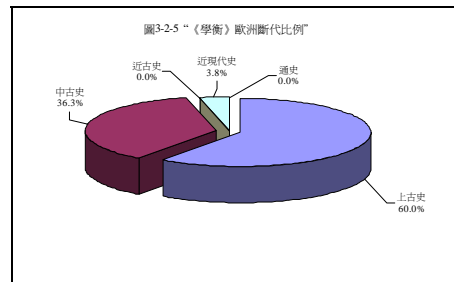


⁷² 此處所指的“各卷”乃是筆者以《學衡》發行10期的數量為一個新單位，所作的劃分。第1卷即代表第1期到第10期，第2卷即代表第11期到第20期，依此類推，直到第8卷代表第71期到第79期為止。以下為行文之便，均以卷作為主要分析單位，特殊情形則會標明期數。作此劃分主要有二大原因：首先是因為79期的《學衡》過於細碎，因此以10期為一單位，所涵蓋的文章數較多，在做統計、分析時亦較容易看出其中的趨勢；其次則是為了便於和《新青年》做比較、分析。

在 282 篇與引介新知相關的文章之中，其來源的國家、地區分佈以歐洲地區的 28.4% 為最高，其次依序是：英國 (26.6%)、法國 (19.1%)、美國 (12.8%)、德國 (6.4%)。



首先，值得特別說明的是有關來自歐洲地區的新知引介。《學衡》在介紹歐洲地區的新知時，其關注焦點在於歐洲的上古和中古史，從圖 3-2-5 “《學衡》歐洲斷代比例”即可明顯看出。其中，上古史所占的比例高達 60.0%，再加上中古史的 36.3%，幾乎就是所有歐洲新知引介的總和。剩下的文章之中，1 篇是托爾斯泰像(Count Lyov N. Tolstoy, 1828-1910)，另外 2 篇則分別是吳宓和李思純個人的歐遊雜詩。之所以呈現出如此情況，和《學衡》的創刊宗旨及其文化觀念有極為密切的關連，而形塑出《學衡》文化觀的重要推手即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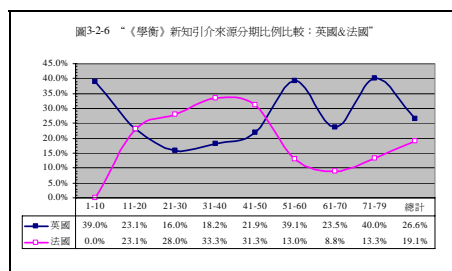
白璧德於 1893 年取得哈佛碩士學位之後，在 1894 年即進入哈佛任教。由於白璧德對於哈佛大學的課程改革極為不滿，並曾對羅馬語言系主任高分貝的批評，此舉更使得白璧德在系上愈形孤立。之後，在好友穆爾(Paul Elmer More, 1864-1937)和學生薛曼(Stuart P. Sherman, 1881-1926)的聲援之下，白璧德才站穩哈佛的教職並逐漸在美國學界取得一席之地。白璧德的思想核心乃是“新人文主義”，強調「古典文化的重要性，希望現代的學生都像以前一樣，經歷古典教育的薰陶，繼承以往的人文傳統」⁷³。因此，白璧德對於希臘、羅馬時期的思想文化極為推崇，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思想亦有不錯的評價。影

⁷³ 王晴佳，〈白璧德與「學衡派」——一個學術文化史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7: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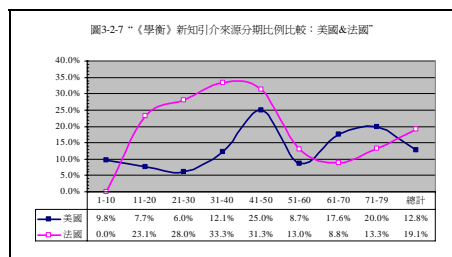
響所及，他的學生對於希臘、羅馬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文化亦投注較多的心力。

反映在《學衡》上，即是集中力量介紹有關希臘、羅馬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文化，例如：刊有多幅有關希臘美術特色的圖片，讓國人得以接觸希臘的藝術；另外，亦連載有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哲學大綱，以及柏拉圖語錄等希臘經典著作。由於白璧德所提倡的新人文主義乃是一種精英主義，強調良好的教育、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而非簡單、膚淺的大眾速食文化。因此，對於歐洲英、法等國的多位文學家、思想家均有不錯的評價，例如：在《學衡》上即曾譯介英國沙克雷的小說及多位英國詩人的作品；另外，亦譯介多篇伏爾泰的小說及其他法國小說家、劇作家的作品。使得英、法兩國能在《學衡》引介新知的文章中分別占有 26.6% 和 19.1% 的高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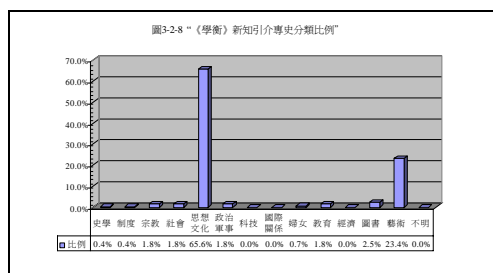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英、法兩國第 1 卷時，英國(39.0%)的比例遠高於法國(0.0%)的比例。但在第 2 卷時，英、法兩國卻同樣占有 23.1% 的比例。此後的 3 卷中，法國占有的比例反倒超越了英國。直到第 6 卷時，英國才又再度取得較高的占有率。最後的第 7、第 8 兩卷，英、法則呈現出同樣的起伏情形。



同時，因為白璧德的緣故使得美國能緊跟在法國之後，占有 12.8% 的比例。並且從圖 3-2-7 “《學衡》新知引介來源分期比例比較：美國&法國”的比較中即可看出，在最後兩卷中美國取代了法國，成為新知引介來源第 3 高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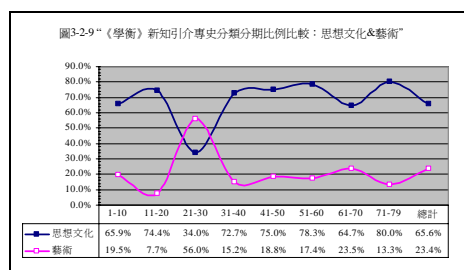


從圖 3-2-8 “《學衡》新知引介專史分類比例”中即可明顯看出，在引介新知的文章專史分類中，“思想文化”占了絕大部分，高達 65.6%。其次則是藝術的 23.4%，其餘的類別所占比例極為有限，均未能超過



5%。筆者認為此一現象顯示出《學衡》乃是集中大多數的力量在思想文化的相關論題上，對於希臘時期、以及英國、法國、美國等地學者的思想論著加以介紹。另一個部分則是著重於藝術、戲劇的介紹，例如對於希臘美術特色的介紹、西方名畫的介紹、西方畫家、戲劇家的簡介、及少數幾篇與戲劇、藝術相關的論著。在第 3 卷時，有大幅對於希臘美術特色的介紹，使得藝術類的文章能突然急遽攀升，並超越思想文化類的文章。

除此之外，思想文化類的文章均能一直維持在超過 50% 以上的高比例。如此，雖能讓讀者獲得大量有關西方的思想文化和藝術方面的知識，但同時也造成《學衡》在文章內容上的侷限。例如：未有對民眾較為關心的經濟、教育、社會、政治等實際問題上有所著墨，因此也就不易拓展讀者人數。甚至會讓部分民眾覺得《學衡》是個空談思想、文化、藝術，不切實際的刊物，那些知識分子盡是些關在象牙塔中，不知民間疾苦的學者。如此一來，對於《學衡》未來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三)從《青年雜誌》到《新青年》

1915 年 9 月，陳獨秀居於上海法租界的有利環境及其努力奔走，成功地

創辦《青年雜誌》⁷⁴。但在1916年2月出版第1卷第6號後，因爆發戰事而陷入困境，遂停刊半年。直至1916年9月才重新復刊，並改名為《新青年》⁷⁵。之後，以“月刊”出版至1922年7月第9卷第6號為止⁷⁶。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運作的考量下，《新青年》宣佈停刊⁷⁷。1923年6月《新青年》再度復刊，並改為“季刊”出版，分別於1923年的6月、12月以及1924年的8月、12月陸續出版4期。1925年4月起，又改為“不定期刊”繼續出版，分別在1925年的4月、6月、1926年的3月、5月以及7月不定期發行，直至1926年7月發行完第5期之後，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再度宣佈停刊。此次停刊為《新青年》正式劃下句點。

《青年雜誌》創刊之始，全由陳獨秀一人獨立編輯而成，僅有同為皖籍的知識分子或是與陳獨秀個人私交甚篤之人給予協助⁷⁸。此外，《青年雜誌》亦深受《甲寅雜誌》的影響，並獲得他們幫助⁷⁹。改名為《新青年》之後，第2、3卷的封面上仍標明「陳獨秀先生主撰」等字樣，可見仍維持由陳獨秀一人獨立負責的情況。

⁷⁴ 陳獨秀之所以能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的原因，不外乎與上海一地的政治、思想、經濟、文化、以及上海當地眾多的知識分子和陳獨秀在此多位朋友的協助有關。詳細的論述請參閱：操國勝，〈《新青年》創辦於上海初探〉，《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贛州，1999): 97-100。

⁷⁵ 陳獨秀於《新青年》第2卷第1號上載有通告云：「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勵，勉副讀者諸君屬望，因更名為《新青年》。」

⁷⁶ 改名為《新青年》之後，除了第4卷第1號(延遲4個月)、第6卷第6號(延遲5個月)、第8卷第1號(延遲3個月)、第8卷第6號(延遲2個月)、第9卷第6號(延遲9個月)之外，其餘均按時以月刊的形式出版。有關《新青年》各卷各號的出版時間，可參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瀋陽：三聯書店，1978)，424-454。

⁷⁷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決定以《嚮導》作為機關報，並將《新青年》予以停刊。參閱：劉德美，〈「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輯·五四運動》，486。

⁷⁸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1992)，1-6。

⁷⁹ 楊琥，〈《新青年》與《甲寅》月刊之歷史淵源——《新青年》創刊史研究之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6: 124-129。

1917年陳獨秀接受蔡元培(1868-1940)的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從第3卷開始，陳獨秀將《新青年》從上海租界帶進了北京大學，《新青年》改在北京編輯，同時，除了原先的皖籍知識分子、《甲寅雜誌》的編輯、作者群之外，更加入了許多北京大學的師生。另外，胡適、錢玄同(1887-1939)、劉復(1891-1934)、沈尹默(1883-1971)、李大釗(1889-1927)等人亦分擔不少陳獨秀在編輯上的辛勞。有了北京大學多方面的支援，使得《新青年》聲勢愈加浩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1920年開始，陳獨秀受到來自蘇聯共產國際魏金斯基的影響，開始致力於從事籌組中國共產黨⁸⁰。同時，在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出版時，陳獨秀已將《新青年》從北京遷回上海，另組“新青年社”以取代過去負責印刷、發行等事務的“群益書社”⁸¹。此舉雖然引發胡適等人的強烈不滿，但陳獨秀依然我行我素，不予理會。因此，《新青年》自發行第8卷第1號開始，即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並開始有系統地介紹有關蘇俄的革命理論以及實際情況⁸²。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新青年》遷到廣州持續出版，直至第9卷第6號出刊之後，立即宣佈停刊。幾經考量之後，又在1923年6月再度復刊。在1923至1926年期間發行共9期的《新青年》，其內容、立場完全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理論性機關刊物，和過去新文化運動時期以“同人雜誌”⁸³型態出現的《新青年》已完全不同。

⁸⁰ 請參閱：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64-67。

⁸¹ 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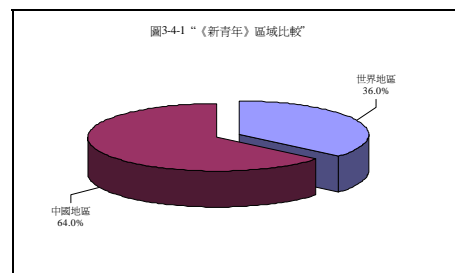
⁸²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上冊，19-20。

⁸³ 陳平原教授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一書中指出：「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報刊，已經大致形成商業報刊、機關刊物、同人雜誌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的運作模式，既基於相左的文化理念，也顯示不同的編輯風格。……至於晚清數量極多的同人雜誌，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願結黨營私，好處是目光遠大，胸襟開闊，但有一致命弱點，那便是缺乏穩定的財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變故，當即『人亡政息』」。請參閱：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62-143；所引在頁64。

(四) 《新青年》內容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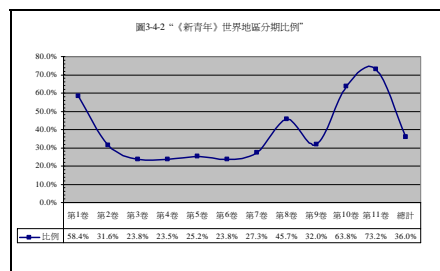
《新青年》從第 1 卷到第 9 卷的發行，在內容的編排上，除了一般通論性、政論性的文章之外，另外設有：通信、讀者論壇、國內大事紀、國外大事紀、隨感錄等較為特殊的欄目刊載記者和讀者的投稿。此外，會以“專號”的形式集中介紹來自西方的思想及各種問題、研究，例如：第 4 卷第 6 號的“易卜生號”、第 6 卷第 5 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第 7 卷第 4 號的“人口問題號”、以及第 7 卷第 6 號的“勞動節紀念號”等；有時則以長時間、大規模的形式針對某一主題予以專門的介紹，例如：“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討論”、“俄羅斯研究”、“羅素著作介紹和評論”、“工讀互助團問題”等。《新青年》以“季刊”和“不定期刊”發行的時候，會以一個明確的主題作為當期的主軸，例如：季刊第 1 期的“共產國際號”，季刊第 4 期的“國民革命號”，不定期刊第 1 期的“列寧號”、以及不定期刊第 5 期“世界革命號”。從 1915 年 9 月《青年雜誌》創刊開始到 1926 年 7 月《新青年》完全停刊為止，發行時間前後長達 12 年，刊載的文章計有 1,419 篇⁸⁴。

在全部的 1,419 篇文章之中，與引介新知相關的文章約有 511 篇，占 36.0%，其餘的 908 篇所討論的主題則是和中國傳統文化或是在中國各地所發生的各種事情為主的文章，占 64.0%。



⁸⁴ 本文中，《新青年》的統計資料來源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424-454。另外，在統計過程中，連載的文章其連載次數亦全部計算在內。

若將《新青年》以“季刊”和“不定期刊”方式發行的部分亦各列為一卷⁸⁵，則各卷中與引介新知相關的文章所占比例最高者為第 11 卷的 73.2%。其次則分別是第 10 卷的 63.8% 和第 1 卷的 58.4%。此一情形恰好與陳獨秀、《新青年》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發展相互吻合。所占比例最高的最後 2 卷，正好是《新青年》轉型成為中共中央理論性機關刊物的時期。因此，在特定的預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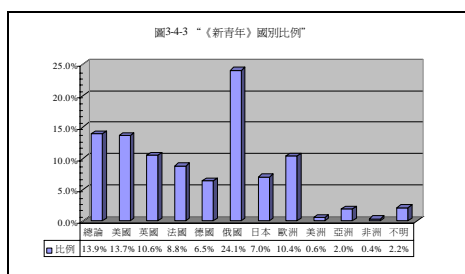
立場操縱下，陳獨秀、瞿秋白、張崧年等人對於馬克思主義、俄國共產革命的理論與實務均不遺餘力大力宣傳。另外，雖然在創刊之初，引介新知的比例即高達 58.4%，但發行第 2 卷時則滑落至 31.6%，之後均維持在 24.0% 左右，直到第 8 卷時，才急遽上升至 45.7%。筆者認為，在創刊之初，陳獨秀等人秉持著在《青年雜誌·社告》中所宣誓的：「本誌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可備攻錯」⁸⁶。因此，創刊之初即致力於新知的引介，使得第 1 卷中半數以上的文章均屬於新知的引介。但隨後因為國內學術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運動、論戰，例如：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反宗教運動、以及東西文化論戰等，知識分子莫不將其全身精力投入其中，自然對於新知的引介有所忽略，因此第 2 卷即下滑了 26.8% 之多，第 3 卷又再小幅下滑 7.8%，但在隨後發行的《新青年》之中，均能維持在 24.0% 左右的文章數量於新知的引介。直到發行第 8 卷(1920 年 9 月-1921 年 4 月)時，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陳獨秀不顧胡適等人的反對，將《新青年》從北京遷回上海，並把《新青年》改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開始針對俄國共產革命的理論與實務加以介紹，例如：從第 8 卷第 1 號開始出現的“俄羅斯研究”便是大量介紹與俄國

⁸⁵ 為行文之便，筆者將改稱以“季刊”發行共4期的《新青年》為第10卷，以“不定期刊”發行共5期的《新青年》為第11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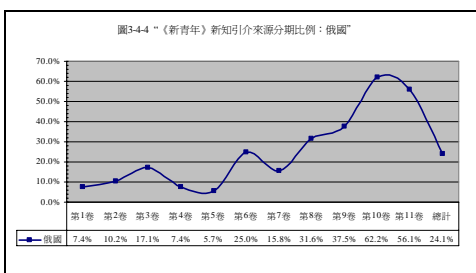
⁸⁶ 《青年雜誌·社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382。

相關的各項事務，使得第 8 卷中引介新知的比例迅速回升至 45.7%。此一現象再度說明，《新青年》在引介新知這一部分和創刊人陳獨秀以及中國共產黨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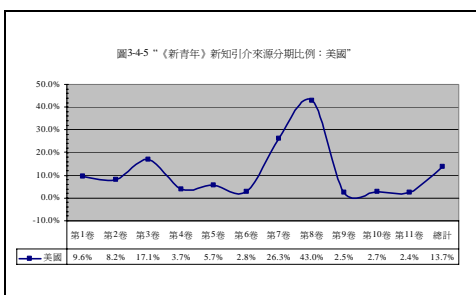
在 511 篇與引介新知相關的文章之中，其來源的國家、地區分佈以俄國的 24.1% 為最高，其次分別是總論的 13.9%、美國的 13.7%、英國的 10.6%、以及歐洲地區的 10.4%⁸⁷。俄國高居新知引介來源的榜首，與當時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創刊人陳獨秀的主導、以及日後成為機關刊物的需要等均有一定程度的關連。



從圖 3-4-4 “《新青年》新知引介來源分期比例：俄國”來看，俄國地區的新知引介大致呈現向上攀升的趨勢，尤其是從第 7 卷開始更是快速爬升，到第 8 卷時正好成長了兩倍之多，之後仍持續向上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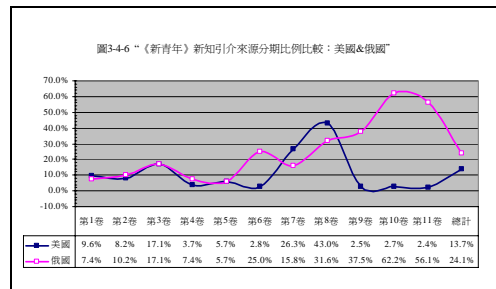
另外，美國亦占有 13.7% 的比例，與第 2 名的總論僅有 0.2% 的差距而已。美國之所以能占有如此之高的比例，胡適的宣傳和影響功不可沒。另外，美國學人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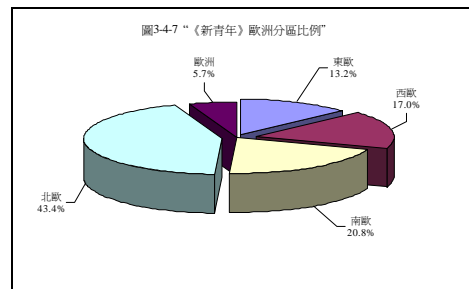
⁸⁷ 筆者在此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等六個引介新知的主要國家獨立出來統計、說明，其餘的國家因為數眾多無法在此一一列出說明，僅以歐洲、美洲、亞洲、非洲等四大地區予以概括，而此四大地區的統計則不再包含上述六個國家。另外，總論乃指全面性、綜論性的介紹文章，而無專門、特定的國家、地區屬性。

等的相繼來訪，亦使得美國新知在中國成爲一股熱潮，知識分子莫不熱衷於美國新知的介紹，圖 3-4-5 “《新青年》新知引介來源分期比例：美國”中所顯示的曲線更加清楚地呈現出此一情形。由於他們的來華均約在 1919 年 5 月至 1921 年 7 月的這段時間之內，因此這段期間內所發行的《新青年》第 7、第 8 卷，在美國新知的引介上有極爲顯著地成長，從原先 10% 以下的比例突然飆升到 26.3%，第 8 卷時更達到 43.0% 的高峰，較同卷中的俄國高出 11.4% 之多。

但在此之後，胡適與陳獨秀兩人對於《新青年》未來的發展方向產生嚴重的歧見，而最後是由陳獨秀成功地將《新青年》帶向中國共產黨的懷抱之中。因此，在往後 3 卷的《新青年》中，美國地區的新知引介驟降至 5% 以下，與俄國地區的高比例呈現明顯地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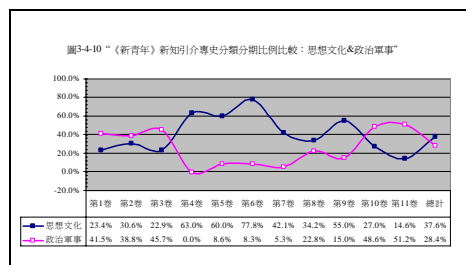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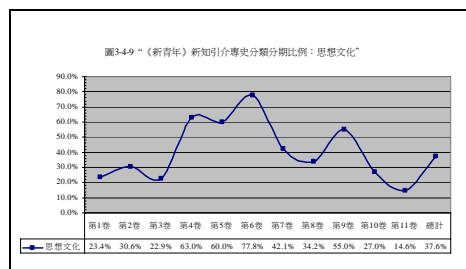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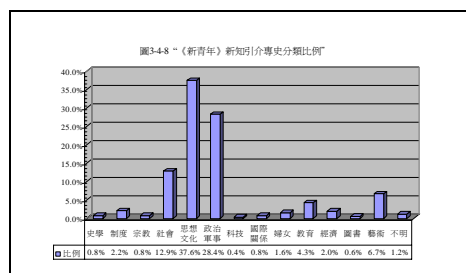


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占 10.4% 的歐洲地區。歐洲地區之所以能占有高於法國(8.8%)、日本(7.0%)、和德國(6.5%)的比例，筆者認爲原因在於胡適等人對於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的關注以及第一次大戰的引爆點，南歐地區，的重視有密切的關係。從北歐地區所占將近一半的比例(43.4%)，以及南歐地區高達 20.8% 的比例來看，即可了解到當時知識分子對於這兩個地區的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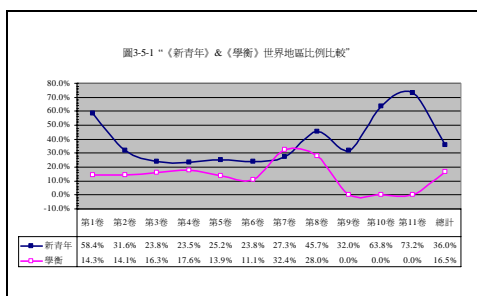
而在引介新知文章的專史分類上，當以思想文化類占有最大的比例，高達 37.6%。其次依序為：政治軍事(28.4%)、社會(12.9%)、藝術(6.7%)、以及教育(4.3%)等。專史分類中“思想文化”所占的比例高達 37.6%，與過去傳統印象中，知識分子在此時大量輸入國外的主義、思想正好不謀而合。尤其從第 4 卷(1918 年)開始直到第 6 卷(1919 年)為止，思想文化所占的比例(63.0%、60.0%、77.8%)均超過一半以上，恰好說明此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的高峰期。所占比例位居第 2 的政治軍事類文章，呈現出的曲線正好和思想文化大致形成相互對應，一高一低的情況。正當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思想文化類的新知成爲知識分子們的最愛，而政治軍事類則在谷底盤旋。從第 8 卷(1920 年)開始，由於《新青年》本質的不變，除了理論的宣傳之外，實際的革命行動獲得重視，因此政治軍事類有逐漸回升的情形，思想文化類則漸趨下降，從第 9 卷開始到最後的第 11 卷，各地激進的革命運動、政治理論成爲《新青年》宣傳的重點，因此，政治軍事類在這 3 卷之中均高出思想文化類許多，差距分別高達 40.0%、21.6%和 36.6%。

其他有關社會、藝術、以及教育類的新知則與當時中國的需求有著密切的關連。例如：當時對於戲劇的討論、教育改革的期望等均是促成知識分子搜尋相關主題並將之介紹至中國的重要因素。



(五)《學衡》與《新青年》的比較

《新青年》和《學衡》兩者在引介新知的文章比例上有不小差距。雖然《新青年》各卷之間所占的比例起落較大，但大致上都能維持在 23.5% 以上的水準，整體說來也還有 36.0% 的比例。反觀《學衡》，除了最後兩卷高於 20% 之外，其餘各卷所占比例均低於 20%。在第 7 卷時，勉強因為《學衡》文章數銳減的原因，讓引介新知的文章比例急速攀升，而超越《新青年》



之外，《新青年》均能在各卷的引介新知文章比例上高於《學衡》。因此，《新青年》在引介新知這方面的工作上尚能符合他們自己所宣稱的：「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可備攻錯」⁸⁸。或許吳宓等人會強調：《新青年》所宣傳的新知並非是西方的精華所在，僅是糟粕而已，而《學衡》介紹的新知才是真正西方文化的精華所在。但不管引介的新知是好是壞，能否為人所接受、讓人所吸收並進而產生影響力，才是最重要的。倘若一開始即為人所排斥，即使傳入的新知再好仍舊無用武之地。不管如何，至少《新青年》在當時，為資訊不發達的中國打開了認識西方的一扇窗，也為邁向現代化的中國找尋了許多可供參考的選項。

⁸⁸ 《青年雜誌·社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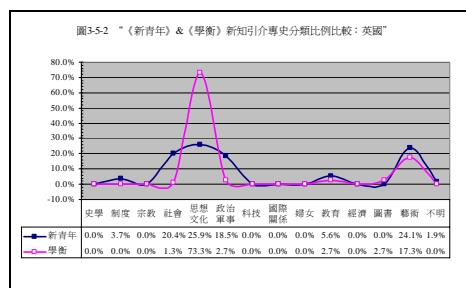
其次，雙方在引介新知的來源上亦有顯著的差別。從表 3-5-1：《新青年》&《學衡》新知引介來源排名即可發現，前後名次的排列極為不同，而能同時受到雙方青睞的地方則包括：美國、英國、以及歐洲地區。但這三個地方的排名在兩者之中，恰好呈現相反地狀態。在《新青年》中，是以美國(13.7%)、英國(10.6%)、歐洲(10.4%)的順序排列下來，而《學衡》卻以歐洲(28.4%)、英國(26.6%)、美國(12.8%)的形式排列下來。除了排列順序的差別之外，雙方對於這三個地方所引介的新知在內容、時間點上亦有不小的差距。

表 3-5-1：《新青年》&《學衡》新知引介來源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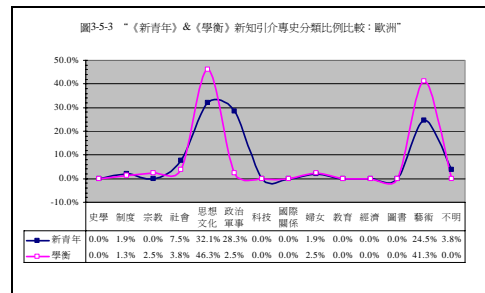
排名	《新青年》	比例	《學衡》	比例
1	俄國	24.1%	歐洲	28.4%
2	總論	13.9%	英國	26.6%
3	美國	13.7%	法國	19.1%
4	英國	10.6%	美國	12.8%
5	歐洲	10.4%	德國	6.4%
6	法國	8.8%	總論	4.3%
7	日本	7.0%	日本	0.7%
8	德國	6.5%	亞洲	0.7%
9	不明	2.2%	俄國	0.4%
10	亞洲	2.0%	美洲	0.4%
11	美洲	0.6%	不明	0.4%
12	非洲	0.4%	非洲	0.0%

《新青年》引介的美國新知，主要集中在美國的現代思想上，尤其是胡適的老師杜威和美國學者羅素的思想，另外則是廣泛介紹有關美國的政治局勢，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關美國總統的演說及其軍事行動等。而《學衡》在引介美國新知時，則集中在吳宓等人的老師，白璧德的思想，及其好友、學生等同為美國新人文主義代表的學者身上。因此，雙方所分別引介的美國思想，即已在美國思想界相互爭辯以久的論敵，雙方對文化抱持不同觀點的論辯從美國思想界，經由《新青年》和《學衡》的引介，漫延至中國思想界，結合中國傳統的思想，引發不少的爭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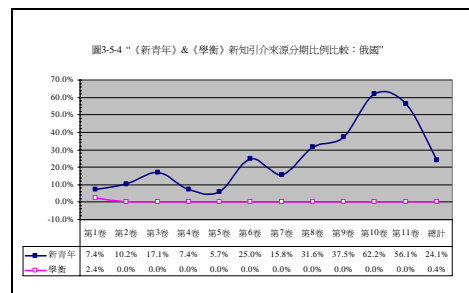
在對英國地區的新知引介上，《新青年》中所刊載的文章類形較為平均，包括了：思想文化(25.9%)、藝術(24.1%)、社會(20.4%)、及政治軍事(18.5%)等文章，讓讀者能廣泛地了解來自英國地區的新知。而《學衡》即是明顯地集中於思想文化(73.3%)和藝術(17.3%)的文章之上，其餘分類的文章則幾乎付之闕如。



至於引介來自歐洲地區的新知，則是雙方在引介新知的來源上最大的差異之一。除了雙方之間引介的數量差距多達 18.0%(《新青年》：10.4%、《學衡》：28.4%)的比例，僅次於雙方在俄國地區的差距(《新青年》：24.1%、《學衡》：0.4%，相差 23.7%)，之外，雙方在引介的內容上及時間點上更是有極大的差異。在內容上，《新青年》引介的內容主要是在思想文化(32.1%)、政治軍事(28.3%)和藝術(24.5%)等類別之上，3 項合計高達 84.9%的比例，而《學衡》的分佈則更形集中，幾乎完全集中在思想文化(46.3%)和藝術(41.3%)這兩類的文章之上，2 項合計更高達 87.6%。相較於大幅集中於思想文化和藝術兩類文章的《學衡》，《新青年》多了對於政治軍事類的介紹，筆者以為這與《新青年》發行時所身處的時代背景具有密切的關連。眾所周知，《新青年》發行的時間橫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難免會對這場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場，歐洲，尤其是南歐地區多所著墨，所以有關政治軍事的介紹也多僅限於第 1 卷之中，其餘各卷亦對於歐洲地區的政治軍事介紹幾乎付之闕如。此外，在時間點上，兩者之間的時間差則多達一、二千年。《新青年》介紹的歐洲新知多半均是 18、19 世紀以來的文學小說及戲劇，而《學衡》則因獨特的文化觀念，特別著重於西洋上古史、中古史的引介，因此對於西方文明的發祥地，歐洲，有較多的介紹，近現代的西方介紹則著重於他們的思想導師，白璧德，及其好友、學生等人，所以焦點即從歐洲地區轉移到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範圍之中。



而雙方在引介新知的來源上，最大的差異即是對於俄國地區介紹的多寡。《新青年》發行時，正值西方社會思想、馬克思主義風起雲湧之際，與此同時，俄國正好發生共產革命，並



不斷向中國示好，使得知識分子在唾棄壓迫中國的西方列強時，對俄國具有較好的評價與接受度，並極欲了解俄國的實際情形，冀望是否能對改善中國現狀、提升中國國力有所幫助。是故，在此時代背景之下，《新青年》對於引介俄國地區的新知不遺餘力。相較於此，《學衡》的創刊人在創刊之初，即鎖定目標，針對胡適、陳獨秀等人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予以抨擊。再加上承繼白璧德的文化觀，並致力於宣揚師說，因此，即對歐洲上古、中古時期以及美國、英國、法國等地具有西方文化、歷史傳統的人文思想、文學戲劇予以介紹，而對於其他國家如：俄國、日本、德國、亞洲地區等地均略而未詳。也就造成雙方在對俄國地區的新知引介上有如此之大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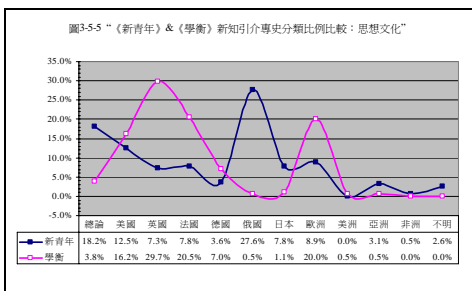
另外，雙方在引介新知的專史分類比較上，大致與歐洲地區和英國的專史分類比較大同小異。總和來說，除了思想文化、政治軍事，又多了社會一類的比例超過 10%，到達 12.9%。而藝術一類的比例仍有 6.7%，勉強擠上前 5 名的還有教育類的 4.3%。基本上，《新青年》所引介的專史類別均與中國當時的實際需求、國際環境局勢等有所聯繫。反觀《學衡》則完全集中在思想文化(65.6%)和藝術(23.4%)這兩類的文章之上，其餘的各項類別，除了圖書占有 2.5%的比例之外，均未能超過 2%的比例，政治軍事、教育、宗教、社會等 4 項也僅占 1.8%而已。

雙方在專史分類上的最大共通點，即是對於思想文化類的高比例引介。《新青年》引介的思想文化類文章，內容多半集中於美國、俄國學者的思想論著以及俄國、日本的文學小說等。相較於此，《學衡》所引介的

表 3-5-2：《新青年》&《學衡》專史分類排名

排名	《新青年》	比例	《學衡》	比例
1	思想文化	37.6%	思想文化	65.6%
2	政治軍事	28.4%	藝術	23.4%
3	社會	12.9%	圖書	2.5%
4	藝術	6.7%	政治軍事	1.8%
5	教育	4.3%	教育	1.8%
6	制度	2.2%	宗教	1.8%
7	經濟	2.0%	社會	1.8%
8	婦女	1.6%	婦女	0.7%
9	不明	1.2%	史學	0.4%
10	史學	0.8%	制度	0.4%
11	宗教	0.8%	科技	0.0%
12	國際關係	0.8%	國際關係	0.0%
13	圖書	0.6%	經濟	0.0%
14	科技	0.4%	不明	0.0%

圖3-5-5 “《新青年》&《學衡》新知引介專史分類比例比較：思想文化”



思想文化類文章則限於美國白璧德的思想論著、英、法等國的文學小說、及多篇的西洋上古、中古的經典著作。

其次，早期《新青年》引介的政治軍事類文章，主要集中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國際局勢、軍事戰爭等的宣傳。後期《新青年》的政治軍事類文章，則轉而著重於俄國的政治革命以及各地的民族革命等與俄國輸出的共產革命相關的議題。而《學衡》中占第 2 高比例的藝術類文章，則多半為西方著名的畫作、藝術品、或是重要的文學小說家、劇作家的圖像等，有些還輔以簡單的文字說明，可供讀者參考。其餘僅剩少數幾篇介紹西方文學理論、戲劇理論、及現代西方學者著作的書評等文章。

(六)小結

《新青年》的發行代表著中國從此時開始，正朝向一個新時代邁進。知識分子透過與傳統完全不同的方式，為中國尋找一條富強的道路。由於《新青年》的價值觀屬於求新求變、追求現代化的，發表的諸多文章恰好符合多數社會大眾的需求，因此引導當時學界的討論主流，並同時在社會上占有極大的影響力。而《新青年》引介的新知正好符合社會大眾的需要，並且捉住時代的脈動，因此，能和多數人產生共鳴，形成一股風潮。《新青年》的發行量從創刊之初的 1,000 份，在短短時間之內立即爆增至 15,000 份⁸⁹，可見其廣泛的影響力，著實為中國帶來不小的震撼。尤以其對馬克思主義、俄國共產革命的引介對中國日後的歷史發展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不管是福還是禍，至少《新青年》為中國的現代化盡了它最大的努力。

在《新青年》所有刊載的 1,419 篇文章之中，內容屬於引介新知的文章占有 36.0%。除了第 1 卷(58.4%)、第 10 卷(63.8%)、第 11 卷(73.2%)因特殊因素所造成的高比例之外，其餘各卷新知引介文章的比例均維持在 25.0% 上下。而

⁸⁹ 劉德美，〈「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輯·五四運動》，483。

從引介新知的來源來看，當以俄國(24.1%)為最多，其次依序為：總論的 13.9%、美國的 13.7%、英國的 10.6%、以及歐洲地區的 10.4%。俄國高居新知引介來源的榜首，與當時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創刊人陳獨秀的主導、以及日後成為機關刊物的需要等均有一定程度的關連。美國的高比例當然與胡適的宣傳和影響有著直接的關連，另外，美國學人杜威、羅素等的相繼來訪，亦使得美國新知在中國成為一股熱潮，知識分子莫不熱衷於美國新知的介紹。若從專史分類的角度來看，則以占有 37.6% 的思想文化類文章為最多，其次依序為：政治軍事(28.4%)、社會(12.9%)、藝術(6.7%)、以及教育(4.3%)等。此一現象與中國的現實社會環境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思想文化類的文章占有高達 37.6% 的比例，與過去傳統印象中，知識分子在此時大量輸入國外的主義、思想正好不謀而合。尤其從第 4 卷(1918 年)開始直到第 6 卷(1919 年)為止，思想文化所占的比例均超過一半以上(第 4 卷：63.0%、第 5 卷：60.0%、第 6 卷：77.8%)，恰好說明此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的高峰期。正當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思想文化類的新知成為知識分子們的最愛，與此同時，政治軍事類的新知則未受到知識分子們的青睞仍持續在谷底盤旋，所占的比例均低於 10.0%。但從第 8 卷(1920 年)開始，由於《新青年》本質的丕變，除了理論的宣傳之外，實際的革命行動亦獲得重視，因此政治軍事類有逐漸回升的情形，思想文化類則漸趨下降，從第 9 卷開始到最後的第 11 卷，各地激進的革命運動、政治理論成為《新青年》宣傳的重點。因此，政治軍事類的文章成為此時《新青年》的要角。其他有關社會、藝術、以及教育類的新知則同樣與當時的中國需求有著密切的關連。例如：當時對於戲劇的討論、教育改革的期望等均是促成知識分子搜尋相關主題並將之介紹至中國的重要因素。

反觀《學衡》的發行，則代表著一群同時兼具中國傳統學術訓練和西方新式教育洗禮的精英分子，眼見日益凋零的中國文化發出強烈的怒吼。由於《學衡》所強調的價值觀並未與多數的社會大眾產生共鳴，因此，難以在社會上形成共識並具有引導思潮的作用。但若將《學衡》的所有作者一字排開，他們堪稱當時中國優秀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大部分的人除了具備深厚的國學

底子之外，更曾長年在海外求學，深受西方新式高等教育的嚴格訓練。這麼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在面臨中國未來何去何從的歧點時，他們選擇對中國傳統文化多一分尊重、少一分鄙視，對西方文化多一分保留、少一分盲從。但這種態度卻未能在當時引起多數人的重視及共鳴，因此他們一路走來倍感艱困，依舊抵擋不了時代的洪流，而淹沒於其中。

《學衡》在引介新知的取向和《新青年》略有不同，雖然有些地區、專史分類是相同的，但在內容和時間點上，彼此之間卻有著極大的差異。在《學衡》全部的 1,708 篇文章之中，新知引介的文章占有 16.5%。除了最後 2 卷因為文章數過少的原因造成比例的飆高(第 7 卷：32.4%、第 8 卷：28.0%)之外，其餘各卷均只維持在 15.0% 上下。在引介新知的來源方面，以歐洲地區(28.4%)為最多，其次依序是：英國(26.6%)、法國(19.1%)、美國(12.8%)、德國(6.4%)。在介紹歐洲地區的新知時，《學衡》關注的焦點在於歐洲的上古(60.0%)和中古(36.3%)這兩段時期，並集中力量在介紹有關希臘、羅馬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文化。對於英、法兩國的文學小說、哲學思想、戲劇作品等亦有不少篇幅的專門介紹。引介自美國地區的新知，則集中在吳宓等人的老師，白璧德的思想，及其好友、學生等同為美國新人文主義代表的學者身上。從專史分類的角度來看，無可置疑地，思想文化(65.6%)占了絕大部分，其次則是藝術(23.4%)，其餘的類別所占比例極為有限，均未能超過 5%。此一現象乃是基於《學衡》特殊的文化觀點所形成的，同時也深受白璧德思想觀念的影響，因此在創刊之初即早已預設《學衡》的方向、目的地、宗旨。在專史分類上，《學衡》乃是集中大多數的力量在思想文化的相關論題上，對於希臘時期、以及英國、法國、美國等地學者的思想論著加以介紹。另一個重點則是藝術、戲劇的介紹，例如對於希臘美術特色的介紹、西方名畫的介紹、西方畫家、戲劇家的簡介、及少數幾篇與戲劇、藝術相關的論著。其餘分類的文章則幾乎付之闕如，極為缺乏。

從新知引介的量來看，《新青年》以平均 36.0% 的比例較《學衡》的 16.5% 高出一倍以上，顯現出《新青年》的作者群們在這方面所投注的心力與努力。

同時，不可諱言地，他們引介進來的新知對中國日後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其中更以俄國新知引介所擦出的火花最為驚人。這也是《新青年》與《學衡》最大的差異之一，《新青年》新知引介來源以俄國的 24.1% 高居所有新知來源的第 1 位；而《學衡》新知來源則以占有 28.4% 的歐洲地區為首。另外，雖然在排名和比例上略有差別，但美國（《新青年》：排名第 3，占 13.7%；《學衡》：排名第 4，占 12.8%）與英國（《新青年》：排名第 4，占 10.6%；《學衡》：排名第 2，占 26.6%）則是同時受到雙方青睞的新知來源地區。在專史分類上，雙方同樣對思想文化類的文章具有高度的偏好。但不同的是《新青年》除了思想文化(37.6%)之外，對於政治軍事(28.4%)、社會(12.9%)、藝術(6.7%)等議題仍有一定程度的關注，還有些許小規模的報導。反觀《學衡》，除了集中在思想文化(65.6%)和藝術(23.4%)之外，其餘的議題僅是零星的幾篇文章而已，而科技、國際關係、以及經濟類的介紹文章更是未曾出現。

透過新知引介的來源以及專史分類這兩種分析的方式，將《新青年》和《學衡》的部分內容以量化的方式呈現出來，或可為日後的研究者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資料。

四、《史地學報》與反古史辨運動

（一）《史地學報》的創立及其組織

《史地學報》是“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史地研究會則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及其他科系所聯合組成的學生組織⁹⁰，以研究史地為宗旨。史地研究會的成員，基本上是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學生為主，再加上其他科系學生所組成，因此其職員皆為學生，組織則為總幹事制。史地研究會的前身為“地學研究會”，在地學研究會時代，首任總幹事為龔勵之，第

⁹⁰ 史地研究會簡稱為“史地會”，該會內部文件或自稱時為“史地會”，對外則稱“史地研究會”，《史地學報》上的編輯單位即為“史地研究會”。

二屆為諸葛麒，而即在諸葛麒擔任總幹事的第二屆通過簡章，改名為史地研究會，並請柳詒徵、朱進之與童季通擔任指導員，因此，地學研究會的第二屆即為史地研究會的第一屆。

史地研究會的第二屆總幹事為陳訓慈，會員 62 人，請柳詒徵、徐則陵和竺可楨等三人擔任指導員。第二屆史地研究會主要的工作內容有兩項：其一是地質考察，其二為會刊之籌備。但《史地學報》並未在第二屆手中誕生，而是到了第三屆才正式出版⁹¹。

由於史地研究會前兩屆的職員錄並未公布，其組織結構如何無法瞭解，第三屆以後因出版《史地學報》，雜誌上陸續刊載史地研究會的會議紀錄，以及會員錄與職員錄，對於史地研究會的情形或可藉以瞭解一二；史地研究會第三屆的職員組織如下：

總幹事：胡煥榮

副總幹事：錢堃新

幹事：王學素 陳旦

總編輯：張其昀

編輯：諸葛麒 繆鳳林 邵 森 謝 群

書記：陳訓慈 景昌極 趙祥瑗 王玉璋 唐兆祥 王 庸

會計：何惟科⁹²

會員方面基本上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科學生為主，但從會員錄來看，似乎並非所有文科學生都加入史地研究會，而係以個人興趣為依皈⁹³。地學

⁹¹ 《史地學報》，1.1: 198。

⁹² 《史地學報》，1.1: 199。

⁹³ 史地研究會第3屆會員名單如下：

方培智 王玉章 王學素 王錫睿 王 庸 仇良虎 田耀章 何惟科 吳文照
周光倬 胡煥榮 范希曾 姜子潤 徐景銓 徐啟銘 徐震愕 袁鵬程 夏崇璞
唐兆祥 孫士柝 黃英偉 陸鴻圖 張廷休 張其昀 陳訓慈 景昌極 楊 楷
趙鑑光 劉文翻 錢 新 盛奎修 高國棟 繆鳳林 羅會灃 諸晉生 諸葛麒
(以上文二)

王煥鑣 束世激 周 慤 邵 森 芮九如 馬繼援 汪章才 陳兆馨 張遠如

研究會初成立於 1919 年 10 月，至 1921 年 11 月創刊《史地學報》，1926 年 10 月出版第 4 卷第 1 期停刊，總計近五年時間共出版 20 期雜誌。《史地學報》文稿之分類，刊登於 1 卷 3 期的〈編輯要則〉有詳盡的說明。

這篇〈編輯要則〉大體表明了《史地學報》的內容與編輯宗旨，其文類計分 19 類，另加卷首插圖共為 20 類，細目為：1. 評論；2. 通論；3. 史地教學；4. 研究；5. 古書新評；6. 讀書錄；7. 雜綴；8. 世界新聞：(A) 時事紀述(B) 地理新材料(C) 中外大事記；9. 氣象報告；10. 書報介紹；11. 史地界消息；12. 調查；13. 史地家傳記；14. 譚屑；15. 專件；16. 選錄(仿《東方雜誌》最錄之意，酌量轉載關於史地之文字)；17. 書報目錄：(A) 書籍(B) 雜誌(C) 論文；18. 會務(紀錄，會員錄，職員錄)；19. 通訊⁹⁴。但並非每期雜誌均完全包含上述內容，而是視來稿情形有所調整⁹⁵。至於《史地學報》的編輯旨趣，在這篇〈編輯要則〉中，也說得很明白⁹⁶。

《史地學報》的創立，基本上是在五四的學術風氣下形成的，而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則與兩條線索有密切關連，其一是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再生，其二為西方學術思想的引進，這兩條線索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事實上，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本即在傳統與西方間找尋未來的可能方向，做為五四時期史

陸維釗 黃應歡 閔毅成 彭振綱 楊受慶 楊承奐 潘葆煌 趙祥瑗 劉啟文
鄭沛霖 龍文彬 謝 群 陳 旦 尤廷堅 (以上文一)
林 超 李漢信 陳 忠 陳家棟 曹銓樓 (以上他科) (《史地學報》，1.1: 199)

⁹⁴ 《史地學報》，1.3: 頁前6之2。

⁹⁵ 《史地學報》，1.3: 頁前6之2。

⁹⁶ 〈編輯要則〉云：「同人深維史地之學，一由時間之連續，示人類之進化；一由空間之廣闊，明人類與自然界之關繫。其博大繁賾，實超其他科學。而就其近者言之，則一事一物，莫不有其源流與其背景，果屏斯二者，即不足曉事物之真，更無由窺學術之全。是以各種學問，靡不有所憑於史地；而史地之可貴，亦要在出其研幾所得，供各學科之致用。此所以西洋自然科學發達，而史學地學與之偕進而無已也。吾國自黃帝置史，大禹敷土，史地之學，肇端特早。祇以科學不進，實學沉澗；故史籍雖富，史學不昌；地志圖表，尤闕精進。遂使先民之緒，墜而不振，昌明光大，歸美白人，近年以還，國人盛言西學，談論著述，蔚為巨觀。顧於真實之學，輒相畏避，史學地學，尤稀過問。新說之灌輸無聞，舊籍之研求日荒，懷古例人，寧非大恥。同人等問學旨趣，偏此二學，心痛現狀，爰布茲冊，將以求正有道，希助友聲，以共闡前古之積緒，而期今後之精進。」《史地學報》，1.3: 頁前6之1。

學代表性刊物之一的《史地學報》，一方面承繼了傳統中國史學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嘗試向西學取經，其間的過程是相當微妙的：中學和西學之間有沒有衝突？在涵泳舊學與介紹新知之間，史地學報派如何找到平衡點？

《史地學報》的創立直接間接與 1919 年的巴黎和會有關，因為正是巴黎和會討論有關山東歸還問題，引發了現代中國史上有若狂濤巨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嘗試各種思想文化發展的可能，《史地學報》冀期藉歷史地理學的實用性，以為外交上折衝尊俎之後盾，亦惟其中的一個可能方向而已。

史地研究會第四屆因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科改為史地科，會員大部分為史地科學生；至於指導員方面主要的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教授，到第五屆以後則有其他學校的教授加入陣營，並且視情況有所而增加。

雖然主要幹部並無太大變動(此處指工作有所調整，主要職員仍是原來幹部的職務調動而已)，但第五屆的組織可能是因應業務之需要略有調整，其調整的職務包括增設發行主任，將總編輯改為編輯主任⁹⁷；指導員除原有者外增加了陳衡哲、曾膺聯和蕭叔綱三位。而且因為編輯的刊物增為兩期⁹⁸，因此改採分工方式進行⁹⁹。

⁹⁷ 第5屆的職員錄組織如下：

總幹事：胡煥庸

副總幹事：張其昀

編輯主任：陳訓慈

編輯：諸葛麒 向達 陸維釗 吳文照 仇良虎 陳人文 范希曾 景昌極 謝群

發行主任：諸葛麒

幹事：周光倬 繆鳳林 (《史地學報》，1.3: 267)

⁹⁸ 在第5屆以前，史地研究會編輯《史地學報》是1屆編輯1期，第5屆以後改為2期，仍為季刊；至第6屆(即2卷1期)以後改為月刊，但實際上是1年出8期。

⁹⁹ 編輯主任陳訓慈在1922年6月15日的編輯報告中說：

本屆編輯事宜，因所編輯增至兩期，經過略為繁複；爰撮述大略，以報告於會員諸君。

I.編輯職員：本部設編輯主任一人，編輯八人。關於本學報編輯事宜皆分工進行。(如世界新聞，大事記，消息等欄)。……II.編輯範圍：本屆編輯事宜，即《史地學報》第三期第四期。III.編輯會議：編輯會議，由編輯九人及正副總幹事二人組成之。本屆自

第六屆史地研究會的組織又略有變動，增設一總幹事，取消副總幹事；編輯主任復稱為總編輯；取消發行部，增設調查部、出版部與圖書部¹⁰⁰；增設調查部的動機主要可能是為了實地考察的需要。

在第六屆職員錄中，鄭鶴聲和向達已經列為新職員了，而諸葛麒則是第三度擔任總幹事，張其昀二度擔任總編輯，王學素、繆鳳林、陳訓慈、景昌極、胡煥庸、仇良虎、周 、陸維釗等人都繼續擔任重要職務，可見史地研究會的主要幹部，有其穩定的持續性。本屆比較值得注意的有兩件事，一是調查部的成立，說明了知識分子到民間去的風氣在史地研究會起了作用¹⁰¹；另一為《史地學報》自 2 卷 1 期起每期於雜誌上刊載南京地區的氣候報告，並且呼籲全國各地有興趣者共襄盛舉¹⁰²，冀期從氣候與植物的考察，開啓實學救國之道。而自 2 卷 1 期起《史地學報》不定期刊出相關之調查報告，亦可略窺其實地調查之動向¹⁰³。

三月至六月計開正式編輯會議四次，於編輯改良及稿件取捨，多所討論取決。（《史地學報》，1.4: 245）

¹⁰⁰ 第6屆職員組織如下：

總幹事：向 達 諸葛麒

書記：馬繼援 楊 楷

幹事：全文晟 王 庸

調查部：袁鵬程 王學素

編輯部：

(總編輯)：張其昀

(編輯)：陳訓慈 陸維釗 景昌極 繆鳳林 鄭鶴聲 東世激 胡煥庸 鄧光禹

(書記)：唐兆祥 陳人文

出版部：周 仇良虎

圖書部：王玉章 陸鴻圖 （《史地學報》，2.1: 149）

¹⁰¹ 知識分子到民間去是五四時期的一股風潮，本文第2章第2節〈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略已言之，此處不擬贅述；此外可參考：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121-187。

¹⁰² 《史地學報》，2.1: 106之1、2、3。

¹⁰³ 如：鄭鶴聲，〈地學考察報告——紫金山〉，《史地學報》，2.1: 131-134；〈杭滬定普一帶紀游〉，2.1: 89-99；〈地學考察報告——聚寶山，棲霞山〉，2.5: 135-143；孫逢吉，〈地學考察報告——高資，香山，朝鳳山〉，2.1: 134-137；皆屬實實地考察之例；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第3章第 3 節〈歷史地理學的理论與實踐〉。

到了第七屆，史地研究會又有重大改變。事實上，史地研究會自成立以來，其組織結構即不斷地在改變，但改變最大的蓋屬第七屆。第七屆最主要的改變為分組研究的成立¹⁰⁴

其中中國史組再分為七門：1.種族(附地理環境)，2.社會，3.政治，4.經濟，5.宗教，6.學術，7.國際；各門設主任一名¹⁰⁵。至於其他各組亦各有其負責人¹⁰⁶，分別就各組主題進行研究，且此一分組亦為第七屆職員之基礎¹⁰⁷。又因此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擴充為東南大學，故史地研究會亦改名為東南大

¹⁰⁴ 《史地學報》2卷4期記其事頗詳：「本會第六屆結束時議決分組研究，當時凡屬史地範圍內者，咸以名組。本屆開始後，分組簽名，其中自簽名過少，未能成立者外，計現分中國史組、西洋史組、東亞史組、中國地理組、世界地理組、時事史組、歷史教學組、史學組、地質學組、氣象學組等十組。」（《史地學報》，2.4: 163）

¹⁰⁵ 中國史組各門名單如下(加注 * 號者為主任)：

種族門：諸晉生* 鄭鶴聲 沈孝鳳 仇良虎

社會門：劉文翹* 束世激 向 達 趙祥瓊 仇良虎

政治門：周 * 劉揆藜 王煥燠 龍文彬 全文晟 趙祥瓊 王覺 束世激

經濟門：周光倬* 王 庸 李瑩璧 王 覺 束世激

宗教門：全文晟* 陳 旦

學術門：陸維釗* 諸葛麒 周 王 庸 王煥燠 鄭鶴聲 周光倬 王錫睿 龍文彬
曹松葉 劉揆藜 王 覺

國際門：向 達* 唐兆祥 劉揆藜 張其昀 （《史地學報》，2.4: 163-4）

說明：在分組時，各人可依自己興趣，參加不同之組或門，因此上述名單重覆者甚夥，其他組亦然。

¹⁰⁶ 其他各組名單見《史地學報》，2.4: 164-6。

¹⁰⁷ 第7屆職員錄如下：

總務部

主任：向 達 副主任：劉揆藜

編輯部

編輯主任：陸維釗 副主任：鄭鶴聲

特種編輯：張其昀 叢刊編輯：陳訓慈

編輯：向 達 束世激 陳兆馨 馬繼援 王煥燠 邵 森 王學素

研究部主任：全文晟 副主任：劉揆藜

講演部主任：趙祥瓊 副主任：陳旦

調查部主任：宋兆珩 副主任：諸葛麒

圖書部主任：趙祥瓊 副主任：陳詠洙

發行部主任：周 （《史地學報》，2.8: 166）

學史地研究會。由第七屆職員錄可以看出此時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編制的擴大以及部門的增加。

第八屆職員的組織與第七屆相類，人員的變動亦不大¹⁰⁸，除了編輯主任改為學報主任，圖書部主任和副主任對調之外，兩屆的職員幾乎沒有什麼變動，這是史地研究會成立以來改變最小的一次。但在《史地學報》的編排上卻有很大的變動，最主要的是因應讀者的要求，將原本橫排的《史地學報》自3卷1期起改為直排¹⁰⁹。

就在《史地學報》由橫排改為直排的這一期，《史地學報》捲入了古史辨運動的論辯，自此，《史地學報》成為反古史辨運動的大本營¹¹⁰。

《史地學報》3卷1.2合期¹¹¹，發表了四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2.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3.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4.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使得

¹⁰⁸ 第8屆職員主要名單如下：

總務部 主任：向 達 副主任：劉揆藜
 編輯部 學報主任：陸維釗 副主任：鄭鶴聲
 特種編輯：張其昀 叢刊編輯：陳訓慈
 編輯：向 達 束世澂 陳兆馨 馬繼援 王煥燾 邵森 王學素
 研究部主任：金文晟 副主任：劉揆藜
 講演部主任：趙祥瓊 副主任：陳旦
 調查部主任：宋兆珩 副主任：諸葛麒
 圖書部主任：陳詠洙 副主任：趙祥瓊
 發行部主任：周 (《史地學報》，3(4)，頁147)

¹⁰⁹ 《史地學報》2卷8期刊登一則啟事：

本報發行以來，閱時二載，所接讀者惠函，對於橫行印刷，群謂多不方便，茲為尊重愛讀諸君意見，決定自三卷一期起，改用直行，並酌加圈點，以醒眉目。(頁前1)

¹¹⁰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頁70-92。

¹¹¹ 《史地學報》的第1、2卷，史地研究會內部稱幾卷幾號，刊物稱幾卷幾期，自第3卷起統稱幾卷幾期，本文為簡化行文，一律稱幾卷幾期。

史地學報派在古史辨運動初期，與《讀書雜誌》的古史辨派交戰激烈¹¹²，《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陣營¹¹³。

《史地學報》停刊的原因不明，但在3卷8期有一篇鄭鶴聲的啓事，可能稍稍透露了其中的一些訊息¹¹⁴。從這則啓事來看，《史地學報》第2卷和第3卷的主要負責人可能就是向達、張其昀和鄭鶴聲，而因為負責人前後畢業離校，使得史地研究會和《史地學報》無以為繼。但由《史地學報》培養出來的史學工作者，如繆鳳林、張其昀、鄭鶴聲、向達等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均有所成就¹¹⁵；擔任史地研究會指導員的柳詒徵、竺可楨、陳衡哲、梁啓超等人，亦均著述豐碩，影響深遠。

¹¹² 關於古史辨運動的討論，此處不擬詳述，參考：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¹¹³ 新文學運動的反對者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反新文化運動時是“學衡派”，在反古史辨運動部分則是“史地學報派”；本文在使用“史地會”或“史地研究會”時，表示該學生組織，而不包括指導員在內；在使用《史地學報》時表示該刊物；在使用“史地學報派”時，表示以《史地學報》為中心的史學工作者，包括學生與教授在內；關於反新文化運動的討論，參考：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頁61-220；關於古史辨運動部分，參考：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頁70-92。

¹¹⁴ 這篇啓事云：「鶴聲才識譾陋，理事疏懶，兩無著處，未堪重任，蒙諸同學不棄，委為本報編輯，繆承斯職，數年於茲，汲深綆短，時慮隕越，幸恃張君其昀，向君達，極力扶植，稍垂舊型，負望閱者，歉仄甚矣！現以修業期滿，離校伊邇，所有編輯事務已移交下屆職員負責辦理，海內學者幸鑑焉！」（《史地學報》，3.8：頁前1）

¹¹⁵ 這一群出身《史地學報》的學者，於日後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均有其一定的研究成績，惟目前尚無較完整之研究或相關文獻討論其論著與研究成績，僅得部分個別之生平敘述及其學術成就的評述文字，列舉如次：蕭良瓊，〈向達〉，收入：劉啟林（主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名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頁183-204；蕭鈞，〈向達：敦煌藝術的拓荒者，西域文明的採珠人〉，收入：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3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頁66-87；鄭鶴聲曾撰自傳一篇，回顧其個人生平及學術歷程，見：〈鄭鶴聲自傳〉，收入：晉陽學刊編輯部（編），《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2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233-268；宋晞，〈張其昀傳略〉，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第1冊（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文化大學，1988），頁5-26。

《史地學報》自 1921 年 11 月創刊，迄 1926 年 10 月停刊，共發行 20 期，其中第 1 卷 4 期，第 2 卷 8 期，第 3 卷 7 期，第 4 卷 1 期。第 1 卷為季刊，自第 2 卷第 1 期起改為月刊(但實際上每年出版 8 期)。自第 1 卷第 1 期至第 2 卷第 8 期止，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主編，第 3 卷第 1 期起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主編(此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易名為東南大學)。

《史地學報》刊載的文字，有論述當代時事者，有爰引古事以為參考者；關心中國時勢，也放眼世界局勢，因此，當前時勢之分析與古史研究齊頭並進，可說是《史地學報》的最大特色¹¹⁶。

《史地學報》的創刊，主要是因為時代的衝激，而思有以救亡圖存，在此前提下，史地學報派所用力最勤者乃係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包括整理中國史學有關歷史地理學的部分，引介西方歷史地理學的理論，並提倡實地考察，這一方面是當時學術風氣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知識分子內自省的結果，使得史地學報派在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有其一定的階段性意義。

(二)《史地學報》內容分析

《史地學報》4 卷 20 期總計發表了 318 篇文章，在這些文章中，部分是純粹的學術論文，部分有類時事評論，以今日學術眼光來看，可能引起的討論是：為何當時的學術期刊對時事如此關心？進一步的討論則可能是：關心時事對學術研究有什麼樣的影響？

如以今日的學術標準來看，很可能會得到一個結論：知識分子的過度關心國是，可能影響了學術的客觀性。但另一面的討論也可能是：學術是否一定要躲在象牙塔中做文章，而棄國計民生於不顧？學術與非學術的界線到底在那裡？

¹¹⁶ 關於《史地學報》的內容，請參閱本文〈《史地學報》內容分析〉與〈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由於關心時事，使得《史地學報》刊載的論著常對現實政治與外交有所著墨；就統計所得，在《史地學報》刊載的 318 篇文章中，有關當代史者有 160 篇¹¹⁷，約占 50.3%，可見史地學報派對時事的心程度。而對時事的所多所繫懷，正是經世史學的具體實踐：視史學成爲一門有用的學科，而非閉門造車。

由於經世史學的影響，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時事的關心與日俱增，表現在學術研究上的則是時時以國是爲念，如竺可禎在〈我國地學家之責任〉中談到甲午戰爭，中國喪師失地，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一萬三千九百餘方哩之地給日本，是因爲李鴻章不明瞭地理學而犯下了錯誤¹¹⁸，接著竺可禎推崇「英國政治家，素以能深謀遠慮著稱於世，於全球地理形勢之分配，瞭如指掌」¹¹⁹，所以他呼籲國人應儘速以個人的力量，進行各項訪查¹²⁰；並呼籲相關的地理學者組織學會，考察十八行省以及滿蒙藏疆，以盡國民之責¹²¹；這種學術研究與現實結合的思想，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慣有的思考模式，也可以說是史地學報派的典型代表。

竺可禎此時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地理系主任，也是史地研究會的指導員，提倡地理學不遺餘力。在同期中他還有一篇演講，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新形勢，文中提到巴黎和會主要各國的利害關係，以及將引發的問題

¹¹⁷ 參見：本文附錄一〈《史地學報》統計資料〉·1-1〈《史地學報》文類篇數統計〉，1-2〈《史地學報》文類比例統計〉；下文提及相關數據，如無特別說明，皆據此二表。

¹¹⁸ 竺可禎，〈我國地學家之責任〉，《史地學報》，1.1: 41。

¹¹⁹ 《史地學報》，1.1: 41。

¹²⁰ 竺可禎在〈我國地學家之責任〉中說：「為今之計，惟有賴社會與國民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歐美日本地理學上之調查，亦非盡以政府為主動，以個人之苦心經營，或學會之協力互助而成書立業者，比比皆是，如我國南通軍山之氣象台，其明證也。」（《史地學報》，1.1: 44）

¹²¹ 竺可禎在〈我國地學家之責任〉中說：「至於國內各高等學校及學會中之專心地學者，當不乏人，苟能組織機關，捐募巨款，以調查全國之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礦物為己任，設計調查之標準，定進行先後之次序，擇暑假或其他相當之時期，結隊考察，自十八省至滿蒙漢疆，庶幾東鄰不至有秦無人之誚，此則今日我國地學家之責任也。」（《史地學報》，1.1: 44）

¹²²。竺可禎的話不幸而言中，20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果然應驗了他的推論。而史地學報派關心時事的傾向，竺可禎一直扮演引導者的角色，尤其在有關地理學方面的論述，更具啓發之功。譬如在《史地學報》1卷3期，竺可禎就介紹了包曼(Jsaiah Bowman)所著的《歐戰後世界各國新形勢》¹²³，同期中也刊載了他的〈去秋江浙濱海之兩颱風〉¹²⁴；此外，南京地區的氣象報告亦自1卷3期開始刊載，最初是每3個月刊載一次(此時《史地學報》為季刊)，但自2卷1期起因《史地學報》改為月刊，在正常出刊期間則每期都刊出此一報告，祇有在寒暑假時由下一期補齊未刊之月分。南京地區的氣象報告自1卷3期至2卷8期，每期均刊載，但自3卷1期起《史地學報》改為直排，可能因為氣象報告數字表格過多，編排不便，因而取消。

竺可禎在《史地學報》的文章大體和天文、氣象、地理、時事有關，其中有多篇為演講之紀錄，如前文所舉談歐洲形勢，地理與人生之關係¹²⁵，論青島的接收等等¹²⁶，而《史地學報》所以對時事特別關心，主要是創刊初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善後事宜紛至沓來，知識分子用心於評鸞國是與世界局勢，以盡學術報國之責。如在〈青島接收之情形〉演講中，竺可禎即對觀察所得提出了三項感想：1.中國政府之冥頑不靈，2.青島附近的風聲鶴唳，3.日本的處心積慮與強暴手腕¹²⁷；而對政府事前無充分之準備，青島住民的備受威脅，日人的用意太深，也是感慨良多¹²⁸。由竺可禎的演講和

¹²² 竺可禎〈歐洲戰後之新形勢〉云：「和會之上，五國雄長，歐人冀美之來，而美弗願，日本縱思參問歐事，亦不之許。歐洲形勢既為三國所把持，而三國者又各不同其旨趣，歐洲將永無寧日矣。民族自決，既未全行，國際聯盟中各國，又不能同等待遇，和會大權惟操在少數國之手，外觀美日若英，競施軍備，復無已時，世界和平之望，殆將絕矣！」(竺可禎，〈歐洲戰後之新形勢〉，《史地學報》，1.1: 163)

¹²³ 《史地學報》，1.3: 213-217。

¹²⁴ 《史地學報》，1.3: 209-212。

¹²⁵ 竺可禎，〈地理對人生之影響〉，《史地學報》，2.1: 1-12。

¹²⁶ 竺可禎，〈青島接收之情形〉，《史地學報》，2.2: 85-90。

¹²⁷ 《史地學報》，2.2: 86。

¹²⁸ 《史地學報》，2.2: 90。

論著中可以看出史地學報派對時事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史地學報》所設計的「時事史」專欄更明顯地表現出來。「時事史」專欄從 2 卷 2 期開始設立，另外還有「世界新聞」，這兩個專欄使《史地學報》在對時事關懷上，較一般的學術期刊為多。

《史地學報》對當代史的關注可以 2 卷 5 期做一分水嶺，在此之前，有關時事的文章在數量上稍多，在此之後，則略有減少，在 2 卷 5 期以前，與當代史有關的文章占 63.6%，2 卷 6 期以後占 32.1%；2 卷 5 期出刊日期為 1923 年 7 月，2 卷 6 期為 1923 年 8 月，如就時事加以推測，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和約問題已經告一段落，第二次直奉戰爭還沒開打，南方政府的北伐又尚未開始¹²⁹，無事可記之故，而且「世界新聞」的專欄曾經出版油印單行本，雖然在 2 卷 8 期以後再次回到《史地學報》的版面上¹³⁰，但活力則似不如前。最重要的是「時事史」專欄在 2 卷 6 期以後也不再出現，祇靠「世界新聞」撐場面，在比例上自然不如創刊初期。因此，攸關時事者與一般史地文章的比例，以 2 卷 5 期為分界，前後期之間的關注程度略有轉變，亦即在 2 卷 5 期以前關心時事的文章要比與時事無關者多，在 2 卷 6 期以後則一般史地文章在比例上較攸關時事者多。

史地學報派的治學方法主要植基於傳統中國史學，加上外國史地之學的輸入，在這方面，柳詒徵、徐則陵、竺可禎、梁啟超、張其昀、鄭鶴聲、繆鳳林、胡煥庸、向達、諸葛麒和陳訓慈是主要的奠基者。

從《史地學報》所刊載的柳詒徵論著¹³¹，可以看出他對史地研究會的影響力可能是相當大的。在《史地學報》總計 4 卷 20 期中，除了 2 卷 7 期、3

¹²⁹ 相關史事此處不擬詳述，參考：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台北：東華書局，1980)，第4章〈軍閥的興衰〉，172-240。

¹³⁰ 《史地學報》2卷8期的啟事上說：

本報舊有世界新聞一欄，內分時事紀要、地理新材料等，最便於研究現代史地之參考，嗣以油印單行本，本報遂廢此欄，唯油印既欠清晰，而訂購又需手續，本報為便利訂閱計，決仍將此欄加入。（《史地學報》，2.8: 前1）

¹³¹ 柳詒徵刊載於《史地學報》的論著略如下表：

卷4期、4卷1期未有文章發表外，幾乎每一期都有他的論著；因此，身為指導員的柳詒徵很可能是《史地學報》所倚賴的精神導師。雖然就柳詒徵在《史地學報》所發表的文章來看，基本上仍屬於中國傳統史學的範疇。其中〈江蘇之財政〉、〈欽天山重建觀象台議〉係與現實有關者，亦涉及歷史地理學；〈婆羅門述〉、〈大夏考〉、〈契丹大小字考〉、〈馬哥孛羅導言序〉、〈奴兒干事輯〉諸文，則與歷史地理學有關；惟就文章的性質及比例上而言，柳詒徵在歷史地理學研究上，其成績似不足觀；易言之，柳詒徵對史地研究會的影響，引導成分可能多於實際的建樹。事實上，柳詒徵在史學研究上的貢獻，主要是在文化思想史方面，特別是他的《中國文化史》和《國史要義》¹³²；前者是近代中國史學有關文化史的開路之作，在文化思想史研究上有其一定的意義；《國史要義》則是史學方法與史學史的重要著作，此書撰述體例以類相從，將傳統中國史學做一條理分析，有別於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

1.1 序

1.1 論近人言諸子之學者之失

1.2 漢人生計之研究

1.3 欽天山重建觀象台議

1.4 清史芻議(附修史私議)

2.1 近世史料之一

2.1 江蘇之財政

2.2 論臆造歷史以教學者之弊

2.3 正史之史料

2.5 婆羅門述

2.6 契丹大小字考

2.8 大夏考

3.1-2) 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

3.1.2 擬編全史目錄(中華教育改進會議案)

3.3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序

3.5 中國史學研究論文集序

3.6 奴兒干事輯

3.7 歷史之知識

3.8 中國文化史緒論

¹³² 參考：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台北：正中書局，1977)；《國史要義》(台北：中華書局，1979)。

但可能因為《國史要義》文字過於深奧的緣故，讀者較少，影響力似不若梁啟超，惟見解之深刻卻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外，柳詒徵在《史地學報》3卷1.2合期發表〈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是首舉大旗反對古史辨運動者，同期另刊出劉揆藜、顧頡剛、錢玄同等人有關古史的討論，並且這項討論一直進行到3卷4期，成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但也使得《史地學報》的方向有所轉變，一方面是對歷史地理學的關注減少，另一方面在介紹外國史地之學的積極性亦大不如前，反而似乎又回到傳統史學的老路子上。雖然這樣的轉變可能並非純因討論古史所引起，應尚其他的諸多因素，但《史地學報》花大量篇幅討論古史之後，提倡歷史地理學的力量自然是減少了；其間得失之權衡實難斷言。

柳詒徵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向屬較保守之一方，如反對古史辨運動，反對新文化運動，他一直都是反“北大”系統的中堅；所以，柳詒徵的地位其實有類提倡新文化運動和啓發顧頡剛進行古史討論的胡適，一位是“南高”的精神領袖，一位是“北大”的青年導師，兩人南北對立，殊不相讓。

另一位《史地學報》的指導員徐則陵，曾任東南大學歷史系任，其論著主要是史學理論及歷史教學問題，如1卷1期〈史之一種解釋〉，1卷2期〈近今史學之發展〉，2卷1期〈歷史教育上之心理問題〉，均屬以理論為史學中心之探討；2卷4期的〈高級中學世界文化史綱要〉則是探討高中歷史教學問題。徐則陵在譯介外國史學上著墨甚多，如介紹魯賓遜(Cyrile E. Robinson)之《新史學》(*New History*)，柏克(H. T. Buckle)的《英格蘭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甚至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亦有所論及，也引介紹了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史》¹³³，在當時東南大學的教授中是引介外國史學最力者，在這方面，學生中受其影響者亦所在多有；由於徐則陵的介紹西方史學，史地學報派在

¹³³ 《史地學報》，1.1: 1-7。

向西學取經上因而用力甚勤。《史地學報》刊載外國史地之學的論著，占了相當高的比例。就一般研究現代學術思想史的分法，以南高為保守派或傳統派，將北大視為革命派或西化派，那麼很可能會犯了形式主義的繆誤¹³⁴。因為分析以北大為主的古史辨運動和《禹貢半月刊》的內容，北大派在治學方法上其實是植基於傳統多，而引介西方學術者少；再深一層分析，古史辨運動和禹貢學會實際上繼承的是清代的樸學傳統，而受西學影響者少。縱使在新文學運動方面，反對陣營的《學衡》在引介外國文學理論上，也不見得比文學革命派少¹³⁵。因此，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是：古史辨派是植基於傳統而反傳統，禹貢學派也在傳統中找尋養分，史地學報派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保守的、傳統的，但在引介西方學術的努力上卻亦著墨甚多，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上傳統與反傳統的弔詭現象，便常常以這樣的面貌出現。

但是，在提及和引用外國史地之學間仍然是有落差的，易言之，文章中提及外國史地之學和運用間並不能劃上等號，可見中西學術交流過程需有一定的適應期。

在有關中國史學方面，梁啟超對史地學報派的理論和實際研究均有助翼之功。梁啟超是在 2 卷 2 期發表〈歷史統計學〉，纔首度在《史地學報》出

¹³⁴ 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其實很難加以明確地劃分，維護現狀當然是保守，革命當然是激進，但改革則為保守之一種，因此在改革和革命之間，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很難涇渭分明；根據Klaus Epstein的分析，保守主義約略可分成三類，一為維護現狀者，二為有改革傾向者，三是態度反動者；其中有改革傾向的保守主義者，鑒於社會情況無時不在變動，以致現有的社會結構有時會因時間因素而顯得過時，所以主張隨時針對需要，在不破壞社會的根本結構條件下，遂行有限度的改革，以維持變遷和持續力量衝激中的平衡；參考：Klaus Epstein, "Three Types of Conservatism," in Melvin Richter eds., *Essays in Theory and History: An Approach to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03-121；有關中國保守主義的討論，可參考：Charlotte Fo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¹³⁵ 關於學衡派引介西方文學的討論，參考：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201-268。

現的，但自此以後陸續在《史地學報》發表各種史學論著，如在 2 卷 7 期發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史記〉，2 卷 8 期發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左傳〉¹³⁶，最重要的是自 3 卷 1 期起連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到 3 卷 8 期刊至第 12 講〈清初學海波瀾餘錄〉，而此書尚有 4 講，總題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4 卷 1 期未見續載¹³⁷。整體而言，梁啟超對《史地學報》的影響主要是在中國史方面，包括他所談的歷史統計學亦係以中國為主，而且在方法的運用上尤難免粗陋，與今日之統計有如天淵。梁啟超基本上認為統計學的作用是“觀其大較”，亦即「專要看各種事物的平均狀況，拉勻了算總帳」¹³⁸；梁啟超並舉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為例¹³⁹，說明幾個現象：1. 帝都所在地人物往往特多；2. 南北升降之跡甚顯著；3. 原則上升降皆以漸，然亦有突進者；4. 人物分配日趨平均¹⁴⁰。

分析《史地學報》刊載中外史地之學的比例，是一個頗為有趣的問題，有關教授部分，如柳詒徵、梁啟超等人的治學方法，已略如上述，而在學生部分，比較重要的是張其昀、鄭鶴聲、繆鳳林、胡煥庸、向達和陳訓慈等人，其中張其昀和鄭鶴聲負責編務最久，影響力可能也最大。

張其昀是史地研究會的創始會員，他在《史地學報》上所刊載的論著不祇是有關中國史學的部分，在外國史地之學的引介上亦極為用心，分析《史地學報》所刊載張其昀論著的內容，他很可能是史地研究會的理論中心。張

¹³⁶ 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史記〉，《史地學報》，2.7: 111-128；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左傳〉，《史地學報》，2.8: 103-109。

¹³⁷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全書計16講，參考：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中華書局，1958)；案：此書據 1935年版景印；《史地學報》何以未續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原因不明；《史地學報》3卷8期出版於1925年10月，4卷1期出版於1926年10月，梁啟超於1926年兼北平圖書館館長，期間看不出有何理由不續寫(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參考：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台北：世界書局1972)，666-715。

¹³⁸ 《史地學報》，2.2: 7。

¹³⁹ 此文發表於《史地學報》，2.4: 123-132。

¹⁴⁰ 《史地學報》，2.2: 9。

其昀於《史地學報》所發表的論著，其中有 14 篇與中國史學有關¹⁴¹；從這些文章中，略可瞭解張其昀不但對提倡章學誠的史學用力甚勤，對歷史地理學懷著濃厚的興趣，對時事的關心也是無時或已。這些論著中比較值得討論的是 3 卷 7 期的〈論寧波建設省會之希望〉和〈南宋都城之杭州〉，因為張其昀對寧波建省有極高的期望，乃執筆屬文加以論析，而且爲了加強說服力，特意撰〈南宋都城之杭州〉做例證，此二文表面上看似乎不相干，其實卻是互爲表裏，略有古爲今用的鑑戒史學之意。

此外，就致力於史學、關心時事，穿梭於古今中西之間的幾個範疇而言，張其昀可說正代表了史地研究會的基本精神，甚至可以說他就是史地學報派的一個縮影。惟進一步分析張其昀的著作，尙可得一推論，即在中外史地之學的關心程度上，張其昀似乎別有厚愛於西學，有關中國史學的部分反而用力較少，雖然此乃一比較性之說法。一般引用張其昀的著作時，往往以他討論章學誠史學的部分較多，而忽略了他引介外國史地之學的部分，如果用較粗疏的分法，張其昀或可列入所謂“西化派”而非“國粹派”。

¹⁴¹ 張其昀於《史地學報》發表的論著中，與中國史地之學有關者略如下表：

- 1.1 柏拉圖理想國與周官
- 1.3 讀史通與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下期續)
- 1.4 黃河遊記(譯)
- 2.1 上海之地理(2卷4期續)
- 2.3 西靈地雅(西域新圖誌)
- 2.4 方志之價值(譯)
- 2.4 學地理之興趣
- 2.6 遠東問題之地理的背景(譯)
- 2.7 地理學之新精神
- 2.7 地理與國際問題
- 3.3 初級中學人生地理編輯例言
- 3.7 論寧波建設省會之希望
- 3.7 南宋都城之杭州
- 3.8 中國與中道

在有關中國傳統史地之學的論著中，有幾篇其實是中西並論，如〈柏拉圖理想國與周官〉、〈地理學之新精神〉等篇即屬此類；所以，整體而言，張其昀在引介外國史學與地理學方面似乎反而是用力較勤的。

張其昀所介紹的外國史地之學相當廣泛¹⁴²，這些論著中有不少是翻譯作品，加上前面所討論的中西並論之著作，可見他在介紹西方史地之學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尤其在有關歷史地理學的學理輸入上，張其昀更是史地研究會中的擎大旗者。

史地研究會西化派的大將，除了張其昀之外可能要屬胡煥庸和陳訓慈，兩人也都是史地研究會的創始會員。

胡煥庸在《史地學報》上的論著大部分與外國史學或地理學有關，特別是時事史方面，如〈歐戰大事記〉¹⁴³、〈日本之海上政策與殖民政策〉¹⁴⁴、《各

¹⁴² 下表是張其昀於《史地學報》介紹外國史地之學的整理：

- 1.1 美國人之東方史觀(譯)
- 1.2 火之起源
- 1.2 關於華府之表計種種(譯)
- 1.3 今日世界之重大問題(譯)
- 1.3 地學書介紹六則(譯)
- 1.4 黃河遊記(譯)
- 1.4 地學書七種(譯)
- 2.1 最近歐洲地理學進步之概況(下期續)
- 2.2 歷史地理學
- 2.3 美國之地理學(譯)
- 2.4 方志之價值(譯)
- 2.4 學地理之興趣
- 2.5 新書介紹·地理類十種
- 2.6 亞洲東南部山脈河流之新解釋
- 2.6 遠東問題之地理的背景(譯)
- 2.7 地理學之新精神
- 2.7 地理與國際問題

¹⁴³ 《史地學報》，1.1: 179-182。

¹⁴⁴ 《史地學報》，1.3: 161-163。

國歷史所受地理之支配》¹⁴⁵，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自3卷1、2期開始連載的〈美國國民史〉，此篇一直連載到4卷1期，也就是到《史地學報》停刊為止尚在連載中，這也是創刊會員中唯一刊載於4卷1期的文章。

在歷史地理學方面，胡煥庸翻譯了詹姆士·弗爾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的《各國歷史所受地理之支配》(*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此書內容係分析世界歷史如何受地理支配的情形，計分18章，從〈沙漠·歷史之開始·埃及〉到〈煤·更大之陸地分布·美國〉，最後則討論將來之趨勢，可以說是一本從地理史觀分析世界歷史發展的著作¹⁴⁶。

詹姆士所論，以宏觀的角度觀察歷史之重要與否，與後來年鑑學派的理論頗有異曲同工之處¹⁴⁷，亦為今日史學研究之主流。就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地理對歷史的影響固非一朝一夕，而是長時期的所造成的，就此而言，詹姆士的理論不僅對史地學報派有所影響，即對今日之史學而言，亦是其命唯新的。至於有關地理學方面，詹姆士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¹⁴⁸。其所謂歷

¹⁴⁵ 此書篇幅甚巨，雖為節譯，仍分期於《史地學報》刊出：《史地學報》，1.4: 133-139；2.2: 79-84；2.3: 103-108；2.5: 85-96；2.6: 109-122。

¹⁴⁶ 詹姆士對歷史加以定義說道：「所謂歷史，當然以人類之歷史為限，然所謂人類之歷史，亦並非指所有人類已過之事實而言。歷史僅舉其重要之事實，而影響人類最多者，其餘不甚重要之事實不及焉。」（《史地學報》，1.4: 134）但所謂重要與否，並非在歷史事件發生當時就能斷定，詹姆士認為：「歷史彷彿一有機體，事實之發生，必有其所以發生之原因，而事實之成立，又必有其影響所及之結果。影響有不同焉，或一時所及甚廣，而不久即行消滅者，或起始影響不大，而繼續頗長久者，在此判決事實之重要與否時，所當注意者也。在歷史上有相距甚遠相隔甚久之民族，發生同一事實者，此可謂歷史之復現。惟從大概觀之，歷史皆不復現，而有進步之趨勢，如在物質方面，今人之生活，當遠較數千年前人為舒適，即進步之證也。」（《史地學報》，1.4: 134）

¹⁴⁷ 年鑑學派的史學，可參考：F. Braudel, *On Hist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Traian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London: Ithaca, 1976)；中文可參考：夏伯嘉，〈馬克·布洛克與法國年鑑學派〉，《史學評論》，1(台北：華世出版社，1979. 07): 211-228；梁其姿(編譯)，《年鑑史學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雅克·勒高夫等著，姚蒙等(譯)，《法國當代新史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

¹⁴⁸ 詹姆士指出：「地理不僅在記憶地名山川，亦不在盡地球上所有而研究之。所重者，在人類與環境，地理上一現象常足以影響他種現象，故因果關係，地理上當研究，某種事

史地理學，主要係指人文地理而言，而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認知，大體亦較傾向人文地理的範疇，這和後來歷史地理學成爲一門獨立學科略有不同。因爲歷史地理學成爲獨立的學門之後，所考量的不再祇是人文問題，還牽涉到實用性與自然地理¹⁴⁹；此外，史地學報派在歷史地理學取向上較著眼於地理學，而與禹貢學派之立足於史學略有所不同。

另一位學生中的西化派要角陳訓慈，亦爲史地研究會的創始會員，他在《史地學報》的論著，大部分與外國史學有關，而且著重史學理論的範圍，這一點和擔任指導員的徐則陵頗爲相近；陳訓慈的論著，如〈史學觀念之變遷及其趨勢〉¹⁵⁰、〈歷史之社會的價值〉¹⁵¹、〈史之過去與將來〉¹⁵²、〈組織中國史學會問題〉¹⁵³、〈文化北進說〉¹⁵⁴、〈歷史之價值〉¹⁵⁵、〈近世歐洲政治社會史〉¹⁵⁶、〈戰後德意志之歷史教學〉¹⁵⁷、〈史學蠡測〉¹⁵⁸等篇，其中除〈組織中國史學會問題〉之外，皆與外國史學有關，而〈文化北進說〉、〈戰後德意志之歷史教學〉、〈近世歐洲政治社會史〉、〈歷史之價值〉諸篇爲譯稿，對外國史學理論的引介具有重大意義。

物，為何僅發生於某種地方，其事物之存在與否，與其地有何等關係，研究地理者當注意及之。」（《史地學報》，1.4: 135）

¹⁴⁹ 大陸地區成立歷史地理研究所以爲獨立學門之研究，如：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成立歷史地理研究室，復旦大學成立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西北大學與陝西師範大學合辦歷史地理研究所，參考：譚其驥、葛劍雄，〈歷史地理學〉，收入：蕭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552-571；有關成立歷史地理研究所記事在554。

¹⁵⁰ 《史地學報》，1.1: 9-40。

¹⁵¹ 《史地學報》，1.2: 223-224。

¹⁵² 《史地學報》，1.2: 329-342。

¹⁵³ 《史地學報》，1.2: 217-219。

¹⁵⁴ 《史地學報》，2.1: 99-106。

¹⁵⁵ 《史地學報》，2.4: 21-26。

¹⁵⁶ 《史地學報》，2.2: 91-100；案：此文於目錄上刊出作者“陳慈訓”，內文則印爲陳訓慈，但會員錄中並無陳慈訓其人，當係陳訓慈之誤。

¹⁵⁷ 《史地學報》，2.2: 33-40。

¹⁵⁸ 《史地學報》，3.1-2: A1-A18；3.3: 3-14；3.5: 23-44。

陳訓慈論著中最重要的殆屬〈史學蠡測〉，撰寫此文時陳訓慈已大學畢業並擔任教職；他在〈史學蠡測〉導言中說明此文的寫作的動機，是因為「吾國史學之富，能為舉世學者所共稱。惟論史學之專書，頗不多觀。數十年還，歐美之史學大昌，而論史旨史法以逮考史學沿革得失之作，在蔚起之史書中，亦復自樹一幟；其於史學頗著推進之效。國人有鑒於斯，頗或表宣前說，裁成新著，而詳密巨作，猶未多觀。學子有求，每苦闕如」¹⁵⁹，因此乃以一己之力，寫成〈史學蠡測〉，希望有益於青年學子¹⁶⁰。陳訓慈雖以“蠡測”名其文，但此文確為《史地學報》所刊載有關史學理論最體大思精者。在〈史學蠡測〉中，陳訓慈從中國史字的起源和西方希臘、羅馬之史的本意出發，探討歷史的定義，對史學的範圍、史學與人類的關係、史料之審別、史法之運用、史學是否是科學、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中國史學的發展、西方史學的發展等等，均有論略；在此文的附錄中，陳訓慈並列出了西洋論史學書與中國討論史學著述的論文要目，可以說是一篇相當完整的史學導論著作，其內容涵蓋中西史學史與史學方法。

在〈史學蠡測〉中，陳訓慈所提倡的史學理論與方法，是史地學報派所大體遵守的。至於中國史學的部分，陳訓慈自承「中國史學源流一節，強半有取於梁任公先生之文，而更參及他書；關於中國“史”之字源，則得之於王靜安先生〈釋史〉一文之啓迪為多」¹⁶¹。但就整體而言，陳訓慈此文是《史地學報》有關西方史學理論介紹最完整者。就上述分析，陳訓慈在理論的探

¹⁵⁹ 《史地學報》，3.1-2: A1。

¹⁶⁰ 陳訓慈說：「茲以淺知薄聞，稍加整疊，於現今史學之要端，以及吾國與歐美史學之演進，做一最簡略之敘述，名曰蠡測，以識疏淺。非敢自矜寸見，好為表宣；實以積疑求質，用發其惑。且意欲有求，而所知乃若是貧薄；則國之通人，且必憐後進之無似，感斯學之待昌；因而宏譯前聞，廣致西說，以為吾後生召矣。區區此文固不敢懷以拋磚引玉之望；即粗揭凡要，亦未足以供一般問史者之涉覽。但求國內宏達，丕發佳著；則馨香禱祝，固吾輩所望。」（《史地學報》，3.1-2: A1）

¹⁶¹ 《史地學報》，3.5: 44。

討上，可能和張其昀是相頡頏者，前者偏重史學理論的部分，後者則集中於地理學，可謂為一時瑜亮。

除了陳訓慈之外，在史學理論方面用力較勤的是繆鳳林，他的史學方法與西洋哲學史著作，是史地學報派的佼佼者¹⁶²，但在《史地學報》時期似未有較明顯的表現。雖然《史地學報》對外國史地之學的介紹有所用心，但亦有其前後比例之變化；就《史地學報》所介紹的外國史地來看，在創刊初期，有關外國史地之學的論著在比例上較高，2卷6期以後則略為降低，在2卷5期以前《史地學報》有關外國史地的比例是55.4%，此時期有關中國史地的比例是66.3%，兩者間的出入約為10%左右，因此，《史地學報》在2卷5期以前所刊載的論著，在量的方面是中外並重的。但要說明的是：一篇文章中提及中國史地，並非就代表非關外國史地，而係指此文論及中國史地，但文中亦可能有引述外國史地的部分；同樣的，提及外國史地者亦非代表與中國無關，特別有些是外國學者有關中國史地著作之翻譯；而且在《史地學報》上刊載的論著，常有中西並論、古今比擬的情形出現；尤其引介外國史地之學時亦常以中國為例加以說明，這種譯介方式有類中國中古時期之翻譯佛經。因此，在分析中國與外國史地比例時，祇能以整體大略做比較的基礎，而非斤斤於百分比的多少。而且，在進行此類比較分析時，有兩個必須克服的困難：其一是量的多寡，包括一篇文章的中外史地之學各占多少，這是很難加以評估的；其二是質的高低，部分論著僅為信筆提及外國史地，其瞭解程度如何實難予判定；因此這類比較祇能看出一個簡單的大勢，而非丁卯立

¹⁶² 繆鳳林在《史地學報》上發表的論著並不多，如〈中國史之宣傳〉，《史地學報》，1.2: 209-215；〈研究歷史之方法〉，1.2: 235-255；〈歷史之意義與研究〉，2.7；另外有一篇有關他的著作《西洋哲學史》的書報介紹；郭廷以在口述回憶錄中提到繆鳳林，認為他是柳詒徵的得意弟子，郭廷以說：

柳先生的得意弟子要算是繆鳳林了，有一年暑假胡適來我們學校演講，繆鳳林批評他的《哲學大綱》[案：即《中國哲學史大綱》]，一舉成名。繆鳳林也像柳先生一樣書讀得不少，但教學方法不行。

見：張朋園等(訪問紀錄)，《郭廷以先生訪問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130。

判、錙銖必較。值得注意的是《史地學報》2卷6期以後提及外國史地的比例，有顯著的降低，相對的，有關中國史地的比例則大為提高；此階段有關中國史地的比例為81.3%，有關外國史地的比例變成34.3%，由此不難看出《史地學報》所刊載論著有關於中外史地之學比例增減的情形，但何以如此，在《史地學報》的內容上卻無明顯跡象可循。

如果說張其昀、胡煥庸和陳訓慈是史地研究會西化派的要角，那麼鄭鶴聲和劉揆藜就可以說是本土派的主將了。

鄭鶴聲在史地研究會成立初期，並未擔任重要職務，他是在史地研究會第六屆擔任編輯、第七屆擔任編輯副主任以後纔負責比較重要的會務，但自此以後，《史地學報》的編輯方向很可能就是他和張其昀及向達所共同主導的¹⁶³。

鄭鶴聲在史地研究會第六屆始擔任重要職務，但他在《史地學報》創刊初期已有論著發表，如〈地學考察報告——湯山〉¹⁶⁴，〈地學考察報告——巖山〉¹⁶⁵，〈杭滬定甬紹一帶紀遊〉¹⁶⁶等文，即鄭鶴聲初露頭角之作。竺可禎的〈青島接收之情形〉則是他和王玉章筆記的¹⁶⁷，金陵大學Bates教授演講〈印度之現狀及趨勢〉，是由鄭鶴聲和沈孝風筆記的¹⁶⁸。《史地學報》中後期鄭鶴聲的著作有〈司馬遷之史學〉¹⁶⁹，〈地學考察報告——聚寶山·棲霞山〉¹⁷⁰，

¹⁶³ 《史地學報》3卷第8期有一篇鄭鶴聲的啟事，可能稍稍透露了其中的一些訊息：

鶴聲才識譾陋，理事疏懶，兩無著處，未堪重任，蒙諸同學不棄，委為本報編輯，繆承斯職，數年於茲，汲深綆短，時慮隕越，幸恃張君其昀，向君達，極力扶植，稍垂舊型，負望閱者，歉仄甚矣！現以修業期滿，離校伊邇，所有編輯事務已移交下屆職員負責辦理，海內學者幸鑑焉！（《史地學報》，3.8：前1）

從這則啟事來看，《史地學報》第2卷和第3卷的主要負責人可能就是向達、張其昀和鄭鶴聲；請參閱本文〈《史地學報》的創立及其組織〉。

¹⁶⁴ 《史地學報》，1.3：249-254。

¹⁶⁵ 《史地學報》，1.4：217-224。

¹⁶⁶ 《史地學報》，2.4：89-100。

¹⁶⁷ 《史地學報》，2.2：85-90。

¹⁶⁸ 《史地學報》，2.5：113-116。

¹⁶⁹ 《史地學報》，2.5：57-84；2.6：79-106。

〈清儒之史地學說與其事業〉¹⁷¹，〈讀王船山先生《讀通鑑論》《宋論》〉¹⁷²，〈讀《史記·箕子世家》〉¹⁷³，分析上述論著，鄭鶴聲的研究範圍大抵為中國史學，除了替Bates演講做記錄的〈印度之現狀及趨勢〉外，均屬中國史學的範疇。此外，鄭鶴聲也是史地研究會實地考察的具體實踐者，刊載於《史地學報》的地學考察報告大部分出自其手；而他討論司馬遷和王夫之的史學，主要著眼於經世立論，亦為史地學報派一貫之觀點；他論析清代學者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正是史地學報派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¹⁷⁴。分析鄭鶴聲在《史地學報》所發表的論著，他對實地考察的身體力行，對中國史學史的關注，以及用心於歷史地理學等跡象，略可說明他在《史地學報》時期就已經奠定了後來的研究方向。

劉揆藜也是史地研究會的理論要角，他在《史地學報》的論著大部分和中國史學有關，〈史法通論〉¹⁷⁵是與陳訓慈〈史學蠡測〉相頡頏的論著，前者以中國史學為主，後者多論西方史學(雖然也討論到中國史學)。在〈史法通論〉中，劉揆藜對中國史學的史識、史體、史才、史德、闕訪、自注、紀元等等均有所論略，在這方面，受章學誠的影響頗多，因為史才、史德、闕訪、自注等皆係章學誠所提出者。此外，〈史法通論〉也討論通史、史表、史圖等問題，著作中引述較多的是司馬遷《史記》、劉知幾《史通》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亦即將中國史學理論做一通盤的整理；略可與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柳詒徵《國史要義》比擬而論。

¹⁷⁰ 《史地學報》，2.5: 135-144。

¹⁷¹ 《史地學報》，2.8: 1-16。

¹⁷² 《史地學報》，3.7: 23-37。

¹⁷³ 《史地學報》，3.7: 53-81；《史地學報》，3.8: 43-66。

¹⁷⁴ 史地學報派對清代的史地之學頗為推崇，如柳詒徵在《史地學報·序》中即說明《史地學報》是要廣續清代的史地之學，見：《史地學報》，1.1: 1；張其昀亦極力提倡章學誠的史法，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第3章第1節〈從章學誠《方志略例》到《史地學報》〉。

¹⁷⁵ 《史地學報》，2.5: 1-20；2.6, 1-15。

1924年2月，劉揆藜在《史地學報》2卷8期發表〈儒家所言堯舜事偽耶真耶〉，對胡適《中國哲學史》書中的說法提出質疑¹⁷⁶，這也是劉揆藜擊舉反古史辨運動大旗之肇端。接下來的3卷1.2合期中，劉揆藜又發表了〈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¹⁷⁷，加上該期《史地學報》刊出三篇有關的附錄：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錢玄同〈答顧頡剛書〉、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以及柳詒徵的〈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掀起有關古史研究的一場論戰¹⁷⁸；這場論戰並無誰勝誰負之結論，但因這場論戰所引發的史料學革命卻是空前的¹⁷⁹。比較遺憾的可能是因為參與了古史論辯，使得原本為《史地學報》重心的外國史地、時事史和歷史地理學等之推動，似乎著力略有減少¹⁸⁰。

整體而言，《史地學報》的內容雖龐雜，其大要略如上述，主要範疇大抵可分為三個部分：

其一，當代史：史地學報派對時事的關注，主要緣於經世史學的影響，且由於近代中國外患頻仍，西方列強為刀俎、中國為魚肉，知識分子乃思以學術救國，這種以學術救國之心，可以說是自1840年代以降，知識分子經世思想的結晶；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的處置，引起國人普遍不滿，使中國知識分子走出象牙塔，以“外除強權，內除國賊”為口號，匯集為蓬勃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最初固起於政治事件，然

¹⁷⁶ 劉揆藜認為：「……春秋以上，史事難稽。蓋孔子僅及史之闕文，馬遷亦云書缺有間。韓非子生當戰國之際，猶謂「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後人生數千載之外，而於所傳堯舜禹事一一篤守而固信之，愚矣！無參證而遽以儒墨道法等一家之言為真，誣矣。今日而言上古之事，非愚即誣，甚哉古史之難治也！」（《史地學報》，2.8: 88）所以劉揆藜基本上是相信有堯舜其人其事存在的，因此他對堯舜之事，採取諸家之說並舉的方式。

¹⁷⁷ 《史地學報》，3.1-2: 13-23。

¹⁷⁸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頁218-236。

¹⁷⁹ 參考：彭明輝，〈顧頡剛與中國史學現代化的萌芽——以史料學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12(台北，1992.60): 9-24。

¹⁸⁰ 有關時事史和外國史地的部分前文業已言之，歷史地理學部分請參閱〈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卻發展為文化思想的狂濤巨浪，這股思想文化運動的洪流乃以救國救民為標的。因此，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比較傾向以行動支持理念，而不再是坐而論道。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關心自受此一學術風氣之影響。史地學報派對時事投注較多心力的是竺可禎、胡煥庸、張其昀、向達和趙祥瑗等人；他們有的關心中國情勢，包括國內問題與涉外問題¹⁸¹；有的關心世界局勢，期收知己知彼之效¹⁸²；但無論關心國內問題或國外問題，均係本於史學經世之思想理路。易言之，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關注與研究，事實上是與時代共脈搏、同呼吸的。

其二，理論基礎的建立：這可分兩方面來談，一方面是傳統史學的部分，史地學報派對傳統史學頗有所愛，《史地學報》所刊載的文字，引述中國傳統史學甚夥，其中較受重視的有司馬遷、劉知幾和章學誠等人，尤其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更是史地學報派理論之所本；此外，清代學者的歷史地理研究也是史地學報派的重要養分；在這方面，柳詒徵、梁啟超、張其昀、鄭鶴聲和劉揆藜獻力最多，特別是柳詒徵，他幾乎可以說是史地學報派的精神導師。至於外國史地之學的輸入，史地學報派亦著墨甚多；在這方面，竺可禎、徐則陵、陳訓慈、胡煥庸和張其昀是其中的要角，竺可禎對西方地理學的引介，奠定了南高的地理學基礎；徐則陵和陳訓慈則對西方史學的介紹不遺餘力，陳訓慈的〈史學蠡測〉整理和介紹西方史學理論，是當時較體大思精的；張其昀既對劉知幾和章學誠的史學情有獨鍾，又致力於西方地理學的引介，可謂中西並重，多所關注，是史地學報派的重要靈魂人物。而時事史、中西史學理論與歷史地理學的結合，正是史地學報派所試圖努力的方向；雖

¹⁸¹ 如竺可禎、張其昀、趙祥瑗等人；竺可禎、張其昀的討論，前文言之已詳，此處不贅；趙祥瑗有〈片馬問題研究〉一文，載於《史地學報》，2.4: 109-121；此文討論英國自緬甸入侵事，呼籲國人重視，加強防範；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¹⁸² 如胡煥庸、向達、張其昀、周光倬等人；胡煥庸、張其昀之著作前文言之已詳，向達譯有〈俄國革命時歷史研究之狀況〉，《史地學報》2.6: 123-132；周光倬譯有〈俄國雜記〉，《史地學報》，2.8: 111-130。

然透過整體的分析，刊載於《史地學報》上的論著並非完全符合上述要求，但史地學報派涵泳舊學並介紹新知的治學方式，則是值得肯定的。

其三，歷史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牽涉的面極廣，一方面是歷史，另一方面是地理，加上對時事的縈懷，可謂集數門學科於一身，在這方面又分成兩個領域，其一為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歷史地理學，其二為西方的歷史地理學，前者主要是從地理沿革、方志學和經世史學發展出來的；後者則自西方引入，或許可以視為西力衝激下之產物。對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歷史地理學著墨較多者為柳詒徵、竺可禎、張其昀和鄭鶴聲等人；在實地考察方面，鄭鶴聲更是真正的身體力行者；在西方歷史地理學的介紹上，竺可禎、張其昀和胡煥庸是其中的佼佼者。

整體而言，《史地學報》的內容雖然龐雜，古今並論，中外同析，表面上看起來似稍欠章法，亦缺少統一性；如對時事的關心在 2 卷 6 期以後明顯地減少，介紹外國史地之學的比例亦是前多後少，但無論《史地學報》的內容如何改變，其堅持歷史地理學的方向是不變的；因為對時事參與的程度縱有增減，外國史地之學的介紹亦有眾寡之別，但對歷史地理學的投注卻仍一本初衷。

(三) 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研究歷史地理學所牽涉的問題極為廣泛，除了歷史學與地理學的範疇外，還涉及時事與實地考察，亦即除了學理的探討和研究外，還有身體力行的部分。

就學理方面的探討而言，《史地學報》一面自傳統中國史學汲取養分，一面向西學取經，可以說是中西並舉，土洋並用。

歷史地理學本身是一門相當複雜的學科，一方面是歷史，另一方面是地理，地理部分又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不但歷史與地理間的結合不易，學理與現實的問題，也有待解決。竺可禎在〈我國地學家的責任〉中大力呼

籲知識分子應關心國計民生，不僅要對中國內地進行實地考察，以利政府稅收及各項施政，且因當時北京政府勇於內鬥而無力照顧民生，竺可禎更主張國民應善盡職責，以取代本屬政府當做的事，並且他的視野也伸到邊疆地區，認為調查蒙藏新疆是刻不容緩的事¹⁸³；竺可禎呼籲調查蒙藏新疆，主要是因為列強對中國邊疆的野心日熾，俄、英、日、法等國的調查統計做得甚為完備，更顯出中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缺乏用心。竺可禎敘述他自美返國時，在船上遇到一日本男爵之子，此君大言日本之知中國勝於中國人之自知，竺可禎認為這位日本男爵之子大言不慚，想對他有所教訓；但當船抵達日本時，竺可禎到東京書肆，看到日本有關中國物產、地圖、調查之類的著作，嚇了一跳，纔相信這位日本男爵之子所言不虛，心中不免有所感慨¹⁸⁴。回到中國以後，竺可禎發現各類地理資料調查百廢待舉，於是大力呼籲調查之必要；而這類調查本來是政府的事，因為涉及田賦稅收之類的問題，但正處軍閥交戰的北京政府，根本無暇顧及此類事務，竺可禎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調查之事祇有依賴國民共同努力¹⁸⁵。

由於歷史地理學與現實有密切的關連，竺可禎在《史地學報》上發表的論著大部分與時事結合緊密，如對歐戰的觀察，對青島接收的討論等等，皆係此一理念下之產物。同樣的，陳訓慈在〈組織中國史學會問題〉中，也指出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¹⁸⁶；由此可略窺史地學報派對近代史與當代史的關注。除了關心當代史之外，有關歷史地理學的學理探討，尤為《史地學報》所重視。

¹⁸³ 竺可禎在〈我國地學家之責任〉一文中說：「蒙藏新疆，固由我國之屬地也，試問國人洞悉蒙藏新疆之氣候產物地形交通人情風俗，有異於李鴻章時代之臺灣乎？曰無有也。試問政府除耗若干之邊防援庫等等軍費而外，於蒙藏新疆有絲毫之收入乎？曰，無有也。俄日英法各國書籍之關於我國邊疆各省者，汗牛充棟，而我國書籍之關於上述各處者，則反如鳳毛麟角。」（《史地學報》，1.1: 43）

¹⁸⁴ 《史地學報》，1.1: 44。

¹⁸⁵ 《史地學報》，1.1: 44-45。

¹⁸⁶ 陳訓慈在文中說：「(A)促進清史之編定(如此會廣集學者，即可任此事。)(B)發行年鑑為研究資料。(C)搜集無人注意之物可為最近史之史料者。」（《史地學報》，1.2: 219）

在歷史地理學理論的探討方面，史地學報派分別向傳統中國史學與西學汲取養分。中國傳統史學對史地學報派影響最巨的，應屬章學誠《方志略例》與清代學者的歷史地理著作，在這方面史地學報派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舊學以培新知。事實上，分析《史地學報》所刊載的文字，其中清季經世思想的痕跡是相當明顯的；雖然五四時期的反儒學思潮方興未艾，但史地學報派在傳統中國史學中，汲取養分最多的仍屬清季的經世史學，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現象。稍有所異的是史地學報派較重視實踐，與傳統史學坐而論道的治學方式略有不同。因此，史地學報派的歷史地理學不祇是學理的，也是實踐的。如前文所述竺可禎呼籲調查蒙藏地區，陳訓慈提倡當代史料之搜集，皆其著者。這些建議並非空口說白話，而有具體的行動支持。如竺可禎認為田賦需要翔實的土地調查做基礎，否則無法徵收¹⁸⁷，柳詒徵則有〈江蘇之財政〉呼應¹⁸⁸，張其昀亦撰〈上海之地理〉加以實踐¹⁸⁹。至於調查方面，《史地學報》有關實地考察的幾篇文章是最好的注腳¹⁹⁰，惟《史地學報》所刊載的實地考察文章，在比例上未免偏低，就統計所得，《史地學報》4卷20期所刊載的318篇文章中，祇有7篇屬實地考察，占總比例的2.2%；因此，從實地考察的例證，可以瞭解理論與實際之間，仍有很大的落差。特別是竺可禎所提倡的蒙藏調查，僅得張其昀翻譯的一篇〈黃河遊記〉¹⁹¹，以及轉載林長民的〈蒙事略說〉¹⁹²，索倫生的〈西藏旅行談〉¹⁹³。

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之一，無可諱言地，史地學報派在理論和實踐上，常常是有落差的，這也是為什麼不能以相關理論判定其實踐成果的主

¹⁸⁷ 《史地學報》，1.1: 43-44。

¹⁸⁸ 《史地學報》，2.1: 107-125。

¹⁸⁹ 《史地學報》，2.1: 81-90；2.4: 77-87。

¹⁹⁰ 鄭鶴聲，〈地學考察報告——紫金山〉，《史地學報》，2.1: 131-134；〈杭滬定普一帶紀游〉，2.1: 89-99；〈地學考察報告——聚寶山，棲霞山〉，2.5: 135-143；孫逢吉，〈地學考察報告——高資，香山，朝鳳山〉，2.1: 134-137；皆屬實地考察之例。

¹⁹¹ 《史地學報》，1.4: 95-104。

¹⁹² 《史地學報》，2.1: 111-118；此文原刊於《努力週報》第13、14期。

¹⁹³ 《史地學報》，2.1: 119-122；此文原刊於《道路月刊》，2.3。

要原因。當然，以《史地學報》所處的 1921 年 11 月到 1926 年 10 月之間，知識分子所關注焦點，可能是山東問題和軍閥征戰，而無暇顧及實地考察的實踐，遑論邊疆史地的研究調查；這一點也許可以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所在的地理位置加以說明。

事實上，對在東南地區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師生而言，東北和西北地區在地理位置上確實稍遠；因此，雖然竺可禎極力呼籲調查蒙藏地區，但在實踐上仍有其無法克服的困難；所以在有關邊疆史地的研究與調查方面，史地學報派所做的遠不如其所呼籲的。就統計所得，《史地學報》4 卷 20 期 318 篇文章中，有關邊疆史地者僅得 28 篇，占 8.8%；從實地考察和邊疆史地研究這兩項資料來看，史地學報派在這方面的努力，提倡的意義可能大於實踐。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史地學報派對提倡歷史地理學則不遺餘力，刊載於《史地學報》上的論著，討論歷史地理學相關理論的，更是漪歟乎盛哉。《史地學報》有關歷史地理學論著比例為 70.1%，對一分學術刊物而言，其提倡之用心殆可想見¹⁹⁴。但分析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提倡，學理的探討往往多於實際的研究，考察《史地學報》所刊載的文字，一個值得檢討的現象是：何以史地學報派對理論的探討興致盎然？反而在實際的研究工作上有所不足？

對部分學科而言，理論和實際研究之間，其實常是有所隔閡的，特別因為歷史地理學具有理論與實際並重的特色。比較可能的推論，也許是因為處在時代的變局中，史地學報派對實學救國的企圖過於強烈，因而常常出現呼籲多於實踐的現象，並且寄望在學理上有所突破，以彌補實踐之不足。《史地學報》學理的基礎，除來自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與經世思想外，西方歷史地理學的引介也是相當重要的。

有關西方歷史地理學的輸入，張其昀和胡煥庸是史地學報派的要角，兩

¹⁹⁴ 詳細數據，請參閱本文附錄一〈《史地學報》統計資料〉· 1-1〈《史地學報》文類篇數統計〉，1-2〈《史地學報》文類比例統計〉。

人均譯介了不少歷史地理學著作。如《史地學報》2卷2期張其昀譯布倫汗(Jean Brunhes)與克米爾(Camille Vallaux)著《歷史地理學》(*La Géographie de l'Histoire*)之書介，即從農業、人口、政治的角度，分析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性¹⁹⁵。

因此，張其昀的歷史地理學觀點，係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地理學之重要性，因此他所談的地理學非純然之人文或自然地理之領域，這種具有歷史眼光的地理學，或即歷史地理學之所本。

《歷史地理學》的作者布倫汗與克米爾，對歷史地理學所持的態度與史地學報派的認知大抵若合符節，兩人在論著中對世界局勢亦多所縈懷，盱衡當時局勢，布倫汗與克米爾乃對國際聯盟的作為有所批評¹⁹⁶。而此批評似乎恰可做國際聯盟的注腳。此書出版於1921年，正處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之間，而國際聯盟日後之失敗已昭然若揭。由此書之論斷，或可略窺當時中國與西方的歷史地理學，皆為應時事之需要而生，非獨中國為然。

胡煥庸是史地學報派介紹西方歷史地理學最用心的，他從《史地學報》1卷4期起介紹詹姆士·弗爾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所著的《各國歷史所受地理之支配》(*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此書將西方歷史及中國歷史熔於一爐，自遠古到近代皆有所論略，對各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受地理之支配做一條理分析¹⁹⁷；雖然此書所見未必是，但對整體人類史的介紹卻是眼光獨具的。分析《史地學報》所刊載的歷史地理學理論，弗爾格里夫的著作可謂為史地學報派向

¹⁹⁵ 張其昀在譯介的導言中對歷史地理學之今昔，做了概括性的說明：「歷史地理學者(The Geography of History)，明地理在歷史上所占之位置；前世學者類能道之。此門之學，其功用有二：窮源以竟委，溫古而知新，由系統之研究，尋因果之線索，此其一也；現代政治經濟諸大問題，皆有地理的原因，欲解明之，不得不識已然之，所謂彰往而察來，又其二也。是則地理之書，至此方為有用之學。大戰以來，地理學之重要益顯。舉凡國際間之重大問題，果欲得一正確之概念，莫不有賴地理知識與地學原理為之根據。當今談軍事地理政治地理者，其引人入勝之力，遠非十年前所可同日而語。」（《史地學報》，2.2: 73）

¹⁹⁶ 布倫汗和克米爾指出：「政治地理之情形時常變遷，而國際聯盟之大目的，則欲維持已成的局面而不敗，是何能濟。將來之世界，非為普遍的永久的國際聯盟，而為成群的活動的聯邦。」（《史地學報》，2.2: 77）

¹⁹⁷ 《史地學報》，1.4: 133-139；2.2: 79-84；2.3: 103-108；2.5: 85-96；2.6: 109-122。

西方所取的“經”，部分《史地學報》之相關論著，所引述的西方歷史地理學理論即出於此。

在學理探討上，史地學報派一方面追溯歷史的淵源，另一方面又對現實有所關懷，弗爾格里夫的著作正好是典型的代表。雖然就學術的客觀性加以考察，此類泛現實論的學術研究方式，可能存在著政治現實與客觀學術間的張力；但如吾人將時空回到《史地學報》所處的時代，可能會獲得較多同情的瞭解；以當時的學術環境而言，世界局勢詭譎多變，不論中國或西方學術界，對時事的觀察與期許，可能都是無可避免的。除此而外，弗爾格里夫亦前瞻未來世界之發展，此一論點與史地學報派關心時事及為國家未來謀之行徑，有異曲同工之處。

就《史地學報》所引介的外國歷史地理學著作而言，主要來自五個地區：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蘇聯，《史地學報》介紹的外國史地之學中，美國占了所有外國史地的 50.7%，是比例最高的¹⁹⁸，這很可以說明當時世界局勢主導者的影響力；其次是英國 36.5%，德國 13.5%，法國 11.5%，就當時的世界勢力而言，美國是主要的領導者，史地學報派以美國為介紹西方學術之媒介，是可以理解的；英、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地位，也使中國知識分子心嚮往之；德國雖為戰敗國，但其學術在當時亦為世界首屈一指者。但是，除了國勢的強弱之外，語言的熟習程度亦需列入考量，美國和英國方面的介紹較多，可能和史地學報派所能應用的外文能力有關，如張其昀介紹布倫汗(Jean Brunhes)與克米爾(Camille Vallaux)《歷史地理學》(*La Géographie de l'Histoire*)時，就必須透過英文的書介。至於俄國在 1917 年的革命之後成為當時中國的新顯學¹⁹⁹，史地學報派對俄國時事或學術理論的介紹，是可以理解

¹⁹⁸ 此處以《史地學報》4卷20期刊載有關外國史地之學的全部文章為基準，亦即以文章中提及外國史地之學的全部為100%；詳細數字，請參閱本文附錄一〈《史地學報》統計資料〉·1-3〈《史地學報》外國史地國別統計〉。

¹⁹⁹ 關於俄國革命之後的情勢，可參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265-296。

的。在有關俄國的介紹方面，向達於《史地學報》2卷6期譯介〈俄國革命時歷史研究之狀況〉，此文原為俄國A. Presniakov教授所作，由 E. Arousberg 譯為英文，刊載於美國《史學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23年1月號，原標題為“Historical Research in Russia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Crisis,”向達再由英文譯為中文²⁰⁰。在這篇介紹俄國歷史研究的文章中，作者將革命期間的歷史研究做了頗為周延的介紹。

比較難瞭解的是，《史地學報》何以對日本史地之學介紹如此之少？就當時所面臨的外患問題而言，日本是中國的頭號敵人，理應對日本的歷史地理研究多所介紹，以收知己知彼之效，但就《史地學報》所刊載的論著來看卻非如此；分析當時內在與外在因素，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史地學報派熟習日文者可能較少；其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所在地——南京，屬英美勢力範圍，雖然此時日本於上海與南京亦有其勢力，但比較上而言，似不及英美，因此史地學報派在取得日本資訊上可能稍較不易；其三，史地研究會的指導員竺可禎與徐則陵均留學美國，在介紹相關研究時自以英美之著作為主。

從《史地學報》引介的各國歷史地理學來看，史地學報派的眼界是相當廣廓的，他們並不侷限於中國，而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態度，引介西方的歷史地理學理論，這一點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事實上，《史地學報》自始即對歷史地理學有所用心，在當時國人求變的風氣籠罩下，祇要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各種學說，知識分子無不傾力為之，引介各國歷史地理學亦惟其中之一端而已。

除因應現實與時事之需要外，史地學報派對地理與人生之關係亦有所著墨。竺可禎在〈地理對人生的影響〉文中，即從地形和氣候兩方面進行討論，引述西方理論和中國的實際狀況加以分析，認為不同的氣候，不同的地理環境，所孕育出來的民族性有其差異。此文在立論和引據上，採中西並舉的方

²⁰⁰ 《史地學報》，2.6: 123-131。

式，但大部分學理上的例證仍以西方為主。如在討論地形的影響時，竺可禎分爲山嶺、平原、河流、海洋四方面加以討論，有關山嶺的部分舉喜馬拉雅山、阿爾卑斯山爲例，平原則歐洲、西伯利亞、印度、中國並舉，河流方面亦是德、英、法、波蘭、中國同析，海洋尤遍及五大洲。竺可禎更進而將地形與氣候對人的影響，做一條理之分析，他認爲不同的地形和氣候，會造成人種的差異，進而產生文化取向有別，而變化不定的氣候也促成了文化的進步²⁰¹；由此文可以看出竺可禎在討論地理與人生之關係時，引用材料中西並舉的情形，而最後他仍將這些責任歸結到知識分子身上，這和他在〈我國地理學家的責任〉中的呼籲是一脈相承的²⁰²。從竺可禎的論點，可以瞭解他在歷史地理學的領域，雖然迭引西方學者之著作，但基本上要解決的還是中國問題。

竺可禎對西方地理學涉獵甚深，所以他的著作引述西方地理學理論之處亦最多，在〈地理對人生之影響〉文中即提到近代西方地理學的發展²⁰³。竺可禎所提倡的地理學比較接近人文地理，他在《史地學報》所發表的論著亦偏向這一方面，雖然他本身在美國學的是氣象學和地理學，在理論上似應較近於自然地理；但可能因爲時代的需要，竺可禎反而對人文地理多所提倡，且因人文地理本即涉及歷史，因而竺可禎在提倡地理學的同時，亦對歷史地

²⁰¹ 竺可禎在〈地理對人生的影響〉文中說：「環境一方面逼迫人勞其手足，困其心志，在他方面就叫你有發展進步，這才能在文化舞臺上佔一位置。我國既為世界文化發祥地之一，而且地形氣候，統有保持文化先進國的優勢，欲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在人民努力做去，這責任不在別人，就在我們一輩子！」（《史地學報》，2.1: 12）

²⁰² 《史地學報》，1.1: 41-45。

²⁰³ 竺可禎指出：「十八世紀以前的地理課本，都注重於形勢，名勝，疆域一方面，換一句話，地理兩字，在那時候，全是政治地理的代名辭，簡潔少有地理與人類的關係。十八世紀以來，研究地理的人漸次轉移他的目光到地理與人生的關係上去。法國有孟德斯鳩(Motesquieu)，德國有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Carl Ritter，但人文地理的鼻祖，要推德國地理家Rutzel了。他在十九世紀末葉，曾著《人文地理》(Anthropogeology)一書，把地理與人生之關係，講得很透徹。裏面大意是：地面上有各種地形，各種氣候；無論那一種地形或氣候，對於人生必有一定的影響。人生因所處的地位不同，人的性情體格，不得不適應環境而變遷，因此便生出文化程度高低的差異。」（《史地學報》，2. 1: 1）。

理學的發展有推波助瀾之功。

王學素所譯述的〈地理研究之計劃〉，介紹了美國地理學研究的近況，是一篇規劃美國地理學研究藍圖的文字²⁰⁴。此文作者台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曾任哈佛大學地理教授多年，對美國的地理教學貢獻良多。在這篇研究計劃中，作者將如何成立一具有學術水準的地理學中心規劃頗詳，而這篇研究計劃本來就是為克拉克(Clark)大學所擬的，文中論及區域地理、野外考察、標本圖書保存與各種必需之設備、天文學理論、地理學家與遊歷者的差異、地理研究院的成立標準等等，可說對地理學的各個層面均有所顧及。比較特別的是台維斯提及研究地理可符合商業之需要，這一點倒是頗別出心裁²⁰⁵。

分析《史地學報》所引介的外來學說，其向度是相當廣的；但也可能因為在西學上多所採擷，使得《史地學報》的內容不免龐雜。但就整體而言，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關注確有普遍的一致性。除了一期(3卷1-2合期)歷史地理學文章較非歷史地理學者少，以及兩期二者相同(1卷2期、3卷4期)，其他諸期《史地學報》有關歷史地理學的著作一直維持相當高的比例。

由於歷史地理學並非孤立的學門，而具有與時代共脈搏、同呼吸的特性，所以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如果將歷史地理學的發展與時代抽離後加以分析，很可能造成的現象是紙上談兵。因此，史地學報派特別用心於史學的實用功能，確有其學科特色之必要性。從此一角度加以分析，對《史地學報》所刊載文章屢屢涉及當代史，便可以獲

²⁰⁴ 《史地學報》，2.2: 19-32。

²⁰⁵ 台維斯指出：「地理工程師，所以為經營國際商業之用。今之商業經營，多遠隔重洋，設無熟悉其地情形之人，則其商戰，必歸失敗，故斯人也，於國際商業上，實益形重要，則斯人也，非地理工程師莫屬矣。地理工程師，可於地理學研究中養成之，其所需之技能，則除地理學應有之基本知識外，而尤宜精於經濟地理及區域地理等可稱之為地理工程學；其尤要者，則為出外旅行，藉以豐富其經驗，而增加商業上之利益。但此種經驗可借老鍊之專家，同出旅行，以得之也。此類人材，現宜由研究院中養成之。」（《史地學報》，2.2: 32）

得較周延的解釋；亦惟如此，史地學報派的實用史學觀念方有其落腳處，史學經世的精神亦得以發揮。

事實上，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史學的實用性一直是普受討論的，《史地學報》提倡歷史地理學，就當時的情勢而言，主要是為了解決當前的問題，而較少為學術而學術的成分。因而在向西學取經時，不論是歐、美、俄國或日本，祇要有助於經世致用者，均為其取法之對象。而且這些地區也是當時世界舞台的核心，自然成為史地學報派取經的對象。更重要的是：史地學報派所亟於努力的，正就是如何使中國躋身於世界舞台；不惟史地學報派如此，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莫不以此為標的。從此一角度思考，對史地學報派之致力於歷史地理學，當可有進一步地瞭解。

經世史學在中國史學形成的過程中向居重要地位；清代史學之發展表面看似乎以考據為主流，但其經世的一面依然存在²⁰⁶，清中葉以後的西北史地研究即其例證；康有為因變法之需要而創立了三世進化史觀²⁰⁷，亦可列入此一系統；致力於救亡圖存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以歷史地理學為學術救國的手段，亦係此一觀念影響下形成。分析《史地學報》的內容，不難發現經世史學的影響，如果刻意排除經世史學，那麼，對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很可能會有隔靴搔癢的誤解。事實上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中，史學的經世的精神，一直有其重要地位，北大和南高在這方面的觀點是一致的，雖然他們在研究取向上確有所異，但骨子裡的救亡圖存思想卻殊無二致。如謂《史地學報》對時事的關注本於經世史學，那麼，“片馬問題”和“青島問題”可能就是其中最好的演練。

竺可禎在《史地學報》2卷2期發表了一篇演講〈青島接收之情形〉²⁰⁸，說明根據華盛頓會議中國收回青島的經過。因為日本對青島早有覬覦之心，在中國接收的過程中不斷加以干擾，因此整個接收的情形並不順利，竺可禎

²⁰⁶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廣文書局，1983)，277-322。

²⁰⁷ 蕭公權，《康有為思想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37-178。

²⁰⁸ 《史地學報》，2.2: 85-90。

將礦山、鹽田、郵政、電報、氣象測候所等機構或財產的接收分項加以敘述，而對接收之失敗責任歸屬亦有所分析，是一篇頗具臨場感的報導文字。在此文中，竺可禎對日本的觀察相當細膩而深刻²⁰⁹，而竺可禎的分析，可以說是典型以經世史學觀點對時事加以針砭的例證，而類此之行徑，在《史地學報》可謂屢見而不鮮，亦足堪說明經世史學乃史地學報派之宗旨所在。

趙祥瑗的〈片馬問題研究〉²¹⁰，則是經世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結合的一個典型例證。此文從歷史的角度，探討緬甸、雲南與中國的從屬關係，並就地理位置分析國防之需要，以歷史地理學的交錯縱橫，剖析片馬問題的重要性，因而對政府的麻木頗有微詞²¹¹；因而提出了宣傳、勘界、後備的三個解決方案²¹²；趙祥瑗的論點，頗能切合實際的情況，殆非書生之論。處在列強環伺的時代，知識分子以歷史地理學為基礎，建議政府處理涉外關係，乃實學報國的具體實踐。因此，趙祥瑗認為「而我國勘界得人，防範周密，內而民氣激昂，內而土司騷動，勢亦有所難當，自不能不讓步於後。英既讓步則

²⁰⁹ 例如在分析日本對接收工作的干擾時，竺可禎即提出了兩項重要論點：「1.青島被我收回，日人心有所不甘。乃私結土匪，滋擾地方治安，以觀中人是否能整理之。否則彼或乘間而復取之。2.青島之接收，實動全世界之視聽。美邦某報館，且特派訪員，故此接收青島事情，於我國國體上，有極大之關係。日人故意騷擾，雖不能將膠澳再歸彼統治權之下，亦將辱我國體，以騰笑全世也。」（《史地學報》，2.2: 87）

²¹⁰ 《史地學報》，2.4: 109-121。

²¹¹ 趙祥瑗認為：「片馬問題，已險惡如彼，政府當局猶麻木如此。吾民負興亡之責，自不能恣然置之。為今之計，吾國不能不籌一具體辦法，據理力爭，以謀一勞永逸。」（《史地學報》，2.4: 120）

²¹² 趙祥瑗指出：「一、關於宣傳者：將野人山片馬等地與我國歷史上之關係，與英人強奪之情形，敘述周詳，露布於中外報紙，訴之世界公論，以喚醒我政府國民，以揭彼英之野心。二、關於勘界者：促政府派精於輿圖之專家，赴野人山一帶實地考察，以明真相而為勘界之準備。派熟悉歷次滇緬界務情形而長於外交者，與之嚴重交涉，勘定邊界。限日使英撤回駐紮片馬兵隊及一切不合理之設施。三、關於後備者：國民連結一體，作示威運動以鼓民氣。移滇川蜀三省兵隊，盛設滇邊，以防不虞。英長於海軍而絀於陸軍，不幸決裂，我國亦未始不能相持。」（《史地學報》，2.4: 120-121）

野人山片馬諸土保。野人山片馬諸地保，則川滇蜀藏諸省安，而長江粵江兩流域，亦可稍殺英人之勢力矣」²¹³。

以經世史學與歷史地理學觀點對時事多所縈懷，是史地學報派治學的根本，因而在時事變動較劇烈時，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關注亦愈多，反之，在時事較為平緩時，史地學報派則較用心於一般史地之研究，這種學術與時事之間的互動，是歷史地理學興起過程中極為特殊的一個現象。

《史地學報》對歷史地理學的關注略如上述，其內容可由下面幾個方向加以討論：

其一，整理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歷史地理學：在這方面用力較勤的是柳詒徵、梁啟超、張其昀、鄭鶴聲和劉揆藜等人；張其昀對章學誠《文史通義》和《方志略例》的推崇，使章學誠成為史地學報派有關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理論的中心；柳詒徵在傳統中國史學的涉獵甚為廣泛，如〈漢人生計之研究〉²¹⁴，〈正史之史料〉²¹⁵，〈大夏考〉²¹⁶等文，均從傳統史學中擷取材料加以匯整；梁啟超提倡的歷史統計學，以傳統史學為例證，可謂別出心裁；劉揆藜的〈史法通論〉整理傳統史學方法，為傳統史學開創新機；鄭鶴聲論析司馬遷的史學與清代學者的歷史地理研究；凡此皆於傳統中擷取菁華，並加以創新之例證。

其二，介紹外國歷史地理學：在輸入西學方面，史地學報派著力甚多，竺可禎、張其昀、胡煥庸、陳訓慈和王學素均其要角，竺可禎對地理學的介紹及身體力行，是史地學報派地理學理論的領航人；張其昀譯介美國與歐洲歷史地理學；胡煥庸對西方理論的引介及對時事的關懷；陳訓慈和王學素有關於歐美歷史地理學理論的譯著；使《史地學報》在中國傳統史地之學外，找到新的養分，並因而拓展了歷史地理學的視野。

²¹³ 《史地學報》，2.4: 121。

²¹⁴ 《史地學報》，1.2: 313-318。

²¹⁵ 《史地學報》，2.3: 39-48。

²¹⁶ 《史地學報》，2.8: 63-66。

其三，實地考察的實踐：歷史地理學固非案頭紙上之學問，尚需實踐支撐，竺可禎、柳詒徵提倡於先²¹⁷，鄭鶴聲、孫逢吉實踐於後，雖然竺可禎提倡的調查蒙藏地區未曾履踐，相關的地學考察亦侷限於東南地區，但對實地考察確有開啓風氣之功。

其四，對史地教學的提案與教科書之編寫：歷史地理學的扎根工作極為重要，史地教學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在這方面，柳詒徵的〈商榷中小學歷史教學的意見〉提案，梁啓超的「中學國史教本目錄」；徐則陵的「高級中學世界文化史學程綱要」；張其昀的「中學地理教育綱要」和親自編纂的《初中地理》教科書；都是關心史地教學的例證。

整體考察《史地學報》的內容，及其所提倡的歷史地理學，可以明顯看出史地學報派的治學取向：一面涵泳於傳統中國史地之學，一面向西學汲取養分。分析《史地學報》所刊載的論著，不論在歷史或地理學範疇，均有所取於傳統中國史地之學，同時亦介紹西學以養新知。雖然在介紹西學時不免有半生不熟的情形出現，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這類適應期是必須的；而在涵泳傳統中國史地之學的部分，雖別有所愛於經世史學，難免在學術客觀與政治現實之間略有所倚，但處在當時的環境，似亦無須多加苛求。整體而言，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史地學報派在提倡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風氣上，確然有其一定的階段性意義。

《史地學報》是古史辨運動初期最重要的反對陣營，在古史辨運動初啓時，曾扮演堅強的反對者角色。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古史辨運動無疑具有相當程度的爭議性。擁護者認為是播醒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鼓角，反對者認為是破壞傳統文化的罪魁禍首，而緊咬住“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以今日吾人的後見之明來看，古史辨運動無疑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結，在五四與後

²¹⁷ 竺可禎，〈我國地學家之責任〉，《史地學報》，1(1)，頁44；柳詒徵，《史地學報·序》，《史地學報》，1.1: 1。

五四時期所造成的狂風巨浪，影響深遠，迄今未衰。現代中國史學的上古史研究，基本上就是從古史辨運動鳴槍出發的；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者，不論贊成或反對古史辨運動，均不能不注意此一運動所造成史學觀念的轉變，特別是對儒學經典的重新定位，有助於研究工作者以現代眼光來看待原本不容置疑的“六經”，重新審定史料的可信度，這是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轉折。

1923年4月27日，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錢玄同，信中引述許慎的《說文解字》，說大禹「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²¹⁸，就是這段話點燃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其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即緊咬“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不論顧頡剛的觀點如何改變，反對者完全不予理會。收到這封信的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亦表示他並不贊成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點²¹⁹；而顧頡剛亦將“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拋棄²²⁰，但顯然未被反對者所接受。

²¹⁸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禹從何來？禹與桀何以發生關係？我以為都是從九鼎上來的。禹，《說文》云『蟲也，從 𧈧，象形。』《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是開天闢地的人。」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重印本），1/63；這封信在1923年4月27日加了一段案語，4月28日加了一段附啟，發表於1923年5月6日出版的《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古史辨》，1/59-66；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81-82。

²¹⁹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云：「先生據《說文》云“從 𧈧”而想到 訓“獸足蹂地”，以為大約是蜥蜴之類，竊不謂然。《說文》中從“ 𧈧”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從“ 𧈧”（如“禽”、“萬”、“罍”、“獸”諸字）。那象形九聲而義為“獸足蹂地”之“ 𧈧”字，殆漢人據訛文而杜撰的字。」此信寫於1923年5月25日，原刊於：《讀書雜誌》，10（北京，1923.6.10）；收入：《古史辨》，1/67-82，所引在69。

²²⁰ 顧頡剛在〈答柳翼謀先生〉中，已將《說文解字》有關“禹”的釋放棄，該文原刊載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14（北京，1926.1.13），收入：《古史辨》，1/223-231，所引在227；在《古史辨》第2冊〈自序〉，顧頡剛再度說明：「最使我惆悵的，是有許多人只記得我的『禹為動物，出於九鼎』的話，……其實這個假設，我早已自己放棄。就使不放棄，也是我的辨論的枝葉而不是本幹；這一說的成立與否和我的辨論的本幹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反對者中以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的師生為主體,包括當時擔任教授的柳詒徵,猶是學生身分的劉揆藜、陸懋德,就讀於清華學校的張蔭麟,以及胡適的族叔胡堇人等。

雖然《古史辨》第1冊出版於1926年,但顧頡剛與胡適、錢玄同討論古史的來往書信早在1920底到1921年初之間就已經開始²²¹。

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主題,相關論著甚夥²²²。美國漢學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教授《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裡;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此書著重清代樸學考據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民俗戲曲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從走向民間的角度,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古史學,論點與美國漢學家施耐德教授接近。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礎。德國的吳素樂(Ursula Richter Chang)女士以《古史辨》為碩士論文,以顧頡剛為博士論

²²¹ 《古史辨》第1冊收錄的前14封信,始於1920年11月23日至1921年1月28日之間,均為顧頡剛與胡適往來討論姚際恆《偽書通考》與崔述《考信錄》的文字;第36篇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與第37篇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才是真正點燃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

²²² 本文主要焦點集中於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因此不擬詳細討論古史辨運動的所有內容,對古史辨運動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下列著作:(1)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中譯本: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2)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3)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4)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高鼎文化出版社,1993)。

文。吳素樂女士曾於 1981-1982 年間兩度前往北京，對顧頡剛生平資料做過相當徹底的整理²²³。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從 1923 年的古史辨運動，到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北方學派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這裡所謂的北方學派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北方學派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²²⁴，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²²⁵；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²²⁶，我們發現北方學派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派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議題的地位，而且相關論題所引發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本文之作，一方面耙梳古史辨運動形成的因素，另一方面則試圖探索反對者所扮演的腳色，以及反對陣營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所代表的意涵。

²²³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5。

²²⁴ 有關北京大學國學門的研究，請參閱：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²²⁵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²²⁶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Wang Fan-shen, *Fu 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王汎森教授新出版的論文集《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第三編收錄5篇論文，與附錄2篇論文，主要即以北方學派為論述主體，請參閱：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305-527；杜正勝教授《新史學之路》一書中，〈二、前賢的鏡鑑〉所蒐錄的7篇文章，除〈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之外，所論均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北方學派；〈三、實踐與試驗〉所蒐錄的3篇文章，所討論對象均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91-328；劉龍心，〈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四)吹響現代中國新史學的號角

《古史辨》第1冊出版於1926年，據《古史辨》第1冊所收錄函札來看，似乎很容易獲得這樣的結論：顧頡剛討論古史主要是受胡適的影響。而且，如果只讀《古史辨》第1冊〈自序〉而不細心分析7冊《古史辨》的內容，也很容易有這種錯覺，更易誤解的可能是過度擴大杜威實驗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事實上，古史辨運動是因緣際會下的產物，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儒學權威性崩解後亟求新索的契機，中西學術的激盪，民間文化的挪移，在在都影響了古史辨運動發生的可能性²²⁷。

1.今古文之爭的新命題

清代學術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由考據向經世傾斜，在變動的世局下，知識分子紛紛採取各種方法，冀期清王朝能夠脫離積弱不振的困境，經世思想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清代的公羊學運動有兩派，一派為經生派，由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凌曙、陳立、皮錫瑞一脈相承者，此派學者研究今文經學，實事求是，抉微闡幽，雖不免於家法成見，但志在恢復西漢經學，在學術上厥有新猷；另一派為政論派，由龔自珍、魏源所開啓的變法思想，以學術為政治之用²²⁸，下開廖平、康有為、梁啟超思想之先河，廖平、康有為尤為今文學政論派的典型代表²²⁹。

²²⁷ 我曾以複音音樂的觀點解釋晚清和五四史學，古史辨運動顯然亦呈現這種現象，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19-26；彭明輝，〈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收入：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2），1-66。

²²⁸ 湯志鈞，〈清代常州經今文學派與戊戌變法〉，收入：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80-92；特別是85-86。

²²⁹ 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收入：周陽山、楊肅獻（編），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193-242；有關今文學部分在235；齊思和，《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340-357；惟齊思和教授《中國史探研》將龔自珍、魏源放在政論派，〈魏源與晚清學風〉則將龔自珍、魏源置於經生派。

由常州學派莊存與、劉逢祿一路下來的今文家們，一面致力於學術考辨，另一面則是學術與現實政治結合，使得晚清的經世思想得以借孔子之屍，還其變法之魂²³⁰。這種借屍還魂的現象，使晚清今文學派的歷史解釋，依違於考辨學術真偽與為現實政治服務之間。基於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目的，使得今古文之爭不再是純粹的學術真偽問題，而成為家法與現實政治的意氣之爭。今文家不斷曲解孔子的意旨，注入自己的變法改革思想，無形中將今文經原有的學術地位亦加以鏟除²³¹。這種弔詭的發展，正好替五四時期的儒學衰頹、諸說並起，做了很好的鋪路工作，古史辨運動正巧站在這樣的轉捩點上。

疑古派一面自詡為以“科學方法”整理古史，一面自清學汲取養分，大抵而言，顧頡剛援引今文學者攻擊古文經的部分，用崔述“考信於六藝”之說，懷疑諸子關於上古史事的可信度，然後再用古文家的說法攻擊今文經。顧頡剛表明其宗旨是：“依據了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²³²，其思想淵源即直承清學“回復古代的各種家派”而來²³³。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將這種回復古代家派的途徑，解釋為“以復古為解放”²³⁴，余英時教授則借用“回向原典”的觀念加以解釋²³⁵。而清學“以復古為解放”的學風，與

²³⁰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113-118。

²³¹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193-208。

²³² 顧頡剛，《古史辨》，1/〈自序〉，65。

²³³ 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自序〉云：「清代的學風和以前各時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必要把學問歸結於政治的運用，清代學者則敢於脫離應用的束縛，以前說好規定崇奉的一尊，而清代學者為要回復古代的各種家派，無意中把一尊的束縛也解除了。」顧頡剛，《古史辨》，1/〈自序〉，77。

²³⁴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指出：「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1995），11。

²³⁵ 余英時教授認為清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是一種“回向原典”的歷程；參考：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收入：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87-156；余

現代史學的“一手史料”觀念頗為接近，所以當清學回復到先秦之古以後，1920年代的疑古派甚至連“六經”、諸子都加以懷疑了。

古史辨運動不僅以戰國諸子之學攘漢學，甚至拿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這個擊碎玉連環的方法，到最後所相信的就只剩下《論語》，甚至連考訂《詩經》真偽，亦以《論語》是否曾引述為標準²³⁶。

事實上顧頡剛擊學疑古大旗的目的，並不在經學考據或家派分野，而是古史的真偽，但因“六經”本為古史記錄，因此不得不將儒學經典當成要擊碎的對手，顧頡剛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中就明白揭出這個論點。用今文家的說法攻古文經，用古文家之說攻今文經²³⁷，這樣一來，儒學經典就陷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境地了。

2. 胡適與杜威實驗主義

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胡適，引進杜威(John Dewey)實驗主

英時教授亦以此說論析清代經世之學，參考：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經世致用〉，收入：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418-431；案“回向原典”源自西方學者有關《聖經》的討論，因為中古僧侶對《聖經》所做的層層解釋，使《聖經》失去其原有面貌，因而學者提出回到《聖經》原始文本，再探索其意涵，其後發展出西洋文學批評的詮釋學(傳釋學)理論；參考：葉維廉，〈與作品對話：傳釋學初探〉，《聯合文學》，2.10(臺北，1986.8): 184-199。

²³⁶ 《古史辨》第4冊的討論文字，第1冊用《詩經》討論禹的問題都與此有關；反對陣營的張蔭麟認為，在這些地方顧頡剛顯然誤用了“默證法”，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四、南北與新舊”。

²³⁷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云：「『今文家攻擊古文經偽造，這話對；古文家攻擊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這話也對。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象。……』這番議論從現在看來也不免偏，偏在都要撕破，容易墮入虛無主義。但在那時，當許多經學家在今、古文問題上長期爭議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極銳利，極徹底的批評，是一個擊碎玉連環的解決方法，我的眼前彷彿已經打開了一座門，讓我們進去對這個二千餘年來學術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後的判斷了。」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臺北：里仁書局，1985)，〈序〉，5。

義(Pragmatism)²³⁸，並且杜威本人也在 1919 年到 1920 年之間到中國巡迴講學，使得杜威著作被廣泛地譯為中文，加上胡適本人的博士論文〈中國名學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China”)²³⁹，即是運用杜威實驗主義為方法，以中國古籍為材料寫成著作的最佳典範²⁴⁰。因顧頡剛與胡適有師徒之誼，顧頡剛又提出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主張，使得古史辨運動很容易貼上杜威實驗主義的標籤，亦加強顧頡剛受胡適影響而從事古史辨運動的說服力，美國漢學家施耐德《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即採取此一觀點²⁴¹。

胡適提倡的杜威實驗主義，可以說是五四時期影響中國學術界極巨的重要思想。胡適將杜威學說簡化成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論，並用這一套方法批評、分析各種學問，而非著重於杜威實驗主義的理論架構²⁴²。因此，胡適在歷史研究中所重視的，只是一家學術或思想背後的方法與態度而非實際內容。而“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以及“拿出證據來”，就在這種想法之下提出，實驗主義亦成為他治學上的萬靈丹。

胡適將杜威實驗主義的兩個重要方法：“歷史方法”與“實驗方法”²⁴³，運

²³⁸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s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70), 173-209.

²³⁹ 此論文其後改名《中國哲學史大綱》，再改名《中國古代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²⁴⁰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20。

²⁴¹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62-63.

²⁴² 許冠三教授認為胡適“只有淺出，而無深入”，並且認為胡適對杜威實驗主義“事實上從未充分領會並運用它的精義”；甚至批評胡適淺薄或不知長進；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164-165；但本文不擬討論這些問題；而將重點放在胡適所了解的杜威學說究竟為何，以及杜威實驗主義對古史辨運動產生哪些影響。學說的傳播，有時其實是透過“誤讀”(misreading)的程序，對胡適而言，很可能正因他用淺白的文字介紹杜威思想與方法論，因而才造成如此大的影響。胡適雖然過度強調方法論，但反過來說，正因胡適如此重視方法與方法論，導致看事物的眼光不同，才會將春秋時代諸子學說的不同只當成“為學方法”的不同，程、朱、陸、王的不同也簡約成方法的不同，才能夠“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諸子與各家、各派的觀點。

²⁴³ 胡適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中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

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

用到中國材料上，對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造成普遍而廣大的影響。胡適在史學方面的貢獻，可從兩方面來了解：1.超越儒學體系：胡適將“六經”與“諸子”放在同一個平臺，用平等的眼光對待²⁴⁴。雖然自晚清以來，章太炎、梁啟超提倡諸子學亦有這種傾向²⁴⁵，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提供的並非個別之觀點，而是一整套的典範，所以才造成了革命性的影響²⁴⁶。2.將通俗文學列入研究範圍：傳統中國學術多以經史為重心，輕視通俗文學，胡適將小說當成社會史、經濟史的材料，擴大了史學的範圍，尤其他將小說版本與歷代政治、思想演變相結合，以補充正史之不足。胡適將小說與儒家經典放在同樣的地位加以批判、研究，脫離了傳統儒家的權威性與家派之束縛，以平等的眼光對待一切典籍與文獻，這些對顧頡剛發起古史辨運動造成重要的影響。

3.科學主義的影響

顧頡剛本人在《古史辨》第1冊〈自序〉中，曾坦承他對科學認知的淺

特別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分開來可作兩步說：

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當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孫子。抓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歷史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歷史上佔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

實驗的方法——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4/380-381。

²⁴⁴ 胡適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貢獻是：「我那本著作裡至少有一個新特徵，那便是我(不分“經學”、“文學”)把各家思想，一視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與孔子並列，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學術界]便是一項小小的革命。」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216。

²⁴⁵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189-217。

²⁴⁶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79-88。

薄²⁴⁷。胡適雖然在和李大釗辯論時要學者「多談方法，少談主義」²⁴⁸，但胡適自己也無可避免地犯了“科學主義”的毛病²⁴⁹。胡適所提倡的科學方法，嚴格地說，其實是清代學者的樸學考據。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胡適認為：「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²⁵⁰。所以，胡適雖然頭上戴著杜威實驗主義的帽子，實質上他所倡導的“科學方法”，是頗為粗陋的，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²⁵¹，並經由歸納法得出結論。

身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燃燈者之一的胡適，在五四時期各種文化向度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腳色，從文學革命、整理國故到中西文化的討論，胡適均親歷其役²⁵²。而在這些論戰中，不論贊成或反對其理論的學者，均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問題為出發點，余英時教授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即認為，「從思想史的觀點上，胡適的貢獻在於建立了孔恩(Thomas S. Kuhn)所說的新典範(Paradigm)」²⁵³。

顧頡剛究心古史固受胡適之啓迪，有趣的是，他對科學的認知也和老師胡適一樣是說得多做得少。如果顧頡剛真的服膺“科學方法”進行古史討論，那麼，他所採取的將是一條一條細密考證史料的歸納法，而不是一開始就

²⁴⁷ 顧頡剛，《古史辨》，1/〈自序〉，94-95。

²⁴⁸ 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4/113-126。

²⁴⁹ 郭穎頤和林毓生教授即指出胡適的科學方法其實是一種科學主義；郭穎頤(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91-92.

²⁵⁰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作品集》，4/155-185。

²⁵¹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作品集》，4/182。

²⁵²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

²⁵³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余英時教授指出，胡適所建立的“新典範”約略具有孔恩所說的廣狹兩義，就廣義方面而言，涉及全套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的改變；就狹義方面而言，胡適的具體研究成果(如《中國哲學史大綱》)，則起了示範的作用。即一方面開啟了新的治學門徑，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20。

全面否定上古史的可信度，就此點而言，顧頡剛的先有成見而後動手找材料證明其說，毋寧是比較接近“刺蝟式”立論而非“狐狸式”²⁵⁴。

4. 民俗戲曲與典籍史料化

顧頡剛對上古歷史的懷疑，亦從民間文學蘊含變化為切入點。

進入北大後，顧頡剛常和同學三五成群去看京戲，但較那群票友多了一份對戲曲故事演變的研究熱誠，甚而利用閒暇撰寫《論劇記》。顧頡剛發現受到編戲者的想像各自不同、無意訛變、過分點綴、來歷異統、形式限制等影響²⁵⁵，同一故事所衍生的甲戲和乙戲竟有極大差距²⁵⁶；顧頡剛後來從事歌謠採集與整理²⁵⁷，以及致力於蒐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加上胡適在〈水滸傳考證·序〉中談到小說的著作和版本問題，使得顧頡剛的想法更形穩固，因此以研究故事變遷的眼光，來觀察古史變遷。

古史辨運動的形成，殊非單一線索所能解釋，包括杜威實驗主義、經今古文問題、戲曲與小說、故事的眼光等²⁵⁸；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以平等眼光看待儒學經典與民間戲曲，造成現代中國史學的史料觀念革命。

由於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儒學經典與民間戲曲，發展出“典籍史料化”的觀

²⁵⁴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在討論托爾斯泰的歷史觀點時，曾以“刺蝟”和“狐狸”為喻；“刺蝟”型指將所有觀點都貫穿於單一的中心見解，將所思所想歸結為一個一貫而明確的系統；“狐狸”型則與“刺蝟”型相反，毋須有明確的中心系統，而從事於多方面的探索；參考：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1-2.

²⁵⁵ 葉憶如，〈顧頡剛古史神話觀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71-75。

²⁵⁶ 西方歌劇也有不少類似情況，如莫差爾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的《費加洛婚禮》(*Le nozze di Figaro*)，和羅西尼(Gioacchino Rossini, 1792-1868)的《塞爾維亞理髮師》(*Il Barbiere di Siviglia*)，主角均為費加洛，而故事情節不同，可謂標準同源異形的歌劇。

²⁵⁷ 顧頡剛以薛仁貴和薛平貴的故事為例加以說明。詳見：顧頡剛，《古史辨》，1/〈自序〉，20。

²⁵⁸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50-204。

念。典籍史料化係指將傳統中國的目錄學分類拆散，使經史子集的內容，成為辨偽書與偽事的材料，而無高下等第之分²⁵⁹。我們注意到古史辨運動時參與論辨的學者們(不論贊成或反對)，所使用的材料與方法，都顯示他們是在同一學術平臺進行討論。這種在同一平臺進行討論問題的方式，使古史辨運動得以造成風潮，捲起千堆雪，這是其他時代辨偽工作者所沒有的背景，而其中將“六經”與“諸子”史料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古史辨運動打破儒學定於一尊的古史解釋，使後來的史學工作者可以用平等眼光看待一切上古史料，這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顧頡剛指出古史辨運動時期，研究古代典籍風氣勃興的兩個因素：1.學問上的束縛解除了，大家可以做自由的批判；2.文籍考訂學的方法趨於一致，而觀點頗有不同，因此易起辯論²⁶⁰。加上古史辨運動承繼晚清以來研究諸子學的流風餘韻，將經學與諸子學放在同一天平上稱斤掂兩²⁶¹，打破儒學長期以來對傳統中國的支配性²⁶²，掃除儒學“經世”理論的主體性，撇開學術與政

²⁵⁹ 錢玄同在1921年致顧頡剛的信札〈論近人辨偽見解書〉說道：「考辨真偽，目的本在於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真象，與善惡是非全無關係。即以孔二先生而論，假使〈禮運〉是偽書，《春秋繁露》非孔學之真，則“大同”之意，“三世”之說，縱極精美，卻不可視為孔學，假使《墨子·非儒篇》或《莊子·盜跖篇》等不但非偽書，而且所記是實錄，則我們雖甚愛孔二先生，也不能替他遮掩剝人家衣裳的拆梢行徑和向土匪磕頭禮拜的醜態。」錢玄同，〈論近人辨偽見解書〉，《古史辨》，1/25。

²⁶⁰ 顧頡剛，《古史辨》，4/〈序〉，15。

²⁶¹ 顧頡剛《古史辨》第4冊〈序〉云：「中國的古籍，經和子占兩大部分。普泛的說來，經是官書，子是一家之言。或者說，經是政治史的材料，子是思想史的材料。但這幾句話在漢代以前說則可，在漢以後說則不可。經書本不限於儒家所誦習，但現在傳下來的經書確已經過了戰國和漢的儒家的修改了；倘使不把他們所增加的刪去，又不把他們所刪去的尋出個大概，我們便不能逕視為官書和古代的政治史料，我們只能認為是儒家的經典。因此，經竟成了子的附庸；如不明白諸子的背景及其成就，即無以明白儒家的地位，也就不能化驗這幾部書的成分，測量這幾部書的全體。因此，研究中國的古學和古籍，不得不從諸子入手！俾在諸子方面得到了真確的觀念之後再去治經。諸子書地位的重要，由此可見。」顧頡剛，《古史辨》，4/〈序〉，15-16。

²⁶² 顧頡剛《古史辨》第4冊〈序〉云：「我們要使古人只成為古人而不成為現代的領導者；要使古史只成為古史而不成為現代的倫理教條；要使古書只成為古書而不成為現代的煌煌法典。這固是一個大破壞，但非有此破壞，我們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條生路。我們的破

治的糾葛，拋棄儒學舊有的心法，揭示出古史辨運動對史料的看法，乃能就歷史而論歷史。

(五)從“大禹是蜥蜴類”談起

顧頡剛“層累造成地古史”，是古史辨運動過程中的重要理論，並且是貫穿 7 冊《古史辨》的中心題旨²⁶³。“層累造成說”的觀念，最早出現於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²⁶⁴，這封信是《古史辨》的真正導火線。顧頡剛說明“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包涵 3 個意義：(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雖然無法知道某一件事的真實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故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²⁶⁵。爲了證明這些理論，顧頡剛認爲應從整理各時代的古史記載著手，以漢還漢，以先秦還先秦，這樣古史的面貌就不致混淆了²⁶⁶。

有關禹的性格問題，是顧頡剛整理各時代古史的典型範例；顧頡剛以《詩經》和《論語》爲材料²⁶⁷，層層往上推，希望能獲得“禹”的原始面目²⁶⁸。顧

壞並不是一種殘酷的行為，只是使他們各個回復其歷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復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周回復其先秦或漢魏的地位。總之，送他們到博物院去。」顧頡剛，《古史辨》，4/〈序〉，13-14。

²⁶³ 古史辨運動另一個重要理論為楊寬的“神話分化說”，請參閱：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280-291；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209-222。

²⁶⁴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0。

²⁶⁵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0。

²⁶⁶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我想分了三個題目做去：一是戰國以前的古史觀；二是戰國時的古史觀；三是戰國以後的古史觀。後來又覺得這些题目的範圍也廣，所以想一部書一部書的做去，如《詩經》中的古史，〈周書〉中的古史，《論語》中的古史……。」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0。

²⁶⁷ 從顧頡剛所運用的材料來看，他是比較相信《詩經》和《論語》的，尤其相信《論語》中引到的《詩經》；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說：「東周的初年只有禹，是從《詩經》上可以推知的，東周的末年更有堯舜，是從《論語》上可以看到的(堯舜的故事從何時起，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左傳是戰國時的著作；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也靠不住；《論語》較為可靠，所以取了它)。」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3。

頡剛認為傳說時代各神話有不同的起源／始祖²⁶⁹，所以古史是一種分化式的發展，但在各民族的始祖之外還有一個“禹”²⁷⁰。顧頡剛分析古史的系譜，說明商禹為上帝所立，禹和商之間的關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建國；因此顧頡剛推論「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²⁷¹。商是上帝所立的，禹又是上帝所命，禹和商因而有了關係，但此時禹的觀念是一個“神”。那麼，禹又如何由神變成人？顧頡剛引《詩經·閟宮》之說，認為到魯僖公時禹已確定變成人了²⁷²。顧頡剛在這裡提出兩個重要觀念：(一)《詩經》非孔子一人所作，亦即《詩經》有很多作者，而且愈到後來的作者將古史愈往前推，即後出的人王，在系譜上的排列愈前，於是揭出第二個重要觀念，即(二)古史的人王譜系乃“層累造成”。顧頡剛接著指出在《詩經》中，后稷是續禹之緒，而非續黃帝、堯舜之緒²⁷³。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在 1923 年 5 月 6 日出版的《努力》

²⁶⁸ 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說：「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大雅〉說，『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可見他們只是把本族形成時的人做為始祖，並沒有很遠的始祖存在他們的意想之中。他們只是認定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並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1。

²⁶⁹ 這方面的討論文字大部分收錄在《古史辨》第7冊

²⁷⁰ 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商頌長發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見於載籍以此為最古。詩書裡的“帝”都是上帝……這詩的意思是說商的國家是上帝所立的。」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2。

²⁷¹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2。

²⁷²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到魯僖公時禹確是人了。〈閟宮〉說，『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續禹之緒』。(按〈生民〉篇敘后稷事最詳，但只有說他受上帝的保衛，沒有他“續”某人的“緒”。因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為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續前人之業。到〈閟宮〉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為最古的人，后稷應該繼續他的功業。由此可見〈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會有禹一個觀念)這詩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個國王，后稷是後起的一個國王。」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2。

²⁷³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這很明白，那時並沒有黃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說后稷續禹之緒了。商族認禹為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為最古的人王，可見他們對於禹的觀念，正與現在人對於盤古的觀念一樣。」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2。

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發表後，反對陣營中最先開火的是胡堇人與劉揆藜。

胡堇人於1923年7月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發表〈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²⁷⁴，認為古史比較龐雜的只是堯舜以前²⁷⁵，理由有3：(一)古史官是世傳的，容易保存史料；(二)虞夏彝器上的款識在春秋時代存者尚多，是考古的好資料；(三)就天文曆法證明〈堯典〉的天象暗合歲差。這3個理由，使胡堇人相信堯舜以後的古代歷史有比較可信之處²⁷⁶。

1923年7月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同時刊出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²⁷⁷、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和顧頡剛的〈答劉胡二先生書〉²⁷⁸，使得《讀書雜誌》成為古史辨運動的主戰場，而古史辨運動另一個戰場則是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所編輯發行的《史地學報》²⁷⁹。

1924年6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發表了5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2.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3.顧頡剛，〈與錢

²⁷⁴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原載：《讀書雜誌》，11(北京，1923.7.1)，收入：《古史辨》，1/92-96。

²⁷⁵ 此處胡堇人用“龐雜”並非無信史之意，而是需要再經考訂；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古史辨》，1/95。

²⁷⁶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古史辨》，1/94-95。

²⁷⁷ 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原載：《讀書雜誌》，11(北京，1923.7.1)，收入：《古史辨》，1/82-96。

²⁷⁸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原載：《讀書雜誌》，11(北京，1923.7.1)，收入：《古史辨》，1/96-102。

²⁷⁹ 《史地學報》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自1卷1期至4卷1期計出版20期；2卷4期以前為季刊，3卷1期以後為月刊；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出版，1921.11-1926.10，本文所據為臺北：臺灣進學書局1960年2月景印版。1923年6月，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併入改制後的東南大學，故自1923年6月以後，《史地學報》改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編輯；本文在使用“史地會”或“史地研究會”時，表示該學生組織，而不包括指導員在內；在使用《史地學報》時表示該刊物；在使用“史地學報派”時，表示以《史地學報》為中心的史學工作者，包括學生與教授在內。

玄同先生論古史書》；4.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²⁸⁰；1924年10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3期，發表了3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揆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²⁸¹；這項討論一直進行到3卷4期，1924年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4期，發表了2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揆藜，〈與顧頡剛先生書〉；2.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續)〉²⁸²；使得南方學派成爲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²⁸³，與《讀書雜誌》的疑古派交戰激烈，《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²⁸⁴，

²⁸⁰ 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1-5；2.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史地學報》，3.1-2: 13-23；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史地學報》，3.1-2: 25-30；4.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30-41；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42-45。這5篇文章除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之外，其餘4篇文章均曾於《讀書雜誌》先行發表；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其後亦《古史辨》，1/217-222。

²⁸¹ 1.劉揆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史地學報》，3.3(南京，1924.10): 19-32；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3: 32-43；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史地學報》，3.3: 43-46。

²⁸² 1.劉揆藜，〈與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4(南京，1924.12): 25-33；2.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續)〉，《史地學報》，3.4: 33-44。

²⁸³ 新文學運動的反對者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亦即本文所指陳的“南方學派”；在反新文化運動時是“學衡派”，在反古史辨運動部分則是“史地學報派”。

²⁸⁴ 1921梅光迪致函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的吳宓，力邀吳宓返國，以東南大學為聚集同志知友，發展理想事業之地，將聘吳宓為東南大學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並請吳宓擔任即將出刊的《學衡》雜誌總編輯。吳宓於1921年6月啟程返國，8月抵達上海，9月往南京東南大學。劉伯明、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驥等人乃創辦《學衡》雜誌，欲以此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之堡壘。1922年1月《學衡》創刊，初期以月刊的形式出版，迄1926年12月止，均按時出版，共發行60期。1927年，因北伐戰爭爆發，以及原先與《學衡》合作的中華書局不願續辦等原因，使得《學衡》被迫停刊1年。其後在吳宓的條件交換和梁啟超斡旋下，《學衡》於1928年1月復刊。復刊後的《學衡》改為雙月刊，至1929年12月皆能準時出版，因此前後共計發行72期。1930年《學衡》再度停刊一年，1931年1月再度復刊，但在5月發行第75期後，又第三度停刊。此後則是不定期出版。1933年7月出版第79期，雖云將改由繆鳳林擔任編輯繼續出版，但自此以後《學衡》遂不再出刊。請參閱：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227-260；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28-29；關於反新文化運動

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

1924年劉揆藜為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擔任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的總務部副主任²⁸⁵；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主要焦點有二：(一)禹是否有天神性？(二)以《詩經》、《論語》證史之不當²⁸⁶。

有關禹的屬性問題，劉揆藜引《詩經》加以反駁，認為即使將“禹敷下土方”的“下土”解釋為對上天而言，並不能推論出「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的意思。劉揆藜指出，《魯頌·閟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奄有下土」，以及《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這兩處都提到“下土”，如果把“禹敷下土方”說成「上帝叫禹下來布土，……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那麼后稷也是上帝叫他下來奄有下土，武王也是上帝叫他下來為下土之法，難道他們也是神，而不是人嗎²⁸⁷？劉揆藜接著引「帝立子生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等《詩經》的句子，然後用類比法指出：依照顧頡剛的推論方式，如果禹是神，那麼，契、

的討論，請參閱：沈松僑，《學術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61-220；關於古史辨運動部分，參考：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70-92。

²⁸⁵ 1924年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3卷4期，一分職員錄透露了這項訊息；史地研究會第8屆(1923.09-1924.07)的主要職員名單如下：

總務部 主任：向 達 副主任：劉揆藜
 編輯部 學報主任：陸維釗 副主任：鄭鶴聲
 特種編輯：張其昀 叢刊編輯：陳訓慈
 編輯：向 達 束世澂 陳兆馨 馬繼援 王煥燾 邵森 王學素
 研究部主任：金文晟 副主任：劉揆藜
 講演部主任：趙祥瓊 副主任：陳旦
 調查部主任：宋兆珩 副主任：諸葛麒
 圖書部主任：陳詠洙 副主任：趙祥瓊
 發行部主任：周愨

《史地學報》，3.4: 147。

²⁸⁶ 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2-92。

²⁸⁷ 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3。

湯、文王等，亦均是神而非人了²⁸⁸。

劉揆藜不同意顧頡剛用《詩經》、《論語》證史的方式，指責顧頡剛解釋「因用不到牽入禹的事而不將禹牽入詩去」的說法，大抵言之成理；但當他用同樣的方式反詰顧頡剛，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隱公、桓公亦為子虛烏有，便不免有點過度推論²⁸⁹。

對〈閟宮〉詩何以不說后稷繼黃帝堯舜之緒而繼禹之緒，劉揆藜的解釋是：禹是治水甸山、盡力乎溝洫的人，而后稷是開始種植的人。禹治水甸山，將溝洫疏通了，后稷遂得以種植，所以〈閟宮〉作者才說后稷是“繼禹之緒”，因為這兩件事可以連在一起，而黃帝堯舜與耕稼則根本扯不上關係²⁹⁰。至於顧頡剛提出“禹和夏沒有發生了什麼關係”，因為「禹是他們(案：指殷商)認為開天闢地的人，夏桀是被湯征伐的一個，他們二人漠不相關，很是明白」；劉揆藜則用“詩篇有省文節字使句子長短整齊或音節”，以方便閱讀的說法加以辯駁²⁹¹。劉揆藜論點中此較值得注意的是，他找出顧頡剛理論中《詩經》與《論語》的內在關係，直指顧頡剛材料運用不當²⁹²；劉揆藜基本上將《論語》

²⁸⁸ 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4-85。

²⁸⁹ 劉揆藜在〈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指出：「因為〈生民〉作者以后稷為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續前人之業，所以無須把禹的事情牽進去。顧君何以又說『〈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曾有禹的一個觀念』呢？因用不到牽入禹的事而不將禹牽入詩去，顧君遂謂作此詩的詩人那時沒有禹的觀念，然則此詩也因用不到牽入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不將公劉、太王、王季、文王牽入詩去，我們遂得說〈生民〉作者那時也沒有公劉、太王、王季、武王的觀念嗎？於是我們可進一步而說〈閟宮〉也是因為用不著說到后稷繼黃帝堯舜的緒，所以沒有牽他們進詩去。顧君因為閟宮作者沒有牽他們進詩去，遂說“那時並沒有黃帝堯舜”，然則〈閟宮〉也沒有牽成王、穆王、隱公、桓公進去，我們遂得說那時也並沒有成王、穆王、隱公、桓公嗎？」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4-85。

²⁹⁰ 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5。

²⁹¹ 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6。

²⁹² 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云：「“《論語》較為可靠”，是顧君承認的，自季氏至堯曰五篇，經崔述考訂為後人所續，也是顧君承認的。……據為政“《書》云‘孝乎惟孝’”，……，〈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及〈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孔子那時確有書這部書。所以孔子擲書雅言，他的弟子也拿書中語句問

當作孔門弟子的上課筆記，認為就像今日讀《史記》、講杜詩，只把心得寫下，而斷無將全部《史記》或全部杜詩都寫入的道理，但顧頡剛卻本末倒置，以《論語》為先出，劉揆藜認為其說法大有可議²⁹³。於是論題轉到“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兩難式上，而這個問題是永遠無法解決的。但當我們檢視古史辨運動的過程時，不難發現環繞在顧頡剛、錢玄同、劉揆藜、胡堇人、張蔭麟等人的論辨過程中，“雞生蛋”、“蛋生雞”卻是個糾纏不清的問題。

在劉揆藜與顧頡剛的論辨中，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即“六經”此時已經不再是章學誠所謂“先王之政典”²⁹⁴，而被當作一般史料看待，《詩經》、《論語》、《說文解字》、《世本》、諸子等書，都放在同一個天平上稱斤掂兩，使古史辨運動能夠超越儒學體系，以純粹歷史學的角度論析上古史事，收錄在《古史辨》第3冊與第6冊中討論諸子學的文字，就是從這裡引申出來的。

由辨“偽書”與“偽事”，溯及儒家的“六經”，再由“六經”論辨帶動諸子學的興起，導致對整個上古史的史料論戰，是古史辨運動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劉揆藜認為顧頡剛因信《論語》太過，將《論語》當成判斷是非的惟一標準，是相當危險的。劉揆藜從《論語》著手，指出孔子“不好舉例的慣性”加以反駁²⁹⁵。我們觀察顧頡剛在提出“史家的辨古史”時，其實無形中亦掉入

難。但孔門弟子何以不將孔子所雅言的詩書盡記在《論語》裡呢？是必因為孔子所雅言的是講解詩書中整篇整章或整段，只求弟子們能了解意義，有詩書在，正不必記入《論語》中以免累贅，所以僅將孔子對於詩書的心得發為抑揚慕嘆的記下來。」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8。

²⁹³ 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指出：「今顧君只因沒有看見重重複複地將堯舜禹的事實寫上，遂以為〈堯典〉、〈皋陶謨〉、〈禹貢〉是在《論語》之後編造完備，那末，我們也沒有看見《詩經》上詩篇重重複複地寫在《論語》裡，我們遂可說「在《論語》之後，后稷、文王、武王的事蹟編造完備了，於是有〈生民〉、〈大民〉、〈皇矣〉等等出現」嗎？」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8-89。

²⁹⁴ 《文史通義·易教上》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學誠，《文史通義》（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新編本，收錄《文史通義》內篇六卷外篇三卷、《方志略例》三卷、《校讎通義》內篇三卷外篇一卷），1。

²⁹⁵ 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指出：「《論語》上孔子不舉舜作例以答問孝的門人，這是孔子不好舉例的慣性，並不足以引來證明有《論語》後才

今文家的歷史解釋圈套中而不自知。因為在討論古史的過程，顧頡剛必須先站定一個立足點，否則便無法推翻以“六經”為架構的古史——這是物理學槓桿原理的基本理論，崔述必須“考信於六藝”²⁹⁶，康有為提出“諸子創教”、“託古改制”之說²⁹⁷，都必須先找到一個立足點，顧頡剛亦然。所不同的是，崔述和康有為所肯定的史事洋洋大觀，顧頡剛則把範圍縮到最小(只賸下《論語》提到的《詩經》和《論語》本身)。

(六)神話與信史

在劉揆藜提出質疑的同時，顧頡剛於發表劉揆藜、胡堇人二文的《讀書雜誌》第 11 期，發表了〈答劉胡兩先生書〉，仍堅持其“層累造成說”的基本立場²⁹⁸：顧頡剛認為胡堇人和劉揆藜所論，只是證據的枝節問題，他對自己的說法仍甚具信心地“不能輕易認為錯誤”，而願與劉揆藜、胡堇人兩人討論下列 8 個問題：(一)禹是否有天神性？(二)禹與夏有沒有關係？(三)禹的來歷

有〈堯典〉。因為我們知道孔子答弟子或其時的君卿，無論他們問君子，問干祿，問使民，問禮，問君使臣，問臣事君，問仁，問善人之道，問政，問友，問士，問恥或問稼，總是答幾句對症下藥的簡括話，從不遠舉實例。就是子路問成人，也不過舉幾個同時或略前的人，說明有了某種知，某種不欲，某種勇，某種藝，合攏來使他去觀感罷了。這並不是孔子的慣性，這是他百答中的一個特答。若果如顧君所說，則孔子對於以上種種的問，也從沒舉過〈商書〉、〈周書〉、〈大雅〉、〈小雅〉那些講仁德，講為政，講使民，講稼穡，講孝友，講做人，講君子，講禮義，講臨民的人物或言語作例，難道我們遂可以為〈商書〉、〈周書〉、〈大雅〉，出於《論語》之後嗎？」劉揆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91。

²⁹⁶ 王健文，〈一個寂寞的史學家——典範變遷中的崔述〉，《歷史學報[成大]》，18(臺南，1992. 12): 153-172。

²⁹⁷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163-185。

²⁹⁸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云：「我本來的意思，是要先把與古史有關的書一部一部的讀了，把內中說及古史的地方鈔出，歸納成為一篇“某書中的古史”；等到用得著的書都讀完了，它們說著的古史都抽去了，再依了它們的先後關係，分別其真偽異同，看出傳說中對於古史的變遷，彙成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不幸豫計中的許多篇“某書中的古史”還沒有做，而總括大意的“與錢玄同先生書”先已登出，以至證據不充，無以滿兩位先生之意，甚以為愧。」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1/96-97。

在何處？(四)禹貢是什麼時候做的？(五)后稷的實在如何？(六)堯舜禹的關係如何？(七)〈堯典〉、〈皋陶謨〉是什麼時候做的？(八)現在公認的古史系統是如何組織而成的²⁹⁹？

在提出這 8 個論題的同時，顧頡剛說明他將古史分爲信史與非信史兩個部分；在信史方面，顧頡剛將古史分爲商民族時期與周民族時期兩個階段；但以山西爲中心的夏民族，因史料不足，置之於“神話”與“傳說”之間³⁰⁰。在推翻非信史方面，顧頡剛則提出 4 項標準：(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四)打破古代爲黃金世界的觀念³⁰¹。

在其後的論辨中，顧頡剛大體遵循上述 4 項標準與反對者周旋。當我們考察整個古史辨運動的討論過程，顧頡剛所採用的方法大抵皆先有預設——即建立一個大的理論系統，而後鋪陳、排比材料；因此，顧頡剛並不是從一條一條材料積累起來，而後組織古史的架構，這和現代史學考訂一條一條材料，而後推出結論的研究方式，顯然有上下床之別。而且顧頡剛雖然在論證的局部枝節上有所修訂，但其“層累造成說”的大架構基本上並沒有什麼改變。接下來的討論又回到“禹是否有天神性”的老問題上，顧頡剛從《尚書》和《詩經》的材料，歸納出周人對禹的 4 個觀念：(一)禹平水土是受上帝的命。(二)禹的“迹”是很廣的。(三)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四)禹是一個耕稼的國王³⁰²。

顧頡剛認爲在這 4 個觀念中，禹最有天神嫌疑的爲(三)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理由是人不可能完成這麼大的功績，因此顧頡剛認爲禹具有天神性³⁰³。既然禹具有天神性，就必須進一步找出這個神話的起源，

²⁹⁹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1/97。

³⁰⁰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1/97-99。

³⁰¹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1/99-101。

³⁰²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1/107。

³⁰³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云：「若禹確是人而非神，則我們看了他的事業真不免要駭昏了。人的力量怎麼能殼鋪土陳山？就說敷土是分畫九州，甸山是隨山列木，加

顧頡剛從文字和地理特徵加以說明，認為禹出自南方³⁰⁴。而從文字結構找出禹名從蟲之例，說明禹出自南方的假設，必須有地理上的依據，顧頡剛的解釋是：楚越間因地土卑濕，積水氾濫，故有宣洩積水的需要；因草木暢茂，有蛟龍害人，故有焚山澤驅龍蛇的需要。有了這種需要，故禹、益的神話足以增大牠們的價值，發展牠們的傳播³⁰⁵。

既然禹是南方民族神話的最早人物，那麼，禹又如何與堯舜扯上關係？顧頡剛從治水方面加以解釋，認為堯舜的傳說本來與治水無關，但自從禹做了堯舜的臣子之後，他們不得不與治水發生關係。治水原是禹的大功，口碑載道，堯舜無法相奪，只得“請堯做了一時的矇矓”，由他任鯀治水；等到「九年，續用弗成」，堯沒有辦法，就做了堯舜交替的關鍵，並為舜舉禹留下空間。這樣一來，禹的功績既沒有減損，而堯舉舜，舜舉禹，成就了治水的大功，堯舜也有間接的功勳，於是治水就成為他們三人合作的成績³⁰⁶。

顧頡剛的〈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在《讀書雜誌》第 11 期刊出後，劉揆藜隨即提出答辯，於 1923 年 9 月 20 日-1923 年 12 月 2 日出版的《讀書

以疏淪江河，試問這事要做多少年？在『洪水橫流，禽獸逼人』的時候又應做多少年？據孟子說，他做這番事業只有八年，就硬用了〈禹貢〉的“作十有三載乃同”之句也不過十三年。試問有何種力而致此？現在導一條淮河，尚且費了許多時間，無數工力，還沒有弄好，何況舉全國的山川統幹一下，而謂在幾年之間可以成功，這不是夢話嗎？」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1/111。

³⁰⁴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云：「古代開化的民族只有中原一處，因此中原人很藐視四方半開化和未開化的民族。他們看西北方獸多，故以西北方的民族為獸種：如獯鬻、獬豸、狄……加上犬旁，見得他們是犬類。又看南方蛇多，故以南方的民族為蟲種：東南之越號為閩（《說文》云，『閩，東南越，蛇種。』），西南岷江間號為蜀，而總名南方種族曰蠻（《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詩·采芑》云，“蠹爾蠻荆”，蓋不但名荆人為蠻，且以其動作為蟲之動作（《說文》云，『蠹，蟲動也。』）可見中原人對南方隨處可以引起蟲族的聯想，故文字上以蟲表南方的極多。禹名從蟲，恐案此例。越人自稱為禹後，恐亦與蜀人以蠹叢為祖先是相同的。」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1/122。

³⁰⁵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1/123。

³⁰⁶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1/129。

雜誌》第 13-16 期發表〈討論古史再質顧頡剛先生〉³⁰⁷，討論的中心仍是顧頡剛所提 8 項問題與研究古史的 4 項標準。首先，劉揆藜就“禹是否具有天神性”提出質疑，認為：因時代不同，地域因而有異；因時代不同，傳說亦有所參差，但其中仍有前後不合拍的癥結沒有解決。如論及禹的天神性時，劉揆藜指出：如果顧頡剛以為“禹是一個神”，就應該承認孔子以前的三代帝王人民都是神，而且應當從「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赫赫姜嫄……上帝是依……是生后稷」的商、稷說起；如果不承認孔子以前的人都是神，那麼“禹是一個神”的說法便不能成立³⁰⁸。劉揆藜雖然用類此法攻擊顧頡剛的說法，但他本人卻未提出完整的理論系統；並且在提及堯舜禹的關係時，劉揆藜亦僅以反詰的口吻質疑錢玄同，認為錢玄同相信有禹，是由於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但何以各教都有堯、舜的傳說，錢玄同卻認為是“無是公”、“烏有先生”³⁰⁹？這類反詰式的討論，在雙方論辨文章中時時而有。而在整個古史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很不易找到確切、肯定的結論，大部分僅止於對相同材料所做的不同解釋。

劉揆藜批評顧頡剛與錢玄同“迷於《說文》的餘毒”³¹⁰，而他自己對古史則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³¹¹。對顧頡剛“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劉揆藜提出“打破古來各代地域一致的觀念”³¹²，其中關鍵在於顧頡剛認為“不能以戰國的七國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劉揆藜則以為轄地大小廣狹，並非自古至今有一定步驟，易言之，不是古代定局的地域極小，而後來定一代一代推廣³¹³。

有關地域大小的問題，顧頡剛的同學兼好友傅斯年亦有所批評；傅斯年

³⁰⁷ 劉揆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51-186。

³⁰⁸ 劉揆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78。

³⁰⁹ 劉揆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64。

³¹⁰ 劉揆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65。

³¹¹ 劉揆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61。

³¹² 劉揆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57。

³¹³ 劉揆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54。

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1集第2期(1927年11月8日)發表〈評〈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認為，顧頡剛凡事好為之找一實地的證據，猶如刻舟求劍，而舟早已行遠³¹⁴。傅斯年的說法和劉揆藜雖然不盡相同，但兩者求古史適其時代、溯其源流的觀點則一。我們也可以在這裡看出劉揆藜立論上的不周延，在討論堯舜禹的關係時，劉揆藜依顧頡剛“禹具有天神性”的說法，反詰孔子以前的人物皆為神，因為必須前後統一，禹既為神，其他人物自當為神；此處則又提出要打破古來各地域一致的觀念，前後立場截然不同。但就在這些前後矛盾、彼此攻辯的討論過程中，古史已經成為拆碎的七寶樓臺，不再琉璃光華，而人人得以運用這些拆下來的磚石瓦礫，重新建構各自的古史觀³¹⁵，現代中國新史學中的古代史研究，就是從這裡開始的³¹⁶。

(七)一樣米煮兩種飯

反對陣營的學者們，已經注意到論辨雙方採用相同材料，卻推論出不同解釋的現象；同屬南方學派的陸懋德，在〈評顧頡剛古史辨〉一文中指出，

³¹⁴ 傅斯年〈評〈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云：「我覺得你這篇文章與在古史辨上，頗犯一種毛病，即是凡事好為之找一實地的證據，而不管傳說之越國遠行。如你談到洪水必找會稽可以有洪水之證，如談到緯書便想到當時人何以造此等等。其實世界上一些寓言(Parables)，一些宇宙論(Cosmo logics)每每遠到數萬里。洪水之說，今見之於Genesis者，實由巴比倫來。其在巴比倫者由何來，今不可得而考。緯書上一些想像，及洪水九州等觀念，我們不可忘傳說走路之事也。漢陰陽家多齊人，而制歷者或有外國人，二百二十萬年及顛項諸歷，焉知非中亞細亞流入者也？如必為一事找他的理性的、事實的根據，則每如刻舟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行，鑿矣。」傅斯年，〈評〈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古史辨》，2/14。

³¹⁵ 王汎森教授做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說古史辨運動有如“在倒洗澡盆時也把嬰兒倒掉了”，而現在“是將嬰兒從地上撿回來的時候了”；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297。

³¹⁶ 杜正勝教授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的〈導論——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中提到：「從民國十五年顧頡剛先生出版古史辨第一冊至民國三十年古史辨第七冊下編集成，這十五年間中國上古史的園地幾乎可以說是疑古派的天下。」杜正勝(主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16。

大禹問題之所以沒有結論，主要是因為論辨雙方所根據的材料，均不出故紙堆中的舊文字，這種以相同材料為證據所進行的討論，無非各說各話，言人人殊，事實真象難覓，故須依賴考古學家用地下出土材料加以證明³¹⁷。陸懋德指出，顧頡剛因《說文》訓禹為蟲，遂疑禹為蜥蜴；因〈商頌〉“禹敷下土方”，遂疑禹為天神；因《論語》“禹稷躬耕而有天下”，遂疑禹為耕稼的國王。那麼，禹究竟是“蜥蜴”？是“天神”？抑是“國王”？陸懋德說他試圖在顧頡剛的文章中找出結論，卻杳不可尋³¹⁸。

顧頡剛並未正面答覆對陸懋德的質疑，而用“態度”而非“結論”的方式回應。顧頡剛認為如果他“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為結論，他就是“偽史的造作家”³¹⁹。顧頡剛所主張的“層累造成說”，存在著“作偽”的陰謀理論，故他本人絕不用同樣手段達成一個作偽的“結論”。顧頡剛進一步說明“層累造成”的古史，乃各時代學者對古史的想像，層層積累以成。顧頡剛指出《論語》中二次連稱堯舜，一次連稱舜禹；《論語》之後，堯舜的事蹟編造得更為完備，於是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的出現，堯與舜因此有了翁婿關係，舜與禹也有了君臣關係。這些說法與《論語》相較，殆屬後起之說³²⁰。在這裡

³¹⁷ 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云：「原書中最有趣味之事，即為禹之有無的問題。顧君就此點與其友人劉揆蔡胡董人二君往返辯論，凡數萬言，可謂極談詭之能事矣。余獨惜其至終未有結論，此皆因兩方面所根據之材料均不出故紙堆中之舊文字故也。夫禹為歷史前的(pre-historic)人物，自不待言，而諸君所據以為辯論之材料，如商頌、《論語》、《說文》，又皆東周以後之記載，豈能得其結果乎？蓋此問題終當付諸考古學家，用地下之發掘以作最後之結論也。」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古史辨》，2/375。

³¹⁸ 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古史辨》，2/375。

³¹⁹ 顧頡剛《古史辨》第2冊〈自序〉云：「我以為一種學問的完成，有待於長期的研究，決不能輕易便捷像民意測驗及學生的考試答案一樣。如果我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為我的結論，那麼，我就是偽史的造作家了，我如何可以辨別人所作的偽呢！」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³²⁰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1)《論語》上門人問孝的很多，舜既“克諧以孝”，何以孔子不舉他做例？(2)《論語》上說“舜有臣五人”，何以〈堯典〉上會有九人？〈堯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廢，何以孔子單單截取了五人？(3)南宮适說“禹稷躬耕而有天下”，可見禹稷都是有天下的，為甚麼〈堯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說舜“無為而治”，〈堯典〉上說他「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說他『一載考績，三考，黜陟

我們看到顧頡剛是先肯定《論語》，而後以此為標準來論斷古史的可信度。這個“大膽的假設”，獲得錢玄同的擊掌喝采，以為是“精當絕倫”，並且希望顧頡剛用這個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以便能夠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偽史還其本來面目。錢玄同甚至認為堯舜是“無是公”、“烏有先生”，所以中國的歷史應該從禹說起³²¹。錢玄同用《說文》解釋堯舜的說法，遭到反對派的攻擊，劉揆藜在〈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中，批評錢玄同用後出之說否定古史，實乃不諳《說文》誼例所致³²²。

考察收錄於《古史辨》第1冊論辨雙方有關“禹”所引證的材料，我們對雙方的各種解釋，實難理出清楚的頭緒。疑古派與反對陣營所用的材料幾乎完全相同，而在論證時各自引述的材料卻頗為雜亂，辨證方式亦欠缺一定軌跡，不免令人覺得有點像意氣之爭。

古史辨運動之所以激起如此大的巨浪狂濤，並不在這個運動肯定或否定了局部古史的真偽，而是針對古史所做的全面性探討，造成古史黃金時代的破滅。顧頡剛認為中國古史黃金時代的偽造，大部分成於戰國——秦漢間學

幽明』，不相衝突嗎？這些問題都可以證明〈堯典〉出於《論語》之後。（我意，先有了禪讓的學說而後有〈堯典〉、〈皋陶謨〉出來，當作禪讓的實證，禪讓之說是儒家本了尊賢的主義鼓吹出來的）作《論語》時，對於堯舜的觀念還是空空洞洞，只推崇他們做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作了〈堯典〉等篇，於是堯舜的“文章”都有實事可舉了。」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5。

³²¹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云：「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底歷史應該從禹說起。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無歷史可稽了。」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古史辨》，1/67。

³²² 劉揆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云：「玄同先生相信有禹，是由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何以各教都有“堯”、“舜”的傳說，卻又想來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呢？就“堯”、“舜”二字的意義說：“堯”，高也，“舜”，大也，遂決定堯舜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但是我們知道“高宗”、“高祖”、“太宗”、“太祖”都是高大的意思，難道遂可斷定歷來許多高宗高祖太宗太祖都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無其人嗎？……這種錯誤，皆是迷於《說文》的餘毒，而不知訴於邏輯，大前提早已錯了，怎能推論得合法呢？」劉揆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64-165。

者之手，而這種造偽乃蓄意爲之者³²³。反對陣營並未對此提出整體性的辯難，而將焦點放在“禹的屬性”問題上進行討論。

“層累造成說”是古史辨運動的重要樞紐，《古史辨》第 7 冊關於上古史的討論文字，三皇五帝的考辨，均源自“層累造成說”。但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所引發的戰火，卻集中於“禹”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禹的屬性問題，才是真正整個古史辨運動的導火線。

劉挾蓁〈討論古史再質顧頡剛先生〉於 1923 年 9 月 20 日-1923 年 12 月 2 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 13-16 期刊出後，顧頡剛於《讀書雜誌》第 14, 15, 17 期發表〈啟事三則〉³²⁴，仍堅持其“層累造成”的觀點，甚至認爲“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³²⁵。顧頡剛的這項主張，受到其業師胡適的喝采與聲援，於 1924 年 2 月 22 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 18 期，發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稱讚顧頡剛、錢玄同、劉挾蓁、胡堇人等的古史討論，是中國學術界一件可喜之事，並且認爲這個討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性，不亞於丁文江等人所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胡適在

³²³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於是春秋初年號為最古的禹，到這時真是近之又近了。……黃帝之祀起於秦國，說不定黃帝即是“黃龍地螾”之類，經過了方士的鼓吹，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自從許行一輩人擡出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黃帝之前了。自從易繫辭擡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農之前了。自從李斯一輩人說『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自從世本出現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樣子的世系，於是沒有一個人不是黃帝的子孫了。自從春秋命歷序上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年』，於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一萬八千歲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轉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時代愈後，知道的古史愈前，文籍愈無徵，知道的古史愈多。」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5。

³²⁴ 顧頡剛，〈啟事三則〉，《古史辨》，1/187-188。

³²⁵ 顧頡剛〈啟事三則〉說：「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牠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牠的自衛的理由。現在我儘尋牠的罅漏，劉先生儘尋牠的自衛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任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顧頡剛，〈啟事三則〉，《古史辨》，1/187。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中，明白指出論辨雙方採用相同的方法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論戰勝敗的標準，亦是信仰與懷疑的標準³²⁶。胡適認為既然檢驗是非的標準只有證據，因此無須考量道德人心，所爭者唯學術的真偽問題，而去偽存真決不會有害人心。胡適並藉此批評劉揆藜，認為劉揆藜主張翻古史的案會影響人心，是不必要的考慮³²⁷。

胡適認為“層累造成說”是史學界的一大貢獻³²⁸，指出顧頡剛的見解與方法是“剝皮主義”。胡適進一步說明，清代疑古大師崔述《考信錄》所剝的皮僅剝到“經”為止，還不夠徹底，現在不但要剝得更深，並且要研究那一層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在此文中，胡適亦對劉揆藜的根本態度與研究方法加以撻伐，認為劉揆藜自稱“度之以情”，實即“度之以成見”³²⁹。胡適亦再度祭出“科學方法”，即他所一貫主張的實驗主義。胡適坦承他自己頗有偏袒顧頡剛的嫌疑，並且說顧頡剛初次應用這種方法，在百忙中批評古史的全部，也許不免有些微的錯誤，但胡適認為顧頡剛的“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而顧頡剛所用的方法則是愈用愈見功效³³⁰。

反對陣營中學術地位最高、輩分最高的，應屬當時任教東南大學的柳詒徵³³¹。以 1920 年代的中國學術思想界而言，有所謂“北大”、“南高”之爭；顧

³²⁶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0。

³²⁷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說：「[因為]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進一步，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0

³²⁸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1。

³²⁹ 劉揆藜說自己對古史：「只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胡適則引崔述的話說：「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所謂“度之以情”實即“度之以成見。」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4-196。

³³⁰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2。

³³¹ 柳詒徵(1879-1956)字翼謀，號劬堂、知非，江蘇省丹徒縣人。早年在繆荃孫任總纂的江楚編譯局工作，後隨繆荃孫至日本考察教育，接觸世界新思潮。回國後曾在江南高等學堂、兩江優級師範學堂任教習。1914年2月，應聘為南京高等師範任教；1925年東南大學發生學潮後一度離去北上，先後執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1927年改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抗戰時期，先在浙江大學講學，後任中央大學歷史研究導師。抗戰勝利後任國史館編纂，1949年後執教於復旦大學。

名思義，“北大”係指北京大學，“南高”則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亦即東南大學的前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於 1923 年併入東南大學，東南大學於 1928 年改名中央大學）。就當時引進的西方思潮而言，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文化保守主義的重鎮；白話文運動發源於北京大學，“學衡派”則以任教東南大學教授為主幹³³²；在古史辨運動中，北京大學是疑古派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反對派的重鎮，兩者間的對立關係可見一斑。由於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教授間對歷史研究的取向不同，形成古史辨運動中絕然對立的兩極，攻擊疑古派最力的柳詒徵與張蔭麟即均屬南方學派。

柳詒徵在 1924 年 4 月 1 日出版的《史地學報》第 3 卷 1-2 合期上發表〈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³³³，闡述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知《說文》誼例的見解³³⁴。柳詒徵甚至以有點教訓的語氣對顧頡剛說：「今之

1948年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和顧頡剛五人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任教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柳詒徵受聘為國文、歷史教授，並曾任史地部和歷史部主任；東南大學時期，主講中國文化史和中國通史。著有《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歷史要義》等；其他專著包括《東亞各國史》、《國學圖書館小史》、《中國版本概論》等；柳詒徵指導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學生組織成立史地研究會，先後出版《史地學報》、《史地雜誌》、《國風半月刊》等刊物；並和劉伯明、吳宓、梅光迪共同創辦《學衡》雜誌，形成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有關柳詒徵的生平，請參閱：柳詒徵，〈自傳與回憶〉，收入：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8-21；柳詒徵，〈記早年事〉，收入：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21-41；柳定生(原編)、柳曾符、柳佳(改編、訂補)，〈柳詒徵年譜簡編〉，收入：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346-372；孫永和，〈柳詒徵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3-40。。

³³² 關於學衡派的研究，請參閱：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61-220。

³³³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原載：《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4): 1-5；《古史辨》，1/217-222。

³³⁴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云：

顧研究古代文字雖亦考史之一涂術，要當以史為本，不可專信文字，轉舉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殺。……此有某君謂古無夏禹其人；諸書所言之禹皆屬子虛烏有。叩其所據，則以《說文》釋“禹”為蟲而不指為夏代先王，因疑禹為九鼎所圖之怪物，初非圓顛方趾之人。按《說文》固未釋禹為夏代先王。《說文》：「禹，蟲也。從 𠂔，象形。」然本書固數舉禹，如“鼎”“呂”之說，皆指禹為人，非蟲也。……假使許君知禹非人，不當仍沿舊說。胡許君既知禹為蟲，復引禹之事實，初不自病矛盾；而千數百年讀《說文》者，從未致疑及此，而獨某君始具明限，發前人之所未發乎？

學者欲從文字研究古史，盍先讀熟許書，潛心於清儒著述，然後再議疑古乎？」³³⁵柳詒徵此文刊出後，顧頡剛於 1926 年 1 月 13 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 14 期發表〈答柳翼謀先生〉加以回應，說明他引《說文解字》未能依柳詒徵的例根本無關緊要，因為許慎的書本來就沒有例，所有《說文解字》的例，都是後人替它尋出來的，如同春秋家替《春秋》尋例一般³³⁶。顧頡剛甚至直接否定許慎的《說文解字》，認為《說文解字》中“禹”的解釋，並不足以代表古義，但仍強調他並非放棄整個有關“禹”的見解，而是認為「失掉說文的一證，正如失掉帝王世紀和偽《古文尚書》的證據一樣，是無關輕重的」³³⁷。

此時錢玄同乾脆將自己的姓改為“疑古”，於 1926 年 1 月 13 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 14 期，發表〈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³³⁸，即署名“疑古玄同”。此文對柳詒徵的“說文誼例”大力抨擊，疑古玄同表示，疑古派正想改變“信而好古”的態度，不料反對陣營卻倒過來勸疑古派做“許老爹的忠奴”，這種盛情只好璧還³³⁹。在此文中，連孔子亦不免遭池魚之殃，疑古

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明《說文》之誼例。不明《說文》之誼例，刺取一語，輒肆論斷，雖曰勇於疑古，實屬疏於讀書。何則？《說文》者，解字之書，非為後世作人名字典也，故於字之形誼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證。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古史辨》，1/218。

³³⁵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古史辨》，1/222。

³³⁶ 顧頡剛〈答柳翼謀先生〉云：「我們現在研究學問，自有二十世紀的學問界做我們的指導。至於許書和清儒著述，原只能供給我們以研究的材料，並不能供給我們以學問的準繩。就是要從文字研究古史，也應以甲骨文金文為正料，以《說文》等隨便湊集的書為副料。照柳先生的話，若是我們沒有許書和清儒著述，我們便沒有疑古的可能；若是我們不熟讀許書和潛心清儒著述，我們便沒有疑古的資格了。這等意思是否合理，不待贅言。至於我引《說文》，未能依了柳先生的例，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為許慎的書本就沒有例，我們現在所有的《說文》的例都是後來人替它尋出來的，與春秋家替春秋尋例一般。」顧頡剛，〈答柳翼謀先生〉，《古史辨》，1/227-228。

³³⁷ 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³³⁸ 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古史辨》，1/231-243。

³³⁹ 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云：「清代經師治諸經治小學之法”確有可取的，“清儒著述”確也有值得“潛心”的。但他們正因為缺乏“勇於疑古”的膽量，所以“創獲”未免太少了。正因為太“熟讀許書”，對於假字誤體不敢“議疑古”，所以承誤襲謬的解說又未

玄同認為孔子根本沒有“訂六經”這回事，至於許慎的《說文解字》，只是一部“偽字舉要”³⁴⁰，於是雙方論辨的方向轉為《說文解字》。

本節雜引各家說法，並分析顧頡剛前後論述的矛盾所在，旨在說明顧頡剛本身並無一完整、自足的思想體系，其中心思想僅為全盤推倒上古信史，理論中心為“層累造成說”，方法則是胡適所盛贊的“剝皮主義”；因此，在整個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我們看到顧頡剛引述證據的前後矛盾，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忙亂，均顯示他在古史辨運動一開始即全面否定古史，所引起左支右絀的局面，是如何的難以收拾。但終其一生，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基本觀點並未有所修正，甚至論敵張蔭麟在方法論上予以當頭棒喝時，顧頡剛仍無動於衷。

張蔭麟早歲負笈清華學校，畢業後遊學美國，入史丹福大學，主攻西洋哲學與社會科學³⁴¹。1925年4月，年僅二十歲，猶就讀清華學校的張蔭麟於

免太多了。咱們正想改變那“信而好古”的態度，不料反有人來勸咱們做許老爹的忠奴，這種盛情只好“璧還”他們了。」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古史辨》，1/234。

³⁴⁰ 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云：「咱們現在……根本不相信“孔子訂六經”那件事，對於所謂“經”也者，只認為是古代留下來的幾篇文學作品，幾本檔案黏存幾張禮節單子，幾首迷信籤詩，幾條斷爛朝報而已。……咱們既認為孔二先生並沒有寫過什麼勞什子的六經，則對於漢朝突然發現的壁中書本已不能相信；何況年代跟傳授處處露出作偽的馬腳來如康崔所云，文字又與商周的真古文差得最遠如羅王所云，尚有絲毫可信據之價值乎？《說文》中古文甚多，而這古文便是采自壁中書，則《說文》不是一部“偽字舉要”嗎？」“偽字舉要”自然也有它的用處，但決不能認作真的古字則毫無疑義也。」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古史辨》，1/242-243。

³⁴¹ 張蔭麟(1905-1942)，廣東東莞人，號素癡。1929年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得文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全心投入數理哲學的領域，修了不少關於數理邏輯的課程，為其史學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礎。1934年任清華大學哲學、歷史兩系教授。抗戰爆發後，任教于西南聯合大學、浙江大學。1942年10月24日在貴州遵義病逝，著有《中國史綱》(上古篇)等。1935年教育部委託張蔭麟主編高初中及小學歷史教科書，於是張蔭麟向清華大學請假，專心編寫。1941年3月，《中國史綱》第一輯由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出版；1941年4月，張蔭麟和張其昀等人發起刊行《時代與思想》月刊，6月成立“時代與思想社”，8月1日《時代與思想》月刊創刊號在遵義出版。張蔭麟曾經計畫撰寫《歷史研究法》、《民國開國史長編》、《宋史新編》、《中國政治哲學史》等，惜均來不及動筆便病逝。已經脫稿的著作，只有《中國史綱》(上古篇)刊印，尚未刊印的有《通史原理》、《宋史

《學衡》第 40 期發表〈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³⁴²，對顧頡剛濫用“默證”討論古史有所評駁，認為默證的運用有其限度，而顧頡剛的論證顯然已違反其限度³⁴³。張蔭麟說明運用默證必須在少數界限極清楚的情形下方可，並引用法國史家色諾波(Ch. Seignobos)的說法，闡述適用默證的充分條件有二：(一)未稱述某事之載籍，其作者立意將此類之事實為有統系的記述，而於所有此類事皆習知之。(二)某事蹟足以影響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當入於作者之觀念中³⁴⁴。

張蔭麟批評顧頡剛運用默證法研究古史時，並未遵守這兩條規則，並以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中的一段敘述為例說明。顧頡剛的原文是：《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堯典〉、〈皋陶謨〉)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故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應無疑義。張蔭麟批評顧頡剛的推論完全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他詰問顧頡剛：《詩經》與《尚書》是否當時歷史觀念的總記錄？是否當時記載唐虞事蹟之有統系的歷史？其中有無涉及堯舜事蹟之需要？如依顧頡剛的方式推論，從《唐詩三百首》、《大唐創業起居注》、《唐文彙選》等書，推求唐以前的史實，那麼文景、光武之事蹟，豈不成為後人所“層累造成”³⁴⁵。張蔭麟進一步說明：《詩經》與《尚書》(除了〈堯典〉、〈皋陶謨〉)沒有禹為堯舜臣的記載固為事實，但亦未嘗有禹非舜臣的反證或暗示，如因《詩經》與《尚書》言禹九條未嘗謂禹為堯

論叢》兩種。其主要著作集為：張蔭麟，《張蔭麟先生文集》上、下(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張蔭麟生平資料，參考：張其昀，〈張蔭麟先生的史學〉，《張蔭麟先生文集》，上/5-11。

³⁴²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2-288。

³⁴³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說：「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2。

³⁴⁴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2-273。

³⁴⁵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3。

舜臣，遂斷定禹非堯舜之臣，明顯違反默證適用的限度。因為《詩經》與《尚書》(除了〈堯典〉、〈皋陶謨〉)並非堯舜禹事蹟的完整記錄，而敘述禹的事蹟，亦無說明禹為堯舜臣的必要性³⁴⁶。

這段論辨文字隱藏著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即傳統儒學以“六經”為歷史結構的精神，似乎在顧頡剛身上復活了。顧頡剛雖然將“六經”視為材料／文獻看待，但因他信《論語》和《詩經》太過(尤其是《論語》中引述的《詩經》)，使其立論難免受到束縛。崔述與康有為的著作固奉“六經”為圭臬，顧頡剛卻亦緊抱《論語》、《詩經》不放。所以，在思想理路上是治一經焚一經，而顧頡剛仍無法完全擺脫“六經”所建構古史系統的枷鎖。反觀張蔭麟雖隸屬文化取向上較為保守的學衡派(此為一相對的稱呼，非意指其為實質之保守)，卻說出“《詩》、《書》非堯舜禹事蹟之[完整]記錄”的話³⁴⁷，創新與保守便常以這樣模糊的面貌彼此寄生。顧頡剛立意要打破儒學經典所建構的中國上古信史結構，卻陷入其自設的網羅(以《論語》和《詩經》證史)而不自知；張蔭麟則在反駁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同時，將經典史料化的工作更向前推進一步。

張蔭麟批評“層累造成說”方法上的謬誤後，顧頡剛並未加以反擊，也未見他對“層累造成說”有若何修正，一如與劉揆藜的論辨，顧頡剛亦僅放棄“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至於禹的天神性與“層累造成說”，並未做太多的修正。顧頡剛在《古史辨》第2冊〈自序〉明白表示，那些個別史實的論辨，只是枝葉而非本幹³⁴⁸，論敵們反駁或否定他某一事件、某一材料的解釋有誤，並未影響其基本架構，這個基本架構就是顧頡剛一生所信奉不渝的“層累造成說”。

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是：何以論辨雙方引述的材料和治學方法如出一轍，推論的方向卻大相逕庭？在這方面，魏建功的〈新

³⁴⁶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87。

³⁴⁷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87。

³⁴⁸ 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史料與舊心理〉為我們找出了某種層面的解答³⁴⁹。

魏建功認為“科學方法”的目的在於求真和勇於懷疑³⁵⁰，因為柳詒徵不贊成勇於懷疑，所以自棄於科學之外；相反的，顧頡剛則符合這個條件，其治學方法來自清代經師，而清儒治學的方法是很科學的³⁵¹。前文引述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勸顧頡剛應先潛心清儒著述，而後再議疑古。那麼，我們不禁懷疑：何以同樣引清儒為例，解釋卻南轅北轍？魏建功的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瞭解其間之分殊。魏建功認為“生當學術自由發展之世”，應“免除民賊專制時被壓迫的思想”³⁵²，這裡所謂學術自由發展之世，意指儒學普遍王權之崩潰³⁵³，造成中國學術界亟求新索的迫切，使得儒學體系所建構的上古黃金時代因而遭受全面破壞，亦唯在這種情形下才能建立新的歷史系統。魏建功主張新歷史系統的敘述主體，應該由統治階級移向民眾社會³⁵⁴；而歷史的長度須依史料真實之年限決定，歷史材料應審慎考查傳說、神話、記載、實物，再依考查的結果客觀敘述³⁵⁵。魏建功的論點，

³⁴⁹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原載：《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15(北京，1926.01.20)；《古史辨》，1/244-260。

³⁵⁰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古史辨》，1/258。

³⁵¹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說：「我相信頡剛做學問絕不是愚迂好古的，也不是狂妄自斷的，他的方法並非怎樣荒謬的，與清代經師的治學並不有什麼逕庭的地方。清儒治學的方法是很科學的，直到最近大家都認識明瞭了；頡剛就是其中的一個認識者，並且是採納他們精神治學的一個人；不能了解清儒的治學方法和現代的治學態度，抑就難於啟齒議論這些地方。」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古史辨》，1/257-258。

³⁵²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說：「生當學術自由發展之世，若不能免除民賊專制時被壓迫的思想，反或受其拘執，信史何年何月可以實現啊！假使你想私淑清儒的治學方法，就該知道怎樣去辨偽，去正訛。」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古史辨》，1/259。

³⁵³ 林毓生教授以“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儒學普遍王朝的崩潰”，解釋五四時期的反儒學運動；林毓生(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85, 89, 91-92；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78-89。

³⁵⁴ 美國漢學家施耐德即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XI, 121-152.

³⁵⁵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說：「中國的歷史，真正的歷史，現在還沒有。所謂“正史”的確只是些史料。這些史料需要一番徹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緊將歷來的烏煙瘴氣的舊心

闡明了古史辨運動的宗旨，亦略可說明疑古派和南方學派的分殊所在。

(八)文獻、疑古與釋古

古史辨運動與反儒學傳統之間，一直存在著難以釐清的糾結；在推翻經學的權威性，造成儒學體系崩解的過程中，古史辨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具有相當關鍵性的地位。在推翻“六經”的歷史結構方面，顧頡剛與胡適等人截斷眾流，將古史自《詩經》做起的論述，不但推翻向來由儒學經典所建構的古史系統，縮短古史年代，同時亦減少古代信史的文獻；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諸子學地位的提升，將經學和諸子學放在同一位階，一視同仁地當成研究古史的材料，則又擴大了史料的範圍。此外，以民歌採集的角度從事《詩經》研究，以通俗小說為探討方法論的材料，以民俗、戲曲研究作為古史演進的比擬等等，都將史料的範圍拓展到儒學經典以外。既打破儒學經典建構古代信史的定說，又建立白話小說、戲曲、民俗學等為歷史研究材料的觀念，奠定了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重要基石。

古史辨運動將儒家“六經”看成史料，而非不可疑的經典，與五四反儒學傳統的時代風潮彼此相互牽引。但“六經”史料化與儒學權威性的崩解，並不能解釋整個古史辨運動在擴大史料範圍上的意義。對疑古派而言，真正拓展史料範圍，其實是視民俗戲曲為歷史研究的材料，使得儒學經典和民俗戲曲在史料意義上，不再有高下等第之分。

疑古派向來被史學界視為文獻考證學派³⁵⁶，而究心於地下出土遺物的考

理治盡，找出新的歷史的系統。新歷史的系統是歷史敘述的主體要由統治階級改到普通的民眾社會，歷史的長度要依史料真實的年限決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長的君主的朝代為起訖；歷史材料要把傳說、神話、記載、實物，……一切東西審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結果，客觀的敘述出來。」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古史辨》，1/260。

³⁵⁶ 周予同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一文中，將現代中國史學分為四個派別：泥(信)古、疑古、考古與釋古；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杜維運、陳錦忠(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3/371-428；此處所引在374, 401；我在

古派，則在方法論上對疑古派有較多針砭，王國維與李玄伯即為其中的典型代表。

收錄在《古史辨》第1冊的〈古史新證第一二章〉³⁵⁷，原為王國維任教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講義，顧頡剛將此文收入《古史辨》，本意是為用來證明王國維對禹的看法和他相近，即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第一二章〉所論春秋時齊秦二國的器銘(〈秦公敦〉、〈齊侯鑄鐘〉)，均視禹為最古的人王，並以己身所在之處為禹所在之處，且古帝王亦均繼禹而來。但顧頡剛似乎忽略王國維和他的基本立場並不相同，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的用意，主要是以地下出土材料證明文獻典籍之真，藉此提倡文獻材料與地下考古材料並用的“二重證據法”³⁵⁸，王國維所謂地下材料主要指甲骨文與金文而言。顧頡剛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計畫〉亦曾表示其治古史的第4學程是研究古器物學³⁵⁹，可惜他在考古學與甲骨文、金文方面，未能依計畫進行。而王國維則批評疑古派「乃并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

《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說明，疑古派可稱之為“載記考證學派”或“文獻考證學派”；考古派則是“遺物考證學派”或“出土文物考證學派”；請參閱：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2-3。

³⁵⁷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古史辨》，1/264-267。

³⁵⁸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云：「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併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古史辨》，1/265。

³⁵⁹ 顧頡剛〈我的研究古史的計畫〉分為六個學程，計費21年：(一)談魏晉以前史書，(二)作春秋戰國秋漢經籍考，(三)依據考定的經籍時代與地域抽出史料排比，(四)研究古器物學，(六)將所得古史材料重新整理，著成專書；顧頡剛，〈我的研究古史的計畫〉，《古史辨》，1/211-217。顧頡剛於1922年4月24日寫給王國維的信上說：「惟以拙於言辭不能自達其愛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問業，如蒙不棄，許附于子弟之列，剛之幸也。」1924年4月22日寫給王國維的信上又表示：「擬俟生活稍循秩序，得為一業之專攻，從此追隨杖履，為始終受學之一人，未識先生許之否也。」但顧頡剛終未致力於考古學與甲骨文、金文之研究；轉引自：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90。

取；然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³⁶⁰。

另一位提出以地下材料研究古史的李玄伯，認為古史唯一解決的方法是考古。他在1924年12月27日出版的《現代評論》1卷3期上發表〈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³⁶¹，認為顧頡剛、錢玄同等人用典籍文獻研究古史，並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古史問題的唯一方法，端賴地下材料之出土³⁶²。但顧頡剛認為，在有史時代，載記足以聯絡種種散亂的遺作品，並彌補其單調之缺憾，只要鄭重運用載記，其價值決不在遺作品之下。所以，顧頡剛覺得「若是多信一點遺作品，少信一點載記，這是很應當的，若說惟有遺作品為可信而載記可以不理，便未免偏心了」³⁶³。

類似的爭辯也發生在丁文江與顧頡剛之間，丁文江在一封給顧頡剛的信〈論禹治水說不可信書〉³⁶⁴，認為禹起自南方洪水之說不能成立。因為就地質考察而言，江河都是天然水道，絲毫沒有人工疏導的痕跡，所以禹治水之說絕不可信³⁶⁵。顧頡剛在〈論禹治水故事書〉反駁丁文江的說法³⁶⁶，認為「揚

³⁶⁰ 王國維《定本觀堂集林》(臺北：世界書局，1983)，456。

³⁶¹ 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原載：《現代評論》，1.3(北京，1924.12.27)；《古史辨》，1/268-270。

³⁶² 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說：

研究前人的往跡，所可藉的材料約分二種：曰，載記；曰，遺作品。第一類包括一切紙片的記載。近人研究古史的證據皆屬於這一類。古代載籍去今既遠，輾轉鈔刻，錯誤愈多。何況中間更有人偽造呢！在用史證以前，分別真偽是件不可免的要務。

載記既不能與“我們”一個圓滿的回答，我們只好去問第二種材料，“古人直遺的作品”。直遺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見的，除了缺破以外，我們仍能看見。所以他的價值遠非傳鈔錯誤、偽作亂真的載記所可此擬。現地中藏品，除為商賈盜發者外，大半皆未發掘。設以科學的方法嚴密的去發掘，所得的結果必能與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這種是聚訟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

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古史辨》，1/268-270。

³⁶³ 顧頡剛，〈答李伯玄先生〉，《古史辨》，1/271。

³⁶⁴ 丁文江，〈論禹治水說不可信書〉，《古史辨》，1/207-209。

³⁶⁵ 丁文江〈論禹治水說不可信書〉云：「去年同揚子江水道委員會的技師Palmer君等同赴萬縣，他對我說：『就是要用現代的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時代的禹如何能有這種能力？』」丁文江，〈論禹治水說不可信書〉，《古史辨》，1/208。

³⁶⁶ 顧頡剛，〈論禹治水故事書〉，《古史辨》，1/209-210。

子江無水患不即是南方無水患，洪水也不必定出長江黃河」³⁶⁷，所以兩地的洪水本非一物，但因同受水患，所以流傳的故事相近，他亦批評丁文江將〈創世紀〉和《詩》、《書》上的洪水併作一事，是一種“錯誤的連想”。顧頡剛認為《禹貢》作於戰國，其實是戰國學者將當時的地域作一整理而託之於禹蹟，本無原始意義可尋，所以不必為之講通³⁶⁸。在這裡我們注意到顧頡剛的說法，似乎並不像傅斯年所批評的，凡事好為古史找一實地的態度與方法³⁶⁹。

就史學與史料學而言，古史辨運動論辨雙方，僅止於材料應用的觀點有異，真正以史料學為中央課題的是傅斯年。

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授課講義中，一再強調史料學的重要性³⁷⁰，堅守史料為一切解釋的本源，因此主張“證而不疏”的研究方法。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同樣強調“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³⁷¹，這和他在〈史學方法導論〉提出“史學便是史料學”³⁷²，可謂相互輝映。雖然王國維率先提出“二重證據法”，但在理論建構上，傅斯年的立論仍最縝密周延。傅斯年一面主張運用考古成績做治史的材料，一面揭示考古只是局部，觀照全體仍必須依靠文獻材料。在 1926 年給顧頡剛的一封信〈談兩件《努力週報》上的物事〉³⁷³，傅斯年認為考古發掘和顧頡剛的古史討論，並非同

³⁶⁷ 顧頡剛，〈論禹治水故事書〉，《古史辨》，1/209。

³⁶⁸ 顧頡剛，〈論禹治水故事書〉，《古史辨》，1/210。

³⁶⁹ 傅斯年，〈評〈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原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2(廣州，1927.11.08)；《古史辨》，2/10-14；所引在14。

³⁷⁰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云：

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史學便是史料學：這話是我們講這一課的中央題目。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運用：這話是我們討論這一篇的主旨。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2/5-6。

³⁷¹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53。

³⁷²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全集》，2/6。

³⁷³ 傅斯年，〈談兩件《努力週報》上的物事〉，原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10(廣州，1928.1.3-23)；《傅斯年全集》，4/454-479；又《古史辨》，2/288-301，《古史辨》為節錄。

一平臺的問題，因為“層累造成說”無賴於後來的考古發掘，而後來的考古發掘卻有待於“層累造成說”，因此顧頡剛的古史論實乃“古史學的新大成”³⁷⁴。傅斯年主張，考量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文獻材料仍不可偏廢。在〈考古學的新方法〉中³⁷⁵，傅斯年再次強調文獻材料與考古材料相互為用的必要性³⁷⁶。因為治史之疑與信端賴“證據”(即“史料”)，故必須同時借重考古資料與文獻考證。傅斯年認為「學術之用，始於疑而終於信，不疑無以見信」³⁷⁷，所以，「研究古史，完全懷疑，固然是不對的；完全相信，也是不對的」。「只要懷疑得

³⁷⁴ 傅斯年〈談兩件《努力週報》上的物事〉云：「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這發揮之後，大體之結構已備，就沒有什麼再多的根據物可找。前見晨報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謂古史之定奪要待後來之掘地。誠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論一個問題。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這只是中國初期文化史。若關於文籍的發覺，恐怕不能很多。……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這是不能為後來的掘地所掩的，正因為不在一個題目之下。豈特這樣，你這古史論無賴於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於你這古史論。」《傅斯年全集》，4/456-457；《古史辨》，2/288-301。劉起鈞教授在《顧頡剛先生學述》中，在引述傅斯年對顧頡剛的贊語之後，加了一段案語：「胡、傅是顧先生最親近的師友，雖然後來分道揚鑣了，然在當時相與聲應氣求，所以給了這樣的盛譽。但顯然牽於私誼，有黨同阿好之處。」劉起鈞，《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138；顧頡剛與傅斯年的衝突約起於1928年，顧頡剛在一封給胡適的信上透露了這項信息，兩人發生衝突的部分原因，據顧頡剛信中所述，主要是有關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出版“語言歷史叢書”，傅斯年主張出版研究性著作，顧頡剛認為民俗叢書亦當出版，兩人觀點頗有歧異；以及籌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顧頡剛的意見與傅斯年相左，而辭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常務籌備員；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152-155。本文不擬費心處理顧頡剛與傅斯年間的恩怨，這個問題可能需要更多材料佐證。

³⁷⁵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4/289-299。

³⁷⁶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說：「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屬於文化方面，不比現代材料，多可注意人事方面，因為文化史，特別是古代史的著意點，不是單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東西去研究，固然有相當的結果，所得究竟有限，況其物的本身，間有可懷疑之處；所以應當注重整個的觀念。……古代歷史多不可靠，就是中國古史時期，多相信尚書左傳等書，但後來對於尚書左傳，亦發生懷疑，不可信處很多，於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證。」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4/290-291。

³⁷⁷ 傅斯年，〈清梁玉繩著史記志疑〉，《傅斯年全集》，4/370。

有理，懷疑的有據，儘可以懷疑。相信的有理有據，也儘可以相信」³⁷⁸；文獻材料可以幫助考古所獲得的地下材料觀照整體，地下的考古材料則可使文獻材料活潑有生氣，二者相互為用，便可以擴大應用史料以建構史學，使歷史變得更為鮮活³⁷⁹。

傅斯年極力倡導歷史方法論，將“史料學”當成歷史方法論的“中央題目”，提出「史料的發現，足以促成史學之進步，而史學之進步，最賴史料之增加」³⁸⁰，力主“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將史料的範圍擴及地上文獻材料與地下考古材料，結合文獻考證學派(疑古派)與文物考證學派(考古派)，使史學研究邁向一個更寥廓的天地。而傅斯年於 1928 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將所主張的“材料”擴充與“工具”革新，必能達到史學進步的理論³⁸¹，落實到實踐層面。在傅斯年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考古、語言、文獻整理三方面，均有可觀的成績，實踐了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宗旨³⁸²。

如果古史辨運動僅止於對儒學傳統的破壞，或者僅止於將“六經”與“諸子”史料化，那麼，這個運動的成績與貢獻，將只是古史研究的範圍。但經由歌謠採集與方言調查，使歷史學研究在古代與現代之間縱橫交錯；透過白話小說與神話研究，使文獻材料不斷擴張；史學研究的材料與工具亦不斷進

³⁷⁸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4/292。

³⁷⁹ 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說：「大凡新獲的直接記載，每不能很多的，而遺傳的記載，雖雜亂無章，數量卻不少。每每舊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點，則登時變成活的。即使史記殷本紀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經的王亥，天問的恆和季，不特是死的，並且如鬼，如無殷墟文字的出土，和海寧王君(案：指王國維)之發明，則敢去用這些材料的，是沒有清楚頭腦的人。然而一經安陽出土，王君之考釋，則史記由山海經及天問及其聯類的此一般材料，登時變活了。」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傅斯年全集》，3/225。

³⁸⁰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全集》，2/39。

³⁸¹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57-9。

³⁸²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64。

步，加上地下考古材料的出土，使史料範圍不斷擴充，因而觸及整個中國歷史的範疇，催化了現代中國新史學的發展。

古史辨運動的意義，並不在疑了哪些古史，信了哪些古史，而是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以及透過歌謠採集、方言調查等活動，運用考古學的新材料、新工具，重新建構中國古代信史的企圖與努力，敲響了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鼓角。至於個別史實之疑與信，便顯得不是那麼重要。

李學勤教授在《走出疑古時代》書中，闡明因為考古學的發達，古史辨運動所代表的疑古史學已經成為過去³⁸³。錢穆主張在考古之外，中國古史研究仍可另闢蹊徑，藉由文獻考訂探索上古史的可能面貌³⁸⁴。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將史料分為文獻材料與考古材料，這兩種材料是重建古史的重要依據。傅斯年提出“史料即史學”的觀念，要歷史工作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個“東西”就是“史料”，而“史料”就是“史學”。這些與疑古派有同有異的論述，說明了古史辨運動開拓出中國古史研究更多的可能性，而學者們亦嘗試從不同角度拓展古史研究的方式。

(九)小結

1923年4月27日，顧頡剛在一封寫給錢玄同的信上說禹“大約是蜥蜴之類”，點燃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同時也吹響了現代中國新史學的號角。8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頭審視古史辨運動時，固可以後見之明批判前賢，諸如古史辨運動只有破壞沒有建設，或者指出古史辨運動並未做出任何具體成果。但學術研究的過程，本來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提出問題本身即為學術進步的一種動力。如果不是古史辨運動的大破壞，今天的中國上古史可能仍停留在儒學經典所建構的系統，而非結合文獻與考古所建構的新古史。李學勤教授在《走出疑古時代》固然指出中國上古史研究的新方向，

³⁸³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18-19。

³⁸⁴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216-233。

而古史辨運動未嘗不是為 1920 年代的中國上古史研究開啓了新頁。

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我們看到同時代的學者們言人人殊，不僅反對陣營的南方學派磨刀霍霍，同屬北方學派的傅斯年和丁文江，亦提出不完全贊同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論述。以 1920 年代的中國學術界而言，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學者，約略可分為文獻考證學派、文物考證學派(考古派)、釋古學派(二重證據法)等；縱使同為文獻考證學派，錢穆的治學取向，顯然有異於疑古派，更遑論治學取向迥異的文物考證學派(考古派)和釋古學派(二重證據法)。文獻考證學派、文物考證學派和釋古學派的分野，主要是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不同所造成，基本上比較容易理解。而其中比較值得深思的是，使用相同方法(樸學考據)與材料(儒學經典)，同屬文獻考證學派，卻做出不同結論的南方學派。

包括柳詒徵、劉澹藜、陸懋德、張蔭麟等人在內的南方學派，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扮演忠實反對者的腳色，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說法反復攻詰。但值得注意的是，反對者們所引述的材料，與疑古派幾乎相同，為何卻做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 1920 年代的中國學術界來加以觀察。

顧頡剛在 1923 年 5 月 6 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 9 期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後，1923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 11 期，同時刊出劉澹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和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使得《讀書雜誌》成為古史辨運動的主戰場；而北京大學國學門則為疑古派的重要基地，收錄於《古史辨》中的許多文章，最初即發表於《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此外，古史辨運動另一個戰場是《學衡》雜誌和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所編輯發行的《史地學報》。1924 年 6 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 3 卷第 1-2 合期，發表了 5 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³⁸⁵；1924 年 10 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 3 卷第 3 期，

³⁸⁵ 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1-5；2.劉澹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史地學報》，3.1-2: 13-23；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史地學報》，3.1-2: 25-30；4.錢玄同，

發表了 3 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³⁸⁶；1924 年 12 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 3 卷第 4 期，發表了 2 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³⁸⁷；使得南方學派成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與《讀書雜誌》、《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的疑古派交戰激烈，《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

疑古派是北方學派的化身，反對者則以南方學派為主體，這種北大南高明顯對立的情形，不僅表現在史學領域，文學方面的主張尤南轅北轍。胡適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的燃燈人，亦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柳詒徵是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亦為南高的學術領袖；《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學衡》雜誌和《大公報·文學副刊》³⁸⁸，顯然是古典主義的堡壘；《讀書雜誌》與《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是疑古派的主要陣地，《史地學報》則是反古史辨運動的重要戰場。《古史辨》1-7 冊的出版時間為 1926-1941；《學衡》第 1-79 期刊行的時間為 1922.01-1933.07；《史地學報》1.1-4.1 刊行時間為 1921.11-1926.10；從期刊發行年代與《古史辨》7 冊出版的年代，略可看出 1920 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對立的如影隨形。而這種對峙的情形，揭開了現代中國學術南北之爭的序幕，從五四到後五四時期，甚至 1949 年以後的海峽兩岸，南北之爭繼續在歲月裡流轉。

〈答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30-41；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42-45。

³⁸⁶ 1.劉揆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史地學報》，3.3(南京，1924.10): 19-32；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3: 32-43；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史地學報》，3.3: 43-46。

³⁸⁷ 1.劉揆藜，〈與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4(南京，1924.12): 25-33；2.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續)〉，《史地學報》，3.4: 33-44。

³⁸⁸ 《大公報·文學副刊》的主編吳宓，亦為《學衡》雜誌的總編輯，乃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要將；請參閱：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61-220；王泉根，〈吳宓先生年表〉，收入：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480-520。

五、國史建構：民族主義的理想與現實

(一) 史地教學與編寫教科書

《史地學報》2卷1期登出一篇〈今夏中華教育改進社關於史地教育之提案及歷史教育組地理教學組之會議紀錄〉的特載，其中有三個議案似可做為此一普遍現象的注腳。其一，徐則陵提議組織委員會以研究歷史教學問題³⁸⁹；其二，朱希祖提議有關中學中外史地教學的內容與順序，其三，竺可楨與白眉初提議調查蒙藏地區³⁹⁰。

在討論中外史地教學的次序時，朱希祖認為：中學校宜先教地理後教歷史，教地理歷史均宜以本國外國同時並授，本國外國歷史時間之分配均宜以上古中古近古古二分之一，本國外國現代史均宜提前先授，其後隨時補講，至畢業時之時事為止³⁹¹。由此一提案可以看出當時歷史學界對史地教學的一般看法，亦即中西並重，詳近略遠，尤其加重現代史部分，此乃以經世致用為中心的史地教學。由此或可蠡測由於內憂外患的紛至沓來，學術界對當代中外局勢的關懷實已成為共識。

任何學術風氣的形成，絕非旦夕之間風起雲湧，而係有其源遠流長的傳統。重視史學經世的精神，固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關懷，追求富強更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努力的目標，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提倡，亦可從此一角度加以思考；“南高”師生創立《史地學報》，致力於歷史地理學研究，加上對當代時勢的關懷，凝聚了研究歷史地理學的風氣，此風氣彼此激盪的結果，形成整體的學術關懷，為歷史地理學的興起，寫下新的一頁。

³⁸⁹ 議案內容如下：「歷史一科，關於陶養公民至為重要。吾國中小學歷史教學各方面，亟宜加以研究，以期改善而收歷史一科應有之效果，茲請提議組織委員會，研究關於中小學歷史教學之問題。」（《史地學報》，2.1: 45）案：徐則陵時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歷史系主任，為史地研究會指導員。

³⁹⁰ 《史地學報》，2.1: 63。

³⁹¹ 《史地學報》，2.1: 55。

除了觀察、分析時事，致力於經世史學與歷史地理學外，史地學報派對史地教學亦多所關心，並有所建言。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似乎特別關心教育問題，不獨史地學報派為然，因而此時期的教育改革建議可謂琳瑯滿目，各出機杼。史地學報派對教育改革的興趣，主要仍在史地範疇，出現在《史地學報》上的相關文字，有學者們的討論記錄，有史地學報派的個人意見，亦有個人所撰寫的史地教科書；譬如一篇署名叔諒的評論文章〈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作者就對史地教學提出了三個意見：1.中小學史地教本之編纂；2.史地教員之檢查，或設法補濟其缺；3.設法普及國民之史地常識³⁹²。竺可禎則在〈地理教學法之商榷〉一文中，說明地理學是「研究地面上各種事物之分配及其對於人類影響之一種科學，在中小學則尤須重於事物對於人類之影響，即人文地理」³⁹³，所以他認為「專論地球上事物之分配而不及於人生之關係者不謂之良善之地理學」，而「我國中小學地理教師嚮多專述地面上事物之分配，對於人生之影響，毫未顧及，取其糟粕，遺其精神，地理學遂成為省縣山川物產名稱之字典，宜其乾枯無味，為學者所不喜」³⁹⁴。為了改進此一現象，竺可禎建議應擴大地理學的範圍，並且將地理學列為聯絡各學科的樞紐³⁹⁵；此類看法雖不免有過度擴大地理學範圍之嫌，但亦可見史地學報派之用心。而在《史地學報》中，對史地教學提出整體意見的，是2卷1期的〈今夏中華教育改進社關於史地教育之提案及歷史教育組地理教學組之會議紀錄〉，其中有一項梁啟超的提案「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並目錄」，對當時的國史教學提出針砭

³⁹² 《史地學報》，2.3: 13。

³⁹³ 《史地學報》，2.3: 16。

³⁹⁴ 《史地學報》，2.3: 17。

³⁹⁵ 竺可禎指出：「地理學之範圍既廣且大，舉凡地球上物質如地形，氣候，物產，人口，鐵道，航線之分布莫不與地理有關，故教授地理學者不求擴充地理上之範圍，而在限制地理之範圍，編織各種地理之要素，成為系統，以人類為前提，而使之貫成一氣，論其位置，則地理學實介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故在中小學地理實處於特殊之地位。因其與各學科均有關係故，實為聯絡各科之樞紐也。」（《史地學報》，2.3: 17）

及改進之道；梁啓超認為當時的國史教學有幾個重大的缺失：(1)現行教科書全屬政治史性質，其實政治史不能賅歷史之全部。(2)舊式的政治史，專注重朝代興亡及戰爭，並政治趨勢之變遷亦不能說明。(3)關於社會及文化事項，雖於每朝代之後間有敘述，然太簡略，且不聯貫³⁹⁶。

因為教科書及教法上有上述缺點，梁啓超於是擬訂了一份「中學國史教本目錄」，在這分目錄中，他將三年中學課程擬為 192 課，其中年代(歷史)部分 7 課，地理部分 52 課，政治 31 課，社會及經濟 48 課，文化 53 課³⁹⁷，如將地理和文化課程相加，占課程二分之一以上，可見兩者所占比重；尤其是地理部分比歷史多出 45 課，亦可見其對地理學的重視。但要說明的是，地理部分有許多是歷史地理學，文化部分也有許多與歷史有關者，所以這分教科書目錄可以說是從一部中國全史的觀點來擬定的。

徐則陵在《史地學報》2 卷 4 期發表〈高級中學世界文化史學程綱要〉，在這篇綱要中，徐則陵編列了 127 課，其中地理和文化的比重甚高，和梁啓超的課程目錄取向相近³⁹⁸，或許這正代表了史地學報派對歷史與地理學的關注：強調地理與文化課程。

就史地學報派所擬的史地教科書內容來看，基本上頗為強調地理學的重要性，特別是人文地理；當然，在此同時也有人注意到自然地理的問題，張其昀就企圖在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中找尋平衡的座標。

在〈學地理之興趣〉這篇為中學生的談話中，張其昀將中學六年的地理教育劃分為地學初步、區域地理、政治地理、地學問題等四個階段³⁹⁹；其內

³⁹⁶ 《史地學報》，2.1: 50)

³⁹⁷ 《史地學報》，2.1: 51-55。

³⁹⁸ 《史地學報》，2.4: 49-55。

³⁹⁹ 《史地學報》，2.4: 57-62；這四個階段的內容為：

地學初步(初一)

地理之普通知識，基本觀念，必要之方法與記號。

區域地理(初二、初三)

依地形，氣候，富源，分世界為若干重大的自然區域。以代表的方法，說明各區氣候與地文的關係，環境與人生之影響。

容基本上以中國為本位，惟仍具有世界眼光，不僅重視人文地理，同時也觀照自然地理。此外，張其昀對大學的地理學教育亦有所用心，《史地學報》2卷5期刊載了他的一篇〈兌亞二君之大學地理教育觀〉，乃係美國克拉克大學校長亞特伍(Wallace Water Atwood)的就職演說辭〈地理在美國教育上之新意義〉，以及哈佛大學教授兌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⁴⁰⁰的補充說明。在這篇演講中，亞特伍和兌維斯將美國現行的地理學教育做了一個鳥瞰式的說明，張其昀並將芝加哥大學地理系學程列為附錄⁴⁰¹，以說明美國大學的地理教學。

在編輯教科書方面，張其昀編有《初級中學地理》三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第一、二冊為人文地理，第三冊為區域地理，在編輯例言中，張其昀說明此書的宗旨「在使學生明瞭地理與人生之關係」⁴⁰²，至於教材的範圍「雖普及於人類全體，但純以祖國為觀察中心點」⁴⁰³，所以在詳略的取舍上，有本末先後之序，且為顧及時事的發展，特闢一章談國際聯盟，希望能融合中外，結合人文地文兩方面，「凡地理之普遍知識，基本觀念，必要之方法與記號，均欲源源灌輸」，使此書成為「初學地理者之門徑」⁴⁰⁴。

由上述討論，可見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關注，基本上是地理多於歷史的，這一點從史地研究會的前身為地學研究會，已露其端倪，此與禹貢學派

政治地理(高一、高二)

定中華為本位，擇列邦與吾國關係最密者，以地理背景為主，以民族的，歷史的，政治的三方面為輔，解釋現世界之重大問題。

地學問題(高三)

提人事為綱，博徵自然地理的材料，分題論究之(如世界之農業商路等，一一考察所受環境之影響)，對於特別問題，有充分的訓練，因而獲得解決之能力也。(《史地學報》，2.4: 62)

⁴⁰⁰ 王學素在《史地學報》2卷2期所譯述的〈地理研究之計劃〉，介紹了美國地理學研究的近況，其作者兌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即張其昀譯為兌亞斯之同一人；〈地理研究之計劃〉刊於《史地學報》，2.2: 19-32；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史地學報》內容分析〉。

⁴⁰¹ 《史地學報》，2.5: 25-30。

⁴⁰² 《史地學報》，3.3: 15；此說本於竺可楨，見竺可楨，〈地理對人生的影響〉，《史地學報》，2.1: 1-12；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史地學報》內容分析〉。

⁴⁰³ 《史地學報》，3.3: 15。

⁴⁰⁴ 《史地學報》，3.3: 16。

的觀點略有不同，因為禹貢學派立論的基礎仍係歷史，這是兩者在取向上最大的不同點⁴⁰⁵。

身為史地學報派精神導師的柳詒徵，在史地教學的意見上與前述諸人亦有其相通處，然其所論係以歷史教學為主題。《史地學報》2卷1期柳詒徵提出〈商榷中小學歷史教學的意見〉說明：「人的教育是兩種(1)一國的人(2)世界的人。要教一國的人，就要曉得一國的歷史，要教一國的人同時做世界的人，就要曉得世界的歷史」⁴⁰⁶。可見柳詒徵對歷史教育的見解，是以人為基本的出發點，接著是由本國到世界，從現代到古代，其順序是先中國後世界，先現代後古代，由人文而自然。

六、史學動向：材料、方法與解釋

七、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天鵝之歌：以《思想與時代》為主體的分析

《思想與時代》創刊於1941年8月1日，由張其昀、張蔭麟、郭斌龢、謝幼偉等當時任教於浙江大學的學人在貴州遵義共同發起。創刊之初，以月刊的形式出版，至1945年2月出版完第40期後停止出版。直至1947年元月才在杭州重新復刊，一直到1948年4月正式停刊。在《思想與時代》出版的5年之中，共計出版了52期，先後主持編輯事務的有張蔭麟、張其昀、錢穆等人。

《思想與時代》的創刊動機，可遠溯自主編之一張蔭麟計畫編纂國史之

⁴⁰⁵ 《禹貢半月刊》的討論，請參閱本文第4章第2節〈《禹貢半月刊》內容分析〉、第5章第1節〈《禹貢半月刊》與《史地學報》之比較分析〉。

⁴⁰⁶ 《史地學報》，2.1: 58。

時。張蔭麟留學美國時即已立定志向，欲以“治國史”為其終生志業，曾向張其昀致函表達其欲治國史的決心與方法。因此，張蔭麟回國任教於清華時，便致力於國史之編纂，唯因 1937 年抗戰軍興，使得此一計畫不得被迫終止。直到 1941 年 4 月，張蔭麟與多年好友張其昀在異地重逢，並交換彼此組織學會、創辦雜誌的想法。雖因抗戰使得原先輯錄“國史長編叢書”的計畫再度落空，但卻促成《思想與時代》的創辦。

《思想與時代》創刊時，正逢中國面臨內外交逼之困境，貴州與西南地區的學者們秉持“為建國時期從事思想上建設”的目標，創辦《思想與時代》。《思想與時代》與其他期刊不同的地方，在於創刊號並無特別刊載“發刊辭”或“編後語”之類的文字，以說明創刊之旨趣，僅在最前面刊出由張蔭麟所撰寫的〈徵稿啟事〉，表明該刊性質。

一、本刊內容包涵哲學、科學、政治、教育、史地諸項，而特重時代思潮與民族復興之關係。

二、本刊歡迎下列各類文字：

1. 建國時期主義與國策之理論研究，
2. 我國固有文化與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討，
3. 西洋學術思想源流變遷之探討，
4. 與青年修養有關各種問題之討論，
5. 歷史上偉大人物傳記之新撰述，
6. 我國與歐美最近重要著作之介紹與批評。

三、本刊文字大都為通論，不載考據纂輯之作，但窮理力求精密，立論務其徵信，以要言不繁深入顯出者為尚⁴⁰⁷。

由〈徵稿啟事〉可以了解，《思想與時代》的宗旨與性質：(1)聲明著重“時代思潮與民族復興之關係”，顯示在抗戰軍興的時代，學人們努力尋求“民族復興”的道路。(2)徵稿內容涵蓋文學、史地、哲學、科學、政治以及教育等

⁴⁰⁷ 《思想與時代》，1(遵義，1941.08)，〈徵稿啟事〉。

各個層面，屬一綜合性期刊。(3)言明“不載考據纂輯之作”，同時要求投稿人以簡單、通論性的文字表達，說明該刊設定的讀者應為一般知識青年與大眾。

依據張其昀的自敘，《思想與時代》月刊以溝通中、西文化為職志，與《學衡》、《國風》等雜誌之宗旨相類。但“思想與時代社”較能擺脫五四時期反對反傳統的格局，試圖開創新思想與文化的層面。而《思想與時代》在中西文化方面的看法，尤其肯定傳統文化的部分，實與當時激進化的思想環境相左。

《思想與時代》的經費來源，主要是來自於讀者訂閱、購買。但創刊時正值兵荒馬亂之之際，通貨膨脹嚴重，多數人沒有能力訂購書刊。因此，《思想與時代》同時亦接受政府當局對文化事業方面的資助。所以，該刊在“思想”上與政府當局多所吻合，步調一致。儘管如此，由於《思想與時代》的基本發行情僅有 1,200 分左右，因此難以維持運行。1944 年更因日軍沿湘桂鐵路南侵，續陷廣西全省，並長驅而入貴州，造成西南後方人心惶恐，同時又因物價波動劇烈，更造成《思想與時代》經營之困難，終於在出版第 40 期後，被迫宣告停刊。

在杭州復刊的《思想與時代》，經費方面未獲得改善，仍處於營運艱困的情況。旋因國、共內爭日漸浮上檯面，造成《思想與時代》的經營困難，1948 年的停刊，成為無法避免的結局⁴⁰⁸。

八、師友網絡，相與問學

⁴⁰⁸ 參閱：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與時代》為中心〉(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85-99。

九、結論

十、徵引書目

(一) 中日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

1. 期刊

1. 《史地學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60。
2. 《思想與時代》，臺北：華岡出版社影印，1978。
3. 《學衡》，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71。

2. 專書

1.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
2. 中華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張其昀(監修)，《中華百科全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出版，1981-1983。
3. 巴克爾(E. H. Parker)(撰)、向達(譯)，《匈奴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4. 巴濟列維支、潘克拉托娃(合撰)、張蓉、向達、楊人楩(合譯)，《蘇聯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5. 文廷式(抄錄)、王國維(輯)，《大之氈罽工物記》，臺北：鼎文書局，1982。
6. 文廷式(抄錄)、王國維(輯)，《大元官制雜記》，臺北：鼎文書局，1982。
7. 文廷式(抄錄)、王國維(輯)，《大元倉庫記》，臺北：鼎文書局，1982。
8. 文廷式(抄錄)、王國維(輯)，《元代畫塑記》，臺北：鼎文書局，1982。
9. 文廷式(抄錄)、王國維(輯)，《元高麗記事》，臺北：鼎文書局，1982。
10.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11.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12. 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13. 王國維，《人間詞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4. 王國維，《三代地理小記》，板橋：藝文印書館，1970。
15. 王國維，《三代秦漢金文箸錄表》，板橋：藝文印書館，1969。
16. 王國維，《不其敦蓋銘考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17. 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18.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上、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19. 王國維，《壬癸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20. 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21. 王國維，《心理學》，上海：教育世界社，不詳。
22. 王國維，《毛公鼎銘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23. 王國維，《王忠愍公遺墨》，二卷，不詳，1930。
24. 王國維，《王國維文集》，北京：北京燕山，1997。
25. 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1-12，臺北：大通書局，1976。
26. 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附錄》，臺北：大通書局，1976。
27. 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續編》，1-12，臺北：大通書局，1976。
28.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書信》，臺北：華世出版社，1985。
29. 王國維，《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3。
30.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1-10，上海：上海書店，1983。
31. 王國維，《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32. 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33. 王國維，《古胡服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34. 王國維，《古禮器略說》，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35.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36. 王國維，《宋元戲曲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37. 王國維，《定本觀堂集林》，臺北：世界書局，1961。
38.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67。
39. 玄奘(撰)、向達(輯)，《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1。
40. 甘地(著)、向達(譯)，《甘地自傳》，上海：中華書局，1934。
41. 白菱漢(著)、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臺北：臺灣商務，1966。
42.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61。
43. 向達(等著)，《敦煌變文論集》，臺北：石門，1981。
44. 向達(編)，《中西交通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
45. 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北京：中華書局，1982。
46. 向達，《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47. 向達，《印度現代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48.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87。
49. 向達，《唐代俗講考》，北京：燕京大學燕京學報社，1934。
50. 向達，《紙自中國傳入歐洲考略》，上海：中國科學社，1926。
51. 向達，《新加坡的賴佛爾博物館及圖書館》，不詳，1935。
52. 向達、嬰行(著)，《東方藝術與西方藝術》，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53. 艾儒略(著)、向達(校)，《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北京：上智編譯館，1947。

54.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
55.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1-10，北京：三聯書店，1998。
56.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
57. 吳宓，《文學與人生》，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
58. 吳宓，《吳宓詩集》，上海：中華書局，1935。
59. 吳宓，《空軒詩話》，香港：龍門書局，1967。
60. 吳宓，《雨僧詩文集》，臺北：地平線，1971。
61.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1998。
62. 呂思勉(編著)，《本國史》，上海：商務，1949。
63. 呂思勉(選注)，《新唐書選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64. 呂思勉，《三國史話》，臺北：開明書局，1960。
65.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1987。
66.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1985。
67. 呂思勉，《中國通史》，臺北：開明書局，1954。
68. 呂思勉，《文字學四種》，上海：新華出版社，1985。
69. 呂思勉，《史通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70.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上海：上海書店，1990。
71. 呂思勉，《先秦史》，臺北：開明書局，1970。
72.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上海：上海書店，1992。
73. 呂思勉，《字例略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74. 呂思勉，《呂思勉遺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75.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76. 呂思勉，《呂著中國近代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77. 呂思勉，《宋代文學》，不詳。
78.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開明，1948。
79.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0. 呂思勉，《理學綱要》，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81. 呂思勉，《章句論》，臺北：臺灣商務，1965。
82. 呂思勉，《章讞論》，臺北：臺灣商務，1977。
83.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
84. 呂思勉，《經子解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85. 呂思勉，《論學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86. 呂思勉，《歷史研究法》，臺北：五南圖書，1995。
87. 呂思勉，《燕石札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88. 呂思勉，《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9.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
90. 杜威(J. Dewey)(著)、劉伯明(口譯)、沈振聲(筆述)，《試驗倫理學》，上海：泰東圖書館，

- 1920。
91. 杜威(J. Dewey)(演講)、劉伯明(口述)、沈振東(筆記)，《杜威三大演講》，上海：泰東圖書館，1920。
92. 杜威(J. Dewey)(演講)、劉伯明(口譯)、沈振聲(筆記)，《教育哲學》，上海：泰東圖書館，1935。
93. 杜威(J. Dewey)(演講)、劉伯明(譯)，《哲學史》，上海：泰東圖書館，1920。
94. 杜威(J. Dewey)(撰)、劉伯明(譯)，《思維術》，上海：中華書局，1935。
95. 沈松喬，〈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
96. 沈衛威，〈吳宓傳：泣淚青史與絕望情慾的癡狂〉，新店：立緒文化公司，2000。
97.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98. 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撰)、向達(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99. 帕刻(E. H. Parker)(著)、向達、黃靜淵(譯)，〈韃靼千年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100. 林泰輔(撰)、錢穆(譯)，〈周公〉，臺北：臺灣商務，1971。
101. 竺可楨(等著)，〈現代學術文化概論(第一冊)〉，上海：上海書店，1992。
102. 竺可楨(等撰)，〈科學概論新篇〉，上海：正中，1948。
103. 竺可楨，〈竺可楨文錄〉，浙江：文藝，1999。
104.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1-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5. 竺可楨，〈看風雲舒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106. 竺可楨，〈氣象學〉，長沙：商務，1939。
107. 竺可楨、宛敏渭，〈物候學〉，北京：科學，1973。
108. 哈密頓(Hamilton, Clayton)(撰)、華林一(譯)、吳宓(校)，〈小說法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109. 柏爾(C. Bell)(著)、宮廷璋(譯)、竺可楨、向達(校訂)，〈西藏之過去與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110. 柳曾符、柳佳(編著)，〈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2。
111. 柳詒徵(主編)，〈國風半月刊〉，臺北：文海，1973。
112. 柳詒徵(等編注)，〈江蘇省首都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113. 柳詒徵(著)、柳曾符、柳定生(選編)，〈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14. 柳詒徵(著)、柳曾符、柳定生(選編)，〈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15.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臺北：世界書局，1962。
116. 柳詒徵，〈史學與地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117. 柳詒徵，〈柳詒徵說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18. 柳詒徵，〈柳翼謀先生文錄〉，臺北：廣文，1970。
119. 柳詒徵，〈國史要義〉，臺北：中華書局，1957。
120. 耶律楚材(著)、向達(校注)，〈西遊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1. 孫光揚(編校),《湯用彤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22. 徐葆耕(編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123.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24. 海甫定(H. Hoffding)(著)、龍特氏(Loundes)(英譯)、王國維(漢譯),《心理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
125. 海甫定(Hoffding, Harald)(撰)、王國維(譯),《心理哲學》,臺北:地平線,1970。
126. 班慈(Harry Elmer Barnes)(著)、向達(譯)、何炳松(校訂),《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127. 張其昀(主編),《中國之自然環境》,臺北: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1956。
128. 張其昀(主編),《中華民國地圖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59-1967。
129. 張其昀(主編),《中華民國憲法研究論文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71。
130. 張其昀(主編),《中華標準地圖》,臺北:中國地學研究所,1964。
131. 張其昀(主編),《世界地圖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5-1973。
132. 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133. 張其昀(主編),《抗日戰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6。
134. 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補編》,臺北:中華學術院,1975。
135. 張其昀(主編),《陽明山莊講研總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72。
136. 張其昀(等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史論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2。
137. 張其昀(等著),《國史上的偉大人物》,臺北:中華文化會,1954。
138. 張其昀(等著),《蔣總統八十晉九誕辰紀念論文集》,臺北:華岡,1975。
139. 張其昀(等撰),《三民主義論集》,臺北:中央月刊社,1976。
140. 張其昀(等撰),《中日文化論集續編》,臺北:中華文化會,1958。
141. 張其昀(等撰),《中國文學史論集》,臺北:中華文化會,1958。
142. 張其昀(等撰),《中國政治思想與制度史論集》,臺北:中華文化會,1955。
143. 張其昀(等撰),《中國戰史論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1954。
144. 張其昀(等撰),《中華民國大學誌》,臺北:中華文化會,1954。
145. 張其昀(等撰),《崔書琴先生紀念集》,不詳。
146. 張其昀(監修),《清代一統地圖》,臺北:國防研究院,1966。
147. 張其昀(監修)、方豪(主編),《臺灣叢書·第一輯·臺灣方志彙編》,臺北:國防研究院,1968。
148. 張其昀(監編),《共匪竊據下的中國大陸分省地圖》,臺北:國防研究院敵情研究所,1966。
149. 張其昀(編),《美國風光》,臺北:中華文化事業社,1960。
150. 張其昀(編),《國父全書》,臺北:國防研究院,1963。
151. 張其昀(編著),《中國文化的基本認識》,臺北:編者,1980。
152. 張其昀(編輯),《中美關係史(畫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60。
153. 張其昀(選編),《蔣總統最近言論選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71。
154. 張其昀,《(中華)歷代大教育家史略》,臺北:中國新聞出版公司,1956。

- 155.張其昀，《三民主義的理論》，臺北：中華文化會，1952。
- 156.張其昀，《三民主義教育研究集》，臺北：三民主義研究社，1962。
- 157.張其昀，《三民主義新世紀》，臺北：華岡書城，1971。
- 158.張其昀，《三民主義概論》，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2。
- 159.張其昀，《三民主義與現代思潮》，臺北：革命實踐研究院，1950。
- 160.張其昀，《大陸淪陷的痛史與光復大陸的努力》，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 161.張其昀，《中國之政治思想》，臺北：中國新聞，1954。
- 162.張其昀，《中國文化與三民主義》，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2。
- 163.張其昀，《中國民族志》，上海：商務，1929。
- 164.張其昀，《中國地理大綱》，上海：上海書店，1989。
- 165.張其昀，《中國地理學研究》，臺北：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1955。
- 166.張其昀，《中國抗共之精神基礎》，臺北：革命實踐研究院，1958。
- 167.張其昀，《中國思想根源》，韓國：文潮社，1986。
- 168.張其昀，《中國軍事史略》，上海：上海書店，1989。
- 169.張其昀，《中國國民黨六十年奮鬥史略》，臺北：新中國，1955。
- 170.張其昀，《中國國民黨黨史(簡編)》，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 171.張其昀，《中國經濟地理》，臺北：國防研究院，不詳。
- 172.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2。
- 173.張其昀，《中華民國史綱》，臺北：中華文化會，1955。
- 174.張其昀，《中華民國的精神》，臺北：國防研究院，1959。
- 175.張其昀，《中華民國創立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
- 176.張其昀，《反共抗俄的新局勢》，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 177.張其昀，《孔子傳》，臺北：中央文物，1953。
- 178.張其昀，《孔子傳略》臺北：陽明山莊，1959。
- 179.張其昀，《孔子學說與現代文化》，臺北：中國書刊儀器社，1958。
- 180.張其昀，《孔學今義》，臺北：ChinaAcademy，1985。
- 181.張其昀，《民主憲政與中國文化》，臺北：中華文化會，1966。
- 182.張其昀，《民族思想》，臺北：正中，1951。
- 183.張其昀，《地略學》，臺北：國防研究院，1962。
- 184.張其昀，《西方文化概說》，臺北：中國新聞，1956。
- 185.張其昀，《東西文化》，臺北：正中書局，1954。
- 186.張其昀，《建國方略研究》，臺北：中國新聞，1963。
- 187.張其昀，《建國原理》，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1954。
- 188.張其昀，《建黨原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 189.張其昀，《思想的改造》，臺北：革命實踐研究院，1950。
- 190.張其昀，《為祖國而戰》，臺北：革命實踐研究院，1950。
- 191.張其昀，《美國文化與中美關係》，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1956。

- 192.張其昀，《革命的歷史與理論》，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 193.張其昀，《革命哲學之基礎》，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 194.張其昀，《革命教育》，臺北：中國新聞出版公司，1955。
- 195.張其昀，《革命精神淺說》，臺北：革命實踐研究院，1950。
- 196.張其昀，《夏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197.張其昀，《院長教育政策之實踐》，臺北：陽明山莊，1958。
- 198.張其昀，《國父學說要旨》，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65。
- 199.張其昀，《國民黨的新生》，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 200.張其昀，《國防研究的要旨》，臺北：國防研究院，1959。
- 201.張其昀，《國院研究院概況》，臺北：國防研究院，1959。
- 202.張其昀，《張其昀先生文集》，臺北：國史館，1988-1991。
- 203.張其昀，《張其昀先生文集·三編》，臺北：國史館，2001。
- 204.張其昀，《從光復臺灣到光復大陸》，臺北：陽明山莊，1958。
- 205.張其昀，《菲韓紀行》，臺北：陽明山莊，1959。
- 206.張其昀，《陽明學論文集》，臺北：華岡，1977。
- 207.張其昀，《新生活運動》，臺北：中央文物，1952。
- 208.張其昀，《新教育論集》，臺北：中國新聞，1956。
- 209.張其昀，《實業計劃解說》，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 210.張其昀，《精神教育》，臺北：正中，1954。
- 211.張其昀，《臺灣史綱》，臺北：革命實踐研究院，1950。
- 212.張其昀，《臺灣精神》，臺北：革命實踐研究院，1950。
- 213.張其昀，《總理學說要旨》，臺北：華岡，1971。
- 214.張其昀，《總裁的革命哲學》，不詳。
- 215.張其昀，《黨史概要：近八十年中國革命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
- 216.張其昀，《黨務概論》，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 217.張蔭麟(等譯著)，《西方文化論衡》，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 218.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
- 219.張蔭麟，《張蔭麟文集》，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6。
- 220.張蔭麟，《張蔭麟先生文集》，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
- 221.張蔭麟，《論傳統歷史哲學》，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 222.梁啓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
- 223.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 224.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 225.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 226.陳訓慈，《民族臺人傳記與歷史教學》，上海：正中，1935。

227. 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
228. 陳寅恪(等著)，《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香港：龍門出版社，1967。
229.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臺北：里仁書局，1982。
230. 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臺北：不詳。
231.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232.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233.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店，2001。
234.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商務，1970。
235. 陳寅恪，《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236. 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臺北：不詳。
237.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
238.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
239.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編者，1974。
240.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71。
241. 陳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42.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臺北：商務，1975。
243. 陳寅恪，《詩集：附唐笈詩存》，北京：三聯書店，2001。
244. 陳寅恪，《論再生緣》，臺北：地平線，1970。
245. 陳寅恪，《講義及雜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246. 陳寅恪，《讀書札記一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247. 陳寅恪，《讀書札記二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248. 陳寅恪，《讀書札記三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249. 陳寅恪、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昭明出版，1999。
250.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
251.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
252.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253. 彭明輝，《中文報業王國的興起：王惕吾與聯合報系》，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254.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
25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256. 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257.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258. 斯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撰)、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上海：中華書局，1946。
259. 湯一介(選編)，《湯用彤選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260. 湯用彤(等著)，《燕園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261. 湯用彤(選編)，《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262. 湯用彤，《玄學·文化·佛教》，臺北：育民出版社，1980。

263. 湯用彤,《印度哲學史略》,臺北:河洛圖書,1975。
264. 湯用彤,《西方哲學講義》,三重:佛光文化,2001。
265. 湯用彤,《往日雜稿》,北京:中華書局,1962。
266. 湯用彤,《竺道生與涅槃學》,北京:北京大學,1932。
267. 湯用彤,《校點高僧傳》,三重:佛光文化,2001。
268. 湯用彤,《理學·佛學·玄學》,臺北:淑馨出版社,1992。
269. 湯用彤,《理學·佛學·印度學》,三重:佛光文化,2001。
270. 湯用彤,《湯予錫先生文集》,臺北:廬山,1978。
271. 湯用彤,《湯用彤全集》,1-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72. 湯用彤,《湯用彤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273. 湯用彤,《隋唐及五代佛教史》,臺北:慧炬,1986。
274.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275.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276. 湯用彤,《餽釘札記》,三重:佛光文化,2001。
277. 湯用彤,《魏晉玄學》,三重:佛光文化,2001。
278. 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北京:人民社,1957。
279. 湯用彤、魯迅、容肇祖,《魏晉思想:乙編三種》,臺北:里仁書局,1995。
280. 黃夏年(主編),《湯用彤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5。
281. 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
282. 遼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283. 劉伯明(著)、繆鳳林(記),《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上海:中華書局,1922。
284. 劉伯明(著)、繆鳳林(記),《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上海:中華書局,1921。
285. 劉伯明(演講),《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上海:上海書店,1990。
286. 劉知幾(著)、蒲起龍(釋)、呂思勉(譯),《史通釋評》,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
287.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288. 樊綽(撰)、向達(原校)、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
289. 樊綽(撰)、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
290. 鄭鶴聲(編),《司馬遷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56。
291. 鄭鶴聲(編),《四庫全書簡說》,南京:鍾山書局,1933。
292. 鄭鶴聲(編),《宋袁機仲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293. 鄭鶴聲(編),《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294. 鄭鶴聲(編),《班固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295. 鄭鶴聲(編),《袁樞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296. 鄭鶴聲(編),《漢班孟堅先生固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297. 鄭鶴聲(編),《鄭和遺事彙編》,臺北:中華書局,1970。
298. 鄭鶴聲,《三十年來中央政府對於編審教科圖書之檢討》,不詳:教育雜誌社,1935。
299. 鄭鶴聲,《中國史部目錄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4。

300. 鄭鶴聲，《中國近世史》，上海：上海書店，1992。
301. 鄭鶴聲，《中國近代史》，上海：上海書店，不詳。
302. 鄭鶴聲，《中華民國建國史》，上海：正中書局，1946。
303. 鄭鶴聲，《中學歷史教學法》，南京：正中書局，1936。
304. 鄭鶴聲，《史漢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305. 鄭鶴聲，《杜佑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306. 鄭鶴聲，《唐杜君卿先生佑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307. 鄭鶴聲，《鄭和》，重慶：勝利出版社，1945。
308. 鄭鶴聲，《歷史教學旨趣之改造》，南京：正中書局，1935。
309. 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山東：齊魯書社，1980。
310. 鄭鶴聲、鄭鶴春，《中國文獻學概要》，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
311. 鞏珍(著)、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1。
312. 錢穆(等者)，《華副文粹·第一集》，臺北：中華日報出版，1977。
313. 錢穆(等著)，《明代政法》，臺北：學生書局，1968。
314. 錢穆(等著)，《明代政治》，臺北：學生書局，1968。
315. 錢穆(等著)，《張蔭麟先生紀念專刊》，香港：龍門書店，1967。
316. 錢穆(等著)，《教育學術論文集》，臺北：三民書局，1990。
317. 錢穆(等撰)，《論孟論文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318. 錢穆(等編著)，《抗戰時期之歷史教育》，香港：龍門書店，1966。
319. 錢穆，《人生十論》，香港：人生，1959。
320.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
321. 錢穆，《中西文化研究專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4。
322. 錢穆，《中國文化史概論》，不詳。
323.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臺北：正中，1957。
324. 錢穆，《中國文化特質》，臺北：陽明山莊，1983。
325. 錢穆，《中國文化精神》，臺北：三民書局，1973。
326. 錢穆，《中國文化與科學》，臺北：進學書局，1970。
327. 錢穆，《中國文化叢談》，臺北：三民書局，1970。
328. 錢穆，《中國文學論叢》，臺北：東大圖書，1983。
329. 錢穆，《中國文學講演集》，臺北：三民書局，1968。
330.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1973。
331. 錢穆，《中國史學發微》，臺北：素書樓基金會出版，2001。
332. 錢穆，《中國何處去？》，臺北：聯合月刊雜誌社出版，1986。
33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商務，1957。
334. 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中華文化會，1957。
335. 錢穆，《中國思想通俗講話》，臺北：東大圖書，1990。
336. 錢穆，《中國學術史思想論叢》，臺北：東大圖書，1976。

337. 錢穆，〈中國學術史論集〉，臺北：中華文化會，1958。
338.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
339.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圖書，1981。
340.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2001。
341.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臺北：國民出版社，1955。
342. 錢穆，〈中華文化十二講〉，臺北：撰者，1968。
343. 錢穆，〈中華文化十講〉，臺北：空軍總部政治作戰部，1968。
344. 錢穆，〈孔子傳〉，臺北：綜合月刊社，1975。
345. 錢穆，〈孔子與論語〉，臺北：聯經出版，1974。
346. 錢穆，〈文化與生活〉，臺北：樂天出版社，1969。
347. 錢穆，〈文化與教育〉，臺北：東大圖書，1976。
348. 錢穆，〈文化學大義〉，臺北：正中，1952。
349. 錢穆，〈王守仁〉，臺北：臺灣商務，1981。
350. 錢穆，〈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臺北：東大圖書，1977。
351. 錢穆，〈古史地理論叢〉，臺北：東大圖書，1982。
352. 錢穆，〈史記地名考〉，香港：龍門書店，1968。
353. 錢穆，〈史學導言〉，臺北：中央日報社，1978。
354. 錢穆，〈四書釋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
355. 錢穆，〈民族與文化〉，臺北：撰者，1969。
356.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香港：香港大學，1956。
357.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上海：上海商務，1935。
358. 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撰者，1971。
359. 錢穆，〈朱子學提要〉，臺北：撰者，1971。
360. 錢穆，〈朱子學提綱〉，臺北：東大圖書，1986。
361. 錢穆，〈宋代理學三書隨劄〉，臺北：東大圖書，1983。
362.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北：中華文化會，1955。
363.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北：東大圖書，1983。
364. 錢穆，〈政學私言〉，臺北：臺灣商務，1972。
365. 錢穆，〈胡家鳳先生八秩冥壽暨逝世三週年紀念〉，臺北：不詳，1963。
366. 錢穆，〈秦漢史〉，臺北：撰者，1969。
367.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1984。
368. 錢穆，〈國史新論〉，香港：求精印務，1955。
369. 錢穆，〈國學概論〉，臺北：臺灣商務，1995。
370.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1979。
371. 錢穆，〈晚學盲言〉，臺北：東大圖書，1987。
372.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
373. 錢穆，〈莊子纂箋〉，臺北：三民書局，1969。

374. 錢穆，《莊老通辨》，臺北：三民書局，1973。
375. 錢穆，《湖上閒思錄》，臺北：三民書局，1969。
376. 錢穆，《陽明先生傳習錄大學問節本》，香港：人生，1957。
377. 錢穆，《陽明學述要》，臺北：正中，1984。
378. 錢穆，《黃帝》，臺北：東大圖書，1983。
379. 錢穆，《傳統與現實》，臺北：幼獅文化，1985。
380. 錢穆，《新亞書院概況》，九龍：友聯印刷廠，1958。
381. 錢穆，《經學大要》，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
382. 錢穆，《漢劉向、歆父子年譜》，臺北：臺灣商務，1980。
383. 錢穆，《論語要略》，臺北：臺灣商務，1974。
384. 錢穆，《論語新解》，香港：新亞出版，1964。
385. 錢穆，《學術思想遺稿》，臺北：素書樓基金會出版，2000。
386. 錢穆，《學籥》，香港：南天，1958。
387. 錢穆，《歷史與文化論叢》，臺北：東大圖書，1979。
388. 錢穆，《雙溪獨語》，臺北：蘭臺出版，2001。
389. 錢穆，《靈魂與心》，臺北：聯經出版，1977。
390. 鮑曼(IsaiahBowman)(撰)、張其昀(等譯)、竺可楨(等校)，《戰後新世界》，上海：商務，1927。
391. 鮑曼(L. Bowman)(著)、向達(譯)，《最近世界各國形勢》，南京：鍾山書局，1933。
392. 繆鳳林(編)，《中國通史綱要》，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2。
393. 繆鳳林(編著)，《日本論叢》，南京：鍾山書局，1933。
394. 繆鳳林(講)，《中國禮俗史》，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高級訓練班，1944。
395. 繆鳳林，《中國民族之文化》，西安：新中國文化出版社，1940。
396. 繆鳳林，《中國民族史》，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不詳。
397. 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398. 繆鳳林，《日本史鳥瞰》，南京：鍾山書局，1933。
399. 繆鳳林，《本國史》，南京：鍾山書局，1932。
400. 繆鳳林，《從國史上所得的民族寶訓》，西安：新中國文化出版社，1940。
401. 繆鳳林，《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不詳。
402.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403.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
404.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3. 論文

1. 李剛、張厚生，〈《學衡》雜誌初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南京，2002.05): 13-14。

2.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3. 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1991)，頁25-76。
4. 杜正勝，〈史學的兩個觀點〉，收入：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157-173。
5.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歷史學報(師大)》，6(臺北，1978.05): 475-489。
6. 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1923.3): 1-14。
7. 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與時代為中心》〉，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8. 段懷清，〈梅光迪的人文思想與人文批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1(杭州，2000.02): 17。
9. 胡映芬，〈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900-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10. 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收入：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公司，1980)，429-504。
11. 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1991)，9/4710-4718。
12. 張慧中，〈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13. 彭明輝，〈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臺北：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主辦，“五四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1999.4.24-25)。
14. 彭明輝，〈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以考據與經世為主軸的討論(1919-1949)〉(“The Rise of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A Discussion with Evidential Research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s the main axle,” (Heidelberg: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主辦，“中國史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從比較的觀點”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95.3.29-1995.4.2)，39pp; 收入：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施耐德(Axel Schneider)(主編)，《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249-296。
15. 彭明輝，〈從歷史學期刊論文分析臺灣史學研究動向(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臺北，2001.05): 335-364。
16. 彭明輝，〈臺灣地區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以學術期刊與博碩士論文為分析對象(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臺北，2003.05): 375-425。
17. 彭明輝，〈臺灣地區的歷史研究機構與歷史系課程(1945—199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6(臺北，1999.05): 169-200。
18. 彭明輝，〈臺灣地區的歷史教學與研究(1945—199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主辦，

- “四十年來臺灣人文教育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1998.12.19。
19.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動向：以學術期刊為分析對象(1945-2000)〉(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2；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4-033)，224pp；232,243字。
 20.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量化考察：以5種學術期刊為分析對象(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0.4=80(臺北，2001.11): 18-27。
 21.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量化考察：以歷史學報為分析對象(1945-2000)〉(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3；計畫編號NSC 91-2411-H-004-026，執行期限：2002.08.01-2003.07.31)；92pp；56,268字。
 22.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1.2=82(臺北，2002.05): 1-16。
 23. 彭明輝，〈臺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1945-2000)〉，Heidelberg: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主辦，“現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想研討會” [Workshop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inking]，2001.5.23-27。
 24.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25.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26.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二)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英文字母排列)

1. Dirlik, Arif. "Ta'o Hsi-sheng :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05-331.
2.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3. Schneider, Axel.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u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4. Schneider, Laurence A.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 Wang, Fan-shen(王汎森).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三) 網站

1. 王國維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futiancemetery.com.cn/ftcs/ftcs1/ftcs1-4-1.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2. 王國維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guoxue.com/deathfamous/wangguowei/w-np.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3. 王國維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guoxue.com/deathfamous/wangguowei/zhl.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4. 王國維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jx001.com/jiaxing/asp/jxmr_wang_gw.asp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5. 王國維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yiheyuan.com/Yg/wgw.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6. 向達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library.hn.cn/sxys/19990707/Content/00077813.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7. 向達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nlc.gov.cn/newpage/wjls/html2003/yunxiangshizhe_xd.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8. 吳宓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nju.edu.cn/cps/site/NJU/nju100/people_stories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9. 南京大學百年校慶特別網站：<http://www.nju.edu.cn/cps/site/NJU/nju100/frontpage.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10. 南京大學網站：<http://www.nju.edu.cn/>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11. 柳詒徵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nju.edu.cn/cps/site/NJU/nju100/people_stories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12. 浙江大學網站：<http://www.zju.edu.cn/>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13. 清華大學網站：<http://www.tsinghua.edu.cn/chn/xxjs/xyg.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14. 清華國學研究院簡介：<http://www.pep.com.cn/200212/ca5226.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15. 復旦大學網站：<http://www.fudan.edu.cn/>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16. 湯用彤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booker.com.cn/>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17. 湯用彤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nju.org.cn/html/person/list.jsp#>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18. 劉伯明生平資料來源：<http://seuaa.seu.edu.cn/book/detail.asp?id=26>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19. 劉伯明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nju.edu.cn/cps/site/NJU/nju100/people_stories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20. 鄭鶴聲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nju.org.cn/>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21. 鄭鶴聲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zhuji.gov.cn/Towns/hdjd/page/wy-wh4.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22. 錢穆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2.scu.edu.tw/chienmu/index1.htm>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23. 繆鳳林生平資料來源：<http://seuaa.seu.edu.cn/book/detail.asp?id=153>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
24. 繆鳳林生平資料來源：<http://www.nju.org.cn/html/person/list.jsp#> 資料擷取時間：2003.12.8。